

623330

137-3
56382: 3
T. 12 4. 11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十一分册

(美) 包 华 德 主编
 沈 自 敏 译
 赵 杰 校

-8
82: 3
2 4 11

中华书局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十一分册

(美)包华德 主编

沈自敏 译

赵 杰 校

(征求意见稿)

中 华 书 局

1981年7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十一分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
1981年7月印刷

定价：0.65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仅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人员参考。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译稿如引用，请核对原文。

1980年1月修订

目 录

田 汉	(1)
田耕莘	(3)
丁福保	(5)
丁西林	(6)
丁 ^惟 淮汾	(8)
丁文江	(10)
蔡 锷	(15)
蔡廷锴	(19)
蔡廷干	(22)
蔡元培	(25)
曹汝霖	(29)
曹 锴	(33)
岑春煊	(37)
曾 琦	(40)
曾仲鸣	(42)
邹 鲁	(44)

邹韬奋	(46)
朱友渔	(50)
杜重远	(53)
杜聿明	(55)
杜月笙	(57)
段祺瑞	(59)
段锡朋	(65)
董其武	(66)
董显光	(68)
董 康	(71)
董作宾	(72)
董远峰	(75)
乌尼伯英(吴鹤龄)	(78)
万家宝	(80)
万福麟	(83)
王正廷	(85)
王景春	(88)
汪精卫	(89)

田 汉 字：寿昌

田汉（1898.3.13——），剧作家，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先驱者、南国社、左翼剧作家联盟的创始人，又以创作电影脚本和为歌曲作词而知名，中日战争时改编旧京剧以适应现代演出。1966年成为一个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批判对象。

田汉出生在湖南长沙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当地小学接受初等教育。1914年进长沙师范学校，在校时上台演出并写作剧本，其中两种曾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他毕业后到日本，进东京高等师范，直至1921年。当时他对文学、戏剧、电影比对师范教育更感兴趣，他看了当时输入日本的所有外国电影。他在日本时，正是神山、松井的现代戏剧社最活跃的时期，也正是岛浦艺术论坛兴起的时候。

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中有郭沫若、张资平等人，他们于1918年决定和郁达夫、成仿吾合办一份新文艺杂志，田汉经《时事新报》的主编宗白华介绍和郭沫若晤谈，决定加入他们的团体。1921年，他们回到上海，创办了创造社，1922年5月第一期《创造》季刊出版，其中刊有田汉的两个剧本《咖啡店之夜》、《午饭之前》，这两个剧本被人们公认为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剧作家。

1925年，他和成仿吾发生争执退出了创造社，当了上海艺术大学教授。当时，“新少年影片公司”最先请他参加它们的事业，这成为他1926年后从事戏剧电影活动的基地。1926年下半年，他创办了南华电影戏剧社，亲自写说明，还编导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到民间去》。1928年，他和上海艺术大学校长发生争执辞职，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因缺乏经费，六个月后就停闭了，但是它却是今后新戏剧运动的中心、田汉直接经办的南国社的先行者。南国社让学生演戏谋生，同时学习舞台新技艺。他们经常在上海、南京、广州演出，其最初的剧目有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品及田汉的新创作。《苏州夜话》、《南归》等剧作取得很大成功。田汉又担任了南国社出版物的主编，《南国》半月刊出了四期就停刊了，接着出了《南国月刊》。1930年，南国社和月刊都被国民党中央党

部封闭。

这一时期，田汉为联华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女性》、《国家存亡》、又在暨南、大夏、复旦大学讲授戏剧艺术课，并任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少年中国月刊》。1930年，他在南华社、创造戏剧社、上海戏剧协会会员出席的大会上讲演，1931年成立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同年，田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演出田汉的两个剧本《洪水》、《火之跳舞》，主旨都是强调当前的社会政治问题。1932年1月，上海遇到战争，左翼戏剧联盟从事抗日宣传，国民政府认为，这未免太放肆，因而逮捕了包括田汉在内的联盟的一批领导人。田汉于何时释放不详，但人们知道他在1932年6月已经获得自由并为新的有影响的文学杂志《文学月报》写文章了。

他在联华影片公司时，和作曲家聂耳合写了一些电影歌曲，如《母性之光》中的《矿工之歌》，1934年他们写了歌剧《扬子江风暴》。他们两人合作的最有名的成果是《风云儿女》中的《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曲子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开始后，田汉去桂林，办了一个儿童戏剧学校，1938年他去重庆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任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直至1945年。同时还担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厅宣传处长。战争期间，他致力于改革旧京剧，使之适合当代演出。他试验修改了几出戏，在保存旧京剧的基本风格和古老的形式下，使舞台技术现代化并使古代的台词能为现代观众听懂。他受到守旧分子的激烈批评但获得了梅兰芳、周信芳这样一些演员的同情和合作。他的《白蛇传》剧本获得很大成功。他还组成剧团，在西南各省演出这类剧本。他在战时所写的几个电影脚本中，以描写湖北战争的《胜利进行曲》最为重要。

战争结束后，田汉回到上海，在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教书。以后又去香港，1948年12月去东北共产党地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任全国文艺界联合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文化部戏剧改革局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1951—1958年初，任文化部文艺局局长，并以四川代表资格出席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前后在中苏友好协会、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担任过职务。

田汉是一个多产作家，他在开始文学事业时信从浪漫主义，以后经过革新的现实主义进到主张阶级斗争。总其一生，他是一个戏剧界的实践家。他对现代中国戏剧的最大贡献是鼓励采取新的教学方法和训练方法并坚持改进中国舞台演出的技术。他本人的剧本反映了他很注意结构和细节。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他继续从事旧京剧和西方舞台技巧的试验，还写了几个古装历史剧本。但到了1966年，在所谓的文化革命中他成为一个主要的批判对象。

田汉曾结婚三次。第一个妻子裔素玉（译音）是一个戏剧家，1923年去世，以后与一位林小姐曾短期结合，详情不确。1925年又与广东女演员安娥结婚。田汉有一个儿子：海南（译音）。

田耕莘 教名：多玛斯

田耕莘（1890.10.24—1967.7.24），罗马天主教红衣主教中的第一个中国人。

田耕莘是全家五个孩子中的第二个儿子，生在山东阳谷县张秋镇，家乡是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该地不同异常地拥有各种寺庙和神坛，因而知名，母亲姓杨，是高家庄人，其他情况不详。父亲田开良，是一个有钱的商人之子，秀才、教师、诗人。田耕莘在他父亲督促下学习中国古籍。

1896年，他父亲在坡里庄小修道院教中文，这是张秋镇天主教会办的。他于1898年临死前一年，受洗入教。1901年，田耕莘十一岁时受洗，取教名多玛斯，他全家的其他成员在以后年代里也都入了教。1904年起，田在本地修道院学习十二年。他后来提到这一段受教育的经历说，由于教学方法不当和缺乏教材，学习很艰苦而且常常中断。此外，他还差一点因为身体有病以及内心疑惑引起的遐想而丢掉了自己的神职。他在决定性的最后几个月受训期间因患肺病而缺席。有一个暴戾的主教认为，他的缺席不只是因为病，而且是由于内心犹豫所致，竟以不授予神职威胁他。但是他最后还是于1918年6月当上了神父。

1919年到1929年，田耕莘神父在山东教区七个地方传教，当地的问题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困境而更形复杂。德国教士一度面临被逐出山东的威胁，

并已集中待命擄走，仅因中国教士和教民的呼吁而得以返回各自的岗位。但是德法两国的利害冲突也反映在宗教界。此外，山东的外国教士惯于轻视中国教士。田神父在两个县里创办和经管学校，他向上海、香港、东南亚的天主教会募到一万元基金，使他能建立许多宗教训练班，供给学生所需的食宿，组织各种宗教活动和团契。

1929年3月，田神父加入圣言会，经过两年特殊训练和研究后于1931年2月7日立誓。1932年8月他到阳谷、寿张、朝城、观城、范县等县组成的“独立教区”任职，同年12月14日该教区改为“阳谷监牧区”，次年2月田神父被任命为宗座监牧。

1937年2月，田神父首次出国，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国际圣餐大会。1939年第二次出国，是因罗马教廷任命他为主教衔阳谷宗座代牧而召他去接受教皇庇护十二世“祝圣”（即亲自祝福）。中日战争并未能阻挡住田的活动，他通过日本防线到上海，乘德国邮船去欧洲，中途因欧洲战争爆发而被迫折回。他改乘别的船只终于到了意大利和梵蒂冈。1939年10月29日由教皇任命为主教。他回国后又在阳谷进行了三年有成效的传教，于是被任命为青岛主教。1945年12月24日，教皇把田列入主教院，1946年2月18日，他成为东亚的第一个枢机主教。1945年4月11日罗马教廷宣布中国全国划为二十个教区，任命田耕莘为北平总主教。

1946年6月29日田任新职后，立即将注意力转向教育，他敦促青年神父进大学学习一个时期，并把辅仁大学的一个系改为圣多玛哲学院，他又收留青年天主教徒，安排他们进了学校，当共产党人在华北推进的时候，他们进入了北平。1947年秋，他设立了耕莘中学，这事实上是一个小修道院。为了改进天主教书籍的印刷和散发，他又创办出版中心圣多玛编译馆，还成立了天主教广播协会。1948年6月，田因眼疾去上海治疗，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北平。1949年春他去美国芝加哥治病，离开中国前他还致力于派遣十名青年教士、二十多名修道士出国深造。

在五十年代，田住在芝加哥。1950年为发布教皇训令事去罗马，这个训令论述了有关圣母升天的教义。1957年9月到11月，田应国民政府之请去台湾访

问。翌年，他参加了选举教皇的活动。1959年12月教皇若望二十三世任命田为台北总主教。1960年3月，他到台湾就任新职。

1962年，田最后一次到罗马，参加天主教第二次大公会议和新教皇保罗六世的选举。1967年7月24日，他死在台湾嘉义圣马丁医院。

丁福保 字：仲祐

丁福保（1874.8.4—1952），上海的著名医生，他对佛教、中国古典文学，语言学的研究也作了重要贡献。

丁福保生在江苏无锡，祖父丁文炳在浙江海盐当过小官，被太平军杀死。长子丁洁庵就是丁福保的父亲。家有田地一百余亩，但丁洁庵还得以教书来补给家计，因他的家乡自太平军洗劫后迄未恢复。丁七岁上学，并由他的长兄丁宝书给予课外补习，丁宝书还教过吴稚晖。丁福保起先贪玩，冬天放风筝，夏天钓鱼，学业进步很慢。1889年他进了无锡当地的书院。1895年去江阴南菁书院，该书院由当时名学者先谦主持，他教丁勤读《尔雅》、《说文解字》、《文选》、《水经注》等书，并校阅各书注释。丁遵从老师教导，专心校注《说文解字》，这为他以后在编纂工作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1896年，丁中秀才，翌年考举人未中，九月其父因肺病死去，丁守丧未再应试。1898年他又进了南菁书院，从华恒方（译音）兄弟专攻数学，同时又在另一个学校教书补助家计。1899年，丁的妹妹亦因肺病死去，丁一文莫名。他以后说过，当时他攻读了司马迁《史记》的《货殖列传》。1900年写成第一部学术著作《算学书目提要》。1900—1902年去苏州学医学及化学，以后又进了盛宣怀办的东文学社。1902年他已能很流利的讲日语，编著《东文（即日文）典答问》，此书风行一时，五千册很快销售一空。同年年底，他和李元一（译音）、华文契（译音）合办文明书局，数年中出版了他编译的《医学丛书》不下八十三种。

1903年，丁去北京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算学和生理学。1906年回无锡创办译书公会，只办了一年就失败了。同年编印出版《汉魏六朝名家集》，

1908年去上海行医。1909年在南京通过了医师资格考试。1909年底，由端方和盛宣怀派去日本，前者要他考察医学校和医院，后者要他了解如何开办育婴堂。丁在日本一月后回上海，创办中西医学研究会，得到地方当局的批准，拥有会员数百人，大约在这时，丁开始出版医学杂志《中西医学报》。

丁福保行医、印书、写作，积蓄了相当资财，这是他青年时所企求的。1916年，他患重病恢复后，转而研究佛学，同年编印《历代诗话》这部佳作的续集《历代诗话续编》和《两汉三国晋南北朝诗》。1918年丁开始素食，成了佛教居士。1921年依据日本望月信亨的《佛学大辞典》编印出版《佛学大辞典》，他对佛学的兴趣持续至1924年，此后又恢复了从事编纂工作的兴趣。

1925年丁编著出版了他的语言学著作《文选类诂》将李善等人的评注以笔划顺序编列，两年后他出版了《清诗话》，但这两部书同他于1932年出版的纪念碑式的《说文解字诂林》相比，就相形见拙了。《说文解字诂林》是一部照相平版印刷的剪辑，取材于对许慎所著第一部汉语大辞典进行评注的一百八十二种书籍，此书历经三十年始编纂成功。三十年代中，他对钱币也发生兴趣，1938年、1939年先后出版《古钱大辞典》及补编。

丁福保于1952年死在上海。他的学生周云青编印出版了他的四种著作：《四部总录医药编》（1955年），《四部总录天文编》（1956年），《四部总录算法编》（1957年），《四部总录艺术编》（1957年）。

丁福保晚年还从事慈善事业，给一些公、私立学校和图书馆捐款和赠书，尤其在无锡上海两地。他的个人生活不详，只知他在1897年结婚，有子五人，女二人，他的妻子死在1920年。

丁西林 字：巽甫 号：燮林 笔名：西林

丁西林（1893—），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但他却以创作喜剧而闻名。1949年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界历任重要职务。

丁西林，江苏泰兴人，青年时出国，获得英国伯明翰大学科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从事学术研究，1928年任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长,他担任这些职务到1945年。他是一个教学行政工作者但并无出色成就的科学家。他的论文《新振幅决定“g”的试探》获得学术界的定评,该文发表在1930年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公报第一期。1945年,他和郭沫若同去莫斯科出席纪念俄国科学院成立的纪念大会。

丁西林是以戏剧作家而并非以科学家闻名全国。1923年他写成了他的第一首作品《一只马蜂》,这虽非他的最佳作品,却是他的写作风格的代表作。这是写一对未婚夫妇的独幕喜剧,动作明快,很有惊人之处;对话爽朗机智,这是丁西林的独到之处。此后的年月里,丁西林续有新作,但为数不多。1947年他出版了七个独幕剧的合集《西林独幕剧集》,其中除《一只马蜂》外,还收入《亲爱的丈夫》,是描写一个理想的年轻新娘变成一个男子汉的滑稽剧;《酒后》采用凌叔华的故事情节;《北京的空气》描写几个小孩在北京的奇遇;《瞎了一只眼睛》是一出婚事喜剧;《压迫》是描写婚姻的另一个喜剧,而且可能是丁西林在西方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三块钱国币》是一场无理争吵的幽默剧。丁西林的剧作有其喜剧感和幽默感,毫无矫揉造作并直接诉之于观众。他的风格的单纯和笔触的轻灵使他的剧作在学校戏剧团体中特别流行,《一只马蜂》、《亲爱的丈夫》、《北京的空气》等剧一时在全国各学校演出。

丁西林也偶然创作长篇剧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945年的四幕喜剧《妙峰山》。在这个剧本中,一个大学教授变成了土匪王老虎,被捕后经华小姐的营救获释。王带着她以及以前俘获的人和一些朋友迁居到他的山寨遥远的妙峰山,王老虎在华小姐的影响下渐渐变得柔和了。剧本的结尾是他们结了婚,华小姐和别人决定留在妙峰山帮助王的队伍抵抗日军。这显然是一部宣传“爱国”的剧本,为响应当时的文学主张而写作的,但丁西林的对话技巧和真正的喜剧感却使这个剧本没有成为一个简单的宣传品。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丁西林在文化界任一些重要职务。1949—1958年任文化部副部长,1954年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1955年北京图书馆馆长,又多次率领或参加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1951年率领一个文艺团体访问印度、缅甸,1953年12月到1954年2月任代表团长出席中印友好大会,

1954年和1957年先后率领文化代表团去北越和柬埔寨。1955年去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大会，1958年去朝鲜参加朝中友好月纪念活动，1960年参加国际劳动妇女节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1949年后丁西林似乎不再作为一个科学家或剧作家而有所作为，他所担任的大部分职务给了他声望而不是权力。1954年，他任文化部副部长时，参与写了一节《汉字的整理和简化》。他的剧本选集《丁西林剧作选》于1955年出版，另有一本较小的选集，书名为《压迫》，于1963年出版。

丁淮汾 字：鼎丞

丁淮汾（1874.11.6—1954.5.12），同盟会创始人之一，负责山东的革命活动，后任国民党北京办事处主任，青年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监察院副院长。1937年后，丁专心研究中国古籍中的声韵学。

丁淮汾的先辈有不少自明代初期即为山东日照的学者和官吏，他父亲丁以此亦是一名造诣很深的学者，著有《毛诗正韵》。丁淮汾对近代政治较之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毕业于保定师范学校后去日本进了明治大学。他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和山东会友办了一份《晨钟周刊》。1908年回山东后，建立了同盟会山东分会，在济南办了山东公学，在烟台办了东牟公学，在青岛办了震旦公学，用以宣传革命。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时，丁到了上海和黄兴商议，又陪同胡瑛到烟台，逐走清廷官吏，举胡瑛为都督。1912年民国成立，丁任山东党务主任，省议会议员，山东法政学校校长。1912年底，选为众议院议员，他在北京和宋教仁等国民党人一起力求加强民主制度。

1913年二次革命时，丁返回家乡。1915年袁世凯称帝阴谋暴露时，丁去上海和一些议员谴责袁世凯的意图和行径。会后，回山东和居正筹划反袁起义，他们所辖部队于1916年5月占领潍县，沿胶济路前进。1916年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恢复国会后，冲突结束。丁又去北京在新国会中占有原议席。1917年，

国会因拒绝段祺瑞参加世界大战的决定而被解散，北京政权落入段祺瑞等人手中。丁和一些议员在广州集中，由孙逸仙召开非常国会，并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以孙逸仙为大元帅。

1917—26年之间，丁淮汾在广州和北京进行党务和国会活动，其主要工作之一是在北方宣传国民党的主张。1923年底，丁奉孙逸仙之命，在北京设立国民党华北执行委员会。1924年1月，改组后的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丁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被任命为北京办事处主任。他回北京一直到1926年中北伐开始，然后去广州任国民党青年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当时他深感华北的国民党势力受到共产党人的威胁，又立即回到北京。当时，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国民党中央影响极大，丁为了与共产党的宣传相对抗，成立了一个中山主义同盟会，后被人们称作大同盟。

1927年国民党内宁汉两派分裂时，丁淮汾支持蒋介石。他认为要与共产党势力对抗，需要有持正统的政治见解的精练干部，1927年中，他建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设立中央党务学校，该校于1927年8月8日开学，校长蒋介石，陈果夫任总务长，丁任训导长。丁因忙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校务乃由副训导长谷正纲代理。1929年夏，该校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丁任教育长至1941年，但其职责实际上由罗家伦、陈立夫、陈果夫担负。1931—1934年，丁淮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1932—1937年，任监察院副院长。从1928年起，丁淮汾在政界的活动就不很活跃了。

自此以后，丁淮汾就专心致志于中国古籍的音韵及其含义的研究，写了六种著作：《毛诗诗韵》、《毛诗集韵》、《尔雅古音表》、《方言》和《俚语征古》。

1949年，共产党控制大陆后，丁淮汾去台湾任监察院和中央评选委员会委员，1954年5月12日死在台北，遗有妻（死于1959年12月17日，年八十五）及女三人，子一人。

丁文江 字：右君 笔名：宗淹 西名：V、K、Ting

丁文江(1887.4.13—1936.1.5),以V、K、Ting之名知名,1931—34年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1934—36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以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所长(1916—21年)的成就闻名。

丁文江生在江苏泰兴的一个绅士家庭,受过旧式教育。泰兴县知事龙璋很赏识丁文江,劝他父亲送十五岁的丁文江随湖南学者胡元琰去日本留学。丁在东京遇到不少对政治感兴趣的中國学生,他在日本的一年半之间,也从事政治活动未在任何学校注册入学。丁的一个学友与在英国爱丁堡的吴稚晖通信,吴来信说英国的教育优于日本,丁乃要求他的父母同意他去英国,1904年春,他到了欧洲。

丁文江在爱丁堡化了一些时间学英语,以后离开苏格兰到英格兰进了一所补习学校。1906年一度进剑桥大学听课,因为费用过高,不久去格拉斯哥准备进伦敦大学医学院,但未能录取。1908年进了格拉斯哥大学,主修动物学、地质学。1911年毕业时,他已成了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科学实证主义者。

丁文江在英国七年期间,酷爱旅行,多次去西欧游览,他决定回国后遍游内地各省,1911年春离开英国,5月初到达印度支那,沿新建成的滇越铁路经云南回国,又经贵州、湖南到汉口,7月底到上海并回了家乡,那正是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被推翻前的三个月。

1912年初,民国成立,丁在上海南洋中学教书一年,1913年2月去北京任工商部矿务局地质科长,1914年初,他经香港、安南去云南,在中国西南部作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地质调查。他在云贵及四川一部分地区调查时,不仅注意煤、锡、铜的矿藏,而且收集化石,注意调查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1915年初,丁文江回北京,整理调查材料,其中包括对金沙江所作的考察,该江发源于西藏高原,经云南流入长江。这条河流,曾在明末著名地理探险家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中作过描述。丁文江对此书很感兴趣并于1914年带着它去云南。在地质调查过程中,丁经过徐的游记所记载的许多地点,证实

了徐霞客认为金沙江系长江之源的论断。几年后，丁继续研究徐的著作，1928年出版三卷本的修订版《徐霞客游记》，附有徐的生平年表与行进路线的地图。

1916年，经丁文江等人的努力，成立了“中国地质调查所”，隶属于农商部，丁任首任所长，1921年由比利时留学生翁文灏继任，该所很快获得了国际声誉，不仅因为该所训练了能干的地质人员，进行了全国地质矿藏调查，而且还由于它从1919年开始将其有科学价值的报告通过《地质会报》加以发表，并出版了两套《地质丛报》。

1918—1919年冬，丁文江等人陪同梁启超以非正式代表身份去欧洲参加巴黎和会，其中有张嘉森、蒋方震、徐新六。此行结成了丁梁的密切友情，也增强了丁文江对政治、哲学等问题的兴趣。

作为地质调查所的负责人，他在进行调查期间，还考查了热河东南部原北票附近的煤矿，发现该地矿藏丰富可以开采获利，1921年就成立了私营北票煤矿公司。丁文江辞去原职，改任公司总经理。公司业务兴旺，年产煤144,758吨。不久，丁又和军政界发生了密切关系。该矿区地处张作霖奉系势力范围，丁在军阀对峙派系纷争之中处事谨慎，经常来往于北票、沈阳、北京、天津之间。他就观察所得，最初在《努力周刊》上以笔名宗淹发表文章，后又写了一本《民国军事近记》（1928年）。

丁文江和《努力周报》的关系，使他涉足政界舆论，丁文江、胡适等人有感于国内政治混乱，办了这样一份周刊，讨论政治及政府改革等问题。1922年5月14日第二期上，发表了胡适执笔，十六个不同见解的知识界人士如蔡元培、王宠惠、梁漱溟、李大钊、丁文江等人签名的文章《我们的政治主张》，强调需要有“好人政府”，“好人”必需掌权，并提议南北各派和平谈判，恢复1917年国会，制定新宪。以后在该刊第六十七期，丁文江还孜孜于这一计划。丁文江深受十九世纪儒家政治家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影响，认为一个好的政府需要少数廉洁有为的热诚领袖，而当今之世，有真才实学而且道德高尚的人既不愿也不能在政府中起积极的作用，这是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劣迹产生的原因所在。

丁文江不仅关心军政问题。1923年2月，他的朋友张嘉森的演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题为《人生观》，他说西方科学发展的结果是出现了物质上丰富而道德上堕落的文明。他又认为科学追求外部物质世界而不能解决人类基本的精神生活问题，因此人生哲学不应决定于科学定律而应决定于人的直觉、自由意志和内心修养。丁文江对张嘉森攻击科学方法非常恼怒，1923年4月15日和22日，他在《努力周报》撰文反驳，题为《玄学与科学》，引用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英国数学统计学家皮尔森的论点，为科学方法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辩护，并否定所谓科学是西方道德衰退的原因。他声称科学的观点对人生哲学是必需的，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张与丁之间的争论，使不少有识之士也卷了进去。1923年底，将有关张与丁的争论及其他随后参加争论者的文章编印出版了两册《科学与人生哲学》。

丁文江以对华北状况进行严正的观察而知名，不少军政首领向他咨询。1952年7月，他经罗文干介绍与吴佩孚在岳州晤谈，8月又去杭州和孙传芳商谈一周。1925年冬，丁辞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之职，一度任威灵顿为首的中英庚款委员会咨询委员会中方三人委员之一。1926年5月，应孙传芳之请去上海商讨建设“大上海”计划。丁文江的正式名义是淞沪港务督办，他着手把分散管理的华人区置于统一的市政府管辖之下，以利发展港务和商讨取消外国租界的问题。1926年5月到12月的八个月之间，丁文江引进了现代化卫生设施，并与公共租界的外国领事团谈妥将上海公廨归还中方。1926年8月31日由丁文江和江苏省外事专员许沅代表中国方面签订“交还上海公廨临时协定”，将中国的司法权扩充到了公共租界并为最终废除外国在华治外法权迈开了步伐。

北伐军向上海进军时，1926年12月31日丁文江辞职去大连，修订徐霞客游记，1928年又重新从事地质工作，去广西北部和中部调查锡矿煤矿资源，对马平白灰岩之形成进行详细考察。1928年11月，中国地质调查所请他再次调查西南地质，这是他一生地质事业中最全面的一次考察。1929年初组成考察队后丁从重庆出发经贵州到广西边境，而后回到重庆。丁文江除对矿产资源进行大量调查并绘制详细的地质图外，还注意研究该地区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贵州的罗罗，以后他将此行收集的材料编了一本附有汉语译文的罗罗族的书，其中一部

分在他去世后以《彙文丛刻》之名于1936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专题著作丛书的第一卷出版。

1931年,丁文江在北京大学新校长蒋梦麟任内任地质学教授。1931—34年虽是他一生中最为愉快的几年,但他和他的许多同事一样,对日军占领东北后的形势益感不安。1932年春,他和傅斯年、蒋廷黻、胡适等教授组织了一个团体,并于5月22日出版《独立评论》。三年期间,丁文江为《独立评论》写了六十四篇文章,其主要内容是他的旅游见闻,也有几篇是讨论日本问题和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

1933年暑假期间,丁文江去华盛顿出席国际地质学会第十六届大会,归国途中,他又在苏联停留六周。当时美国正开始实行新政策,苏联正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他对这些国家政府进行的大规模计划经济的实验很感兴趣,这些观察使他的观点有所改变,并在1934年写的文章中反映出来。他把早年关于国家需由少数正直有为之士治理的观点同新的“现代独裁制度”的政治理想相适应,主张在强有力的集中领导下谋求国家迅速而系统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只有在统一政府的领导下才能成功,这个政府有一个果断的领袖,而且由有才能的专家掌管,在开明的一心为公的独裁制度监督之下,要根据专业才能选出一批经过科学训练的专家,由他们负责研究、协调、执行科学地重建中国的计划。

可能由于这些想法,使丁文江辞去北京大学的教授职务而于1934年6月应蔡元培之请,继杨铨而任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据胡适说,丁文江认为中央研究院是促进和协调全国的科学研究以协助国家发展的机构。中央研究院的院务会议是用以协调院内各研究所同其他学术机构和政府机关的研究工作的。1935年5月27日,国民政府颁发了院务会议章程,6月20日,全国各主要学术机构的三十名代表被选入院务会议,9月7日,丁文江任名誉干事。

丁文江除担任中央研究院的行政工作外,还协助国民政府筹划开发国内资源,增强国防。当时粤汉路末期工程正在进行,丁作为该路计划人员之一,经常考虑开发铁路沿线湖南的煤矿。他于1935年12月2日从南京到长沙去湘潭县考察谭家山煤矿。12月8、9日夜间他住在衡阳的一家客店里,房间不通风,

室内生了炭盆，9日晨因煤气中毒不省人事，被送进本地医院。一周后转至长沙湘雅医院，终于不治于1936年1月5日去世。遗有妻石秋苑（译音），兄弟六人，其最知名的是1947—1950年间担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的丁文渊。

丁文江在不少领域内从事工作，但以中国著名地质学家闻名。他创办的地质调查所是中国第一个进行近代科学研究的机构，他作为第一任所长，不仅促进了地质学的专业研究，也推动了与此有关的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他和翁文灏、李四光、西方顾问如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法国科学家传教士德日进一起工作，使中国成为新石器时代的一个研究中心，并促成于1927年发现北京猿人头骨。1921年他辞去地质调查所职务后，仍关心它的发展。1929年，他用济民基金协助创办了新生代地质调查实验所，担任了名誉所长，后来又协助设立土壤实验所、燃料实验所、西山地震站。

丁文江除了他在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及其他官方机构的活动外，还在组织一批学术团体和学术出版物的工作中起了领导作用。他是1922年1月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参加编辑出版《中国地质学会志》，同年还筹集经费出版由他亲自编辑的《中国古生物志》，1929年他协助创办中国古生物学会。

丁文江是一个从事实践、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写了不少通俗的和专业的地质学论文，在国内外许多学术刊物上发表。他虽是地质学家，但他和翁文灏、曾世英共同绘编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却是他的最著名的作品。在中国所出版的各种最好的现代地图中，这本地图集既有自然地图又有政治地图，它是依据数千种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地图和地质调查所新发现的材料绘制的。它由申报馆于1934年出版，以纪念《申报》六十周年，因此一般称之为“申报地图”。

在丁文江的非专业作品里，还有一种梁启超的年谱初稿，这是他于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着手编著的，1958年在台湾出版，名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共三册。此外还有两本国内外的游记：《漫游散记》，是有关他在中国内地旅游的札记，《苏联旅行记》记载他1933年在俄国的见闻。这两种游记，都于1956年在台湾列入《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出版，以纪念丁文江逝世二

十周年。

蔡 锷 (1882.12.18—1916.11.8) 原名：根寅 字：松坡

蔡锷，一位干练而有学者风度的湖南籍将领，辛亥革命时期的云南督军。1913—1915年他名义上在北京政府任职，实际上筹划倒袁活动，当时袁世凯已计划实现他称帝的野心。讨袁运动在1915年12月于云南开始，而以1916年6月袁世凯身死结束。

蔡锷是湖南宝庆（后称邵阳）一家富裕农民家庭的长子。十五岁前聘请塾师在家教习，1895年应试生员合格，1897年应举人试未中。

1894—1897年，蔡锷从樊锥为师，受到他维新改良思想的影响。樊锥和长沙时务学堂的教师唐才常（1867—1900）以及谭嗣同很友好。1897年蔡锷进时务学堂后，受该校首席讲师梁启超的影响极深。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失败，9月时务学堂关闭。蔡锷申请进两湖书院但因和维新派有来往而未获允准。

1899年，蔡锷和同学数人，应梁启超之邀去日本。梁启超在东京开设了一所大同高等学校，收容因国内学校关闭而失学的青年，蔡锷进了大同学校，受教于梁启超、唐才常。1900年蔡锷等人回国，协助唐才常准备在汉口起义，被派到湖南新军中劝说军官参加革命。起义为清政府发觉，十八人被处死刑，蔡锷因与新军有联系而幸免于难，于是又去日本进陆军成城学校。此举反映他专心考虑国家实力的问题。

两个互相补充的思想占领着他的脑海：在激烈竞争的世界中中国的落后和衰弱；发展中国实力的迫切需要。在蔡锷的心目中，日本是中国富国强兵的好榜样。1902年的一期《新民丛报》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军国民篇》，集中说明在中国发挥尚武精神的必要。他分析缺乏这种精神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青年在“寻章摘句”的教育制度下耗费了精力和才能；儒家学者如刘向（公元前77—6），朱熹（1130—1200）等人对儒学的歪曲。蔡锷认为这两人实际上是道家；军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中国的文学音乐从未歌颂过尚武精神。蔡锷以钦佩的心情指出，日本的教育制度在学生中不知不觉地培养着一种武士品质，

例如，在美术课中经常叫学生画军舰大炮之类的东西。他还指出军人在日本社会享有崇高地位，文学、哲学、音乐都致力于发展尚武精神，中国必须仿效日本以求自存。从增强国力出发，他还关注政治制度，拥护建立共和制度。他认为，在民主共和国里，全体人民享有无限的权利和义务，因而一切人力资源都可以在争取国家生存的斗争中充分发挥出来，而在一个专制王国中，只有皇帝一人享有这种权利，因而只有他一人具有对国家的责任感。

1902年蔡锷从陆军成城学校毕业和1904年从东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历任江西、湖南、广西、云南各地军职；1904—10年的大部分时间他在广西历任新军随营学堂总理官、广西陆军学校总办、广西讲武堂监督。蔡锷在广西的五年中，准备把原有的部队重新训练成为一支现代化部队，他遇到不少阻力，他的书信给人这样的印象，他认为自己为了国家的利益正与几乎压倒一切的困难进行殊死斗争。蔡锷把一支十分腐化的广西部队整顿就绪，使他赢得了治军严厉的名声。他提拔湖南籍而非广西籍军官，把他们安置在重要岗位上，也引起广西当地军人的敌意。1910年军校学员掀起了驱逐蔡锷的活动，其高潮是省咨议局对他进行弹劾。不久，他被豁免，其时云南都督李经羲已把他请去担任第三十七协协统兼云南武备学堂教官。

1911年春，蔡锷抵云南，受命选编有关军事指挥的重要原理，结果编了一部《曾胡治兵语录》，其中收录了曾国藩、胡林翼的著作。他在所加的评语中，列举了军事领导必须具备的五个品德：智、信、仁、纪、勇。他说曾、胡以不谙军务的文人带兵，其所以能克敌致胜，全在于他们对自己所任职事具有“诚信”。他又征引儒家所说的父子伦常来申述“仁”的含义，把它运用到军队中的上司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上。蔡锷的这些评注是他的著述的典型之作，他的基调和表述方式是儒家的礼教，他对“诚信”和“仁”所作的评注实质上是儒家思想。

1904—10年之间，蔡锷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也未参与同盟会的多次起义。但是，他却和湖南同乡几次起义的准备工作有关系。而且他利用在各省充当训练军官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把一些众所周知的同盟会的活动分子安插在重要位置上。在一定范围内，蔡锷能够和意见迥异的各派合作，这正是他在这个期

间及其以后的活动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他对革命派黄兴和立宪派梁启超所表现的双重忠诚，出自他为人忠诚的强烈个性和自信，作为一个领袖有责任把不同派别会聚在一起的观念。就蔡锷的谨慎含蓄的气质而论，他接近改良派，就他谋求国家富强的信念而论，他同情共和革命派的主张。

1911年10月30日，他率领三十七协推翻了云南的满清统治，以此置身于辛亥革命。云南的起义已经蕴酿了好几年。1908—10年，二十几名云南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回到云南后安插在军队中的重要位置上，而他们又全是同盟会会员。其中有在昆明云南武备学堂当教官的，有在战地部队里当军官的。革命爆发时蔡锷的三十七协是昆明地区一支最大的部队，其中有一名团长，六名营长是同盟会会员、士官学校毕业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消息一传到云南，蔡锷当即召集团、营军官开会讨论部队去向。仅就参加会议的成员来说，云南的革命起义势在必行。10月31日在昆明成立了独立的云南军政府，公举蔡锷为都督。

在新的岗位上，蔡锷不久表现出了他协调军中各派系的出色才能。他长于管理，办事公道，具有分析事变的眼力。蔡锷任云南都督二年之久，1913年夏，他取得调任湖南都督的谅解后在云南辞职。但是袁世凯决定剥夺众望所归又雄心勃勃的蔡锷的军权，不肯下达原先同意的湖南都督的任命，而把他调到北京给了一些位尊而政治上无关紧要的闲职。1913年任蔡锷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和政治会议议员，后一机构是袁世凯于11月4日取消国民党议员的空缺后建立起来，用以决定当时仍留在北京的议员的职责的。翌年，蔡锷任参政院参政，这是一个类似立法院的机构，同时还被任命为全国经界局督办。

当蔡锷洞悉了袁世凯称帝的阴谋后，他就着手倒袁。为了避免袁世凯的怀疑，他放浪形骸，成天和歌妓筱凤仙饮宴、生活在一起。他还公开和妻子刘侠真口角，同她离了婚。趁机将她安全地送回湖南。蔡锷自抵北京后，袁世凯对他一直加以监视，这时终于相信了这些骗局，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使他有相对的自由得以策划逃离北京。蔡锷在北京期间，又常和袁世凯的忠实追随者杨度交往，和他一起在筱凤仙那里饮酒作乐。1915年8月16日杨度请蔡锷去天津劝说他以前的老师梁启超支持袁世凯，其实蔡梁早已取得联系，一起筹划反袁而

为杨所不知。他们的反袁计划又得到云南都督唐继尧的支持，决定以云南为军事行动的基地。他们在天津还商定，蔡锷在几个月间应该继续取得袁世凯的信任，以便云南方面作好反袁起义的准备工作。蔡于是返回北京，一面继续佯为花天酒地，一面考虑革命计划。此时，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开始到达云南支持反袁运动，当蔡于12月逃离北京时讨袁战争的主要准备工作已告完成。

1915年12月19日，蔡锷到达昆明，23日致电袁世凯，要求他明文宣布支持共和制度，24日又以最后通牒致电袁世凯，限他于二十四小时内发表声明忠于民国，并将与帝制运动密切有关的十二人处死。袁不予答复。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联名通电宣告云南独立，明令兴师讨袁。他们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将当地部队组成“护国军”，蔡锷率第一军，罗佩金为参谋长，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为梯团长。李烈钧率第二军，唐继尧率第三军，兼任云南都督。

1916年初，蔡锷率第一军入川南，李烈钧率第二军入广西，第三军戴戡部进入贵州。由于他们进军迅速，袁世凯于3月22日宣布撤消帝制，保留总统职位。此时，贵州、广西先后宣告独立。3月31日在川贵前线签订了停火协定，护国军打算重新集结部队，袁世凯的一些将领，则为他宣布取消帝制所沮，不愿继续作战，但是，双方仍未从根本上达成妥协，因为独立各省的领袖们坚持袁世凯辞去总统之职，由黎元洪继任，并恢复1913年国会。1916年4、5月间，粤、川、浙、陕、湘、闽，以至黑龙江都宣告独立。

袁世凯拒不辞去总统职位。1916年5月8日在肇庆成立了军务院，作为袁世凯退位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前的合法政府。军务院以唐继尧、岑春煊、蔡锷、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吕公望、龙济光、汤芑铭、李烈钧、戴戡、罗佩金、李鼎新、刘存厚为抚军，互选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章士钊为秘书长，李根源驻上海，为北上讨袁各军联络官，外事代表唐绍仪、王宠惠、温宗尧，上海代表范源廉、谷钟秀、钮永建。6月6日，袁世凯身死，黎元洪继任总统，7月14日军务院自行撤消，蔡锷首义的反袁运动结束。

1916年7月6日，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七月底，蔡锷抵成都就

职，两周后因喉癌病重，辞职去日本治疗，1916年11月8日在东京去世。

蔡廷锴

蔡廷锴（1892.4.15—1968.4.25），十九路军军长，1932年在上海英勇抗击日军而闻名世界，1933年底参加福建事变反对南京政府，1949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担任过许多职务。

蔡廷锴生在广东罗定，是蔡天民（译音）四个孩子中的第二个，蔡天民是农民，当过裁缝、草药师、风水先生。因其父相当开明，1901—3年蔡廷锴就上学读书。1904年，他母亲去世，父亲再娶，蔡也不再上学，从事田间劳动，做裁缝，使他父亲有更多时间经营中草药业务。1908年，蔡十六岁时和彭惠芬（译音）结婚（1937年去世），有子二人绍昌、绍会，女二人绍璐和绍明（以上均为音译）

蔡多年来都想从军，1910年入伍，但不到几个月就离去，也未再应征参加其他部队。1911年，父亲去世，蔡投入当地革命军的一支小部队，1915年投入驻于桑罗的部队，该部企图举行反袁支持国民党革命派，事败后蔡回家乡。1919年楼江圩群众组织民团防备匪患，举蔡为副指挥，后改编为正式军队，蔡任排长。1920年被送去广州进军校受正规训练。毕业后，在粤军第一师陈铭枢指挥的第四团当军官，1923年提升后离开该部，转入孙逸仙大本营特别警卫团所属团邓世增指挥的第一营，邓升为团长后蔡继任为营长。

1925年国民革命军成立时，粤军改编为第四军，军长李济深，蔡所属的团改编为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师长陈铭枢。1926年北伐开始时，第十师为进攻武汉的先锋部队之一。武汉三镇攻克后，北伐第一阶段宣告结束。接着国民革命军进行改编，陈铭枢任十一军军长，下辖十师，新二十四师，分别由蒋光鼐、戴戟任师长，蔡为新二十四师副师长。1927年宁汉分裂时，陈、蒋、戴均离职，于是由张发奎任十一军军长，蔡统率第十师。

1927年夏，宁汉关系恶化，双方几乎要开战。当时唐生智为武汉政府的总

司令，任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司令，下辖四军、十一军、二十军，东向南昌进发。8月1日，共产党人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二十军军长贺龙，会同朱德举行南昌起义，此举以后就作为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诞生节日加以纪念。几天后，张发奎部队进军逼迫他们撤出南昌，他们把蔡廷锴也带上走，蔡设法逃走，率十一军一部进入福建。经他恳劝，陈铭枢再任十一军军长。

192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蔡率部在海南岛剿匪。1929年粤军改编，蔡任六十师师长，蒋光鼐任六十一师师长。1930年，参加击败张发奎、李宗仁部队后，这两师军队被调到华北参加反对阎锡山冯玉祥北方联军的战争。十九路军在这时建制，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1931年十九路军参加国民政府在江西的第一次反共“围剿”。当时，蒋介石在南京软禁胡汉民，陈友仁、孙科、唐绍仪、汪精卫等政见不同的国民党领袖在广州成立分裂政府，并有陈济棠、李宗仁的武力支持。南方政府要求十九路军给予支持，该军虽有奉命与旧战友老四军作战的可能，但仍拒绝支持南方政府而忠于南京。1931年9月，日军侵占沈阳，内战得以避免，并导致广州政府的解散，十九路军被调到上海担任城防任务。

1932年初，蔡廷锴突然闻名世界。1月28日夜间，日本海军陆战队袭击上海，十九路军面对巨大困难坚守阵地三个多月。在此期间，世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十九路军及其领导者身上，物资和捐款从各国蜂涌而来。1932年底，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蔡廷锴任总指挥，蒋光鼐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同年底蒋光鼐任福建省主席，蔡继任绥靖主任。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后在福州成立了反对派政府，主使人是陈铭枢，十九路军的将领表示忠于他们的老上司。蔡廷锴虽对此举不十分同意，但仍在十一人政府委员会担任委员，同时任第一方面军（扩大的十九路军）总司令。福建政府要求建立全国的民主政府并实行抗日。因为周围一些省主席甚至中国共产党人都拒绝给予支持，国民政府遂轻而易举地镇压了福建事变。1934年1月，福州政府瓦解，十九路军残部退到广东由陈济棠收编，二月，大多数福建事变的首领逃到香港。

福建事变的失败并未损坏蔡廷锴个人声誉，在华侨中尤其如此。1934年4

月，蔡廷锴离香港周游世界。他搭乘意大利的船只在新加坡、檳城、科伦坡、孟买、苏伊士、开罗、威尼斯逗留，到处都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他在罗马受到墨索里尼的接见并应邀参观军事设施。以后又去日内瓦、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巴黎、伦敦。八月，他去美国，逗留一百六十天，访问城市六十三处。他所乘的船只于8月28日到纽约时，受到了三千多人给予的凯旋式的欢迎。30日，在纽约大旅社举行盛大宴会。蔡在美国访问的主要城市有波士顿、芝加哥、费城、华盛顿、底特律、洛杉矶、旧金山。他于1934年11月4日到旧金山，1935年2月5日离去。以后，他又经檀香山到了澳大利亚、斐济群岛和新西兰。他于3月9日到墨尔本，在澳大利亚逗留一个月，又经菲律宾到香港，在香港逗留十二天。他于1935年4月19日到香港，恰好为他出国时的一年零一周。

蔡廷锴在旅行期间，多次应邀作公开讲演。他很有吸引听众的本领，例如，他在美国时，接待他的主人大多都是广东人，他就全面地谈了华侨的爱国热情和慷慨捐输，并强调指出十九路军中的战士都是广东人。又如，在菲律宾时，当地中国居民大都来自福建省，他就向他们表示歉意，未能为福建人多谋福利，他努力说明福建的分裂运动是强加在十九路军头上的，而当南京方面施加军事压力后十九路军就立即撤走。他解释说，如果当时不这样做，福建人民势将在战争中遭受生灵涂炭之害。

他在回香港之后，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组成了一个新的政党中国人民革命同盟，以李济深为主席，重要成员有冯玉祥、徐谦、陈友仁。他们还出版《大众报》，在报上刊登了政纲，要求抗日和“推翻卖国政府，建立人民国家”。1935—36年间，蔡廷锴把自己的时间用于发展该同盟的工作和研究学问。

1937年，蔡廷锴去菲律宾旅游，当他得悉中日战争爆发后，即于7月22日回到香港。他不久应蒋介石之召到南京任蒋介石行营参议，蔡、李、陈、蒋认为动员国民抗日的任务已完成，决定解散中国人民革命同盟。

1937年9月，蔡廷锴的夫人在香港去世。同年底，他又遭遇严重车祸被送去香港治疗，他在那里无所事事直到1938年中。此后他作为广东自卫军的一名领

导成员去广东西南部进行活动。1939年1月，蒋介石请他去重庆，任命他为驻广西的第十六集团军副司令。7月，他和罗西欧结婚。9月，任十六集团军司令。1940年4月任两广边境司令。不久，他发现他的军队不知何故被调走了，他自己成了一个无兵司令，于9月辞职。1940年底，他在军事委员会任职。1941年他出访香港，遇见了陈友仁和孙逸仙夫人。不久，他退休住在桂林，除偶尔去云贵外，一直住了三年。1944年底，回罗定老家，1945年战争结束时迁到广州。

1946年，蔡廷锴参与组织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会员大都是对国民政府持严厉批评态度的一些国民党前军官。这一团体后来并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是李济深、蔡廷锴成为副主席之一。1948年9月，蔡廷锴离香港去东北，1949年2月到达北平，1949年9月作为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蔡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他是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54年、1958年他作为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升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8年4月25日在北京去世。

蔡廷干 字：耀棠

蔡廷干（1861—1935.9.29），海军军官，袁世凯的多年伙伴，1927年前在北京历任条约司、海关及其他外事职务。

蔡廷干自称河北大兴人，却出生在广东香山（后中山县），他在本地学堂上学读旧书，1870—71年进了容闳在上海办的经理留学事务所预备学校，1873年毕业后，参加中国教育考察团，作为第二批三十名留美学生之一赴美留学。

蔡廷干到美国后进了康涅狄格州哈德福语文学校，后又进了新不列颠高等学校，住在马萨诸塞，斯普林菲尔德麦莲太太家里。他调皮生事，被同学们称为“好斗的中国人”。经由麦莲太太要求，他在毕业前就调到罗沃尔的机械厂里学技术。为了操作方便，他剪去了辫子。1881年，清政府认为留学生过分美国化忽视学习中国的东西，取消了中国教育考察团，蔡廷干遂回国进了李鸿章

办的塘沽水雷学堂。1882年后，他除了学鱼雷的理论和实际知识外，又在美、法教官指导下学电机、采矿、测量。1884年，他学了这些基本课程后，又在李鸿章创办的羽毛未丰的北洋舰队英国军官手下学习航海。

1888年，蔡二十七岁时，在舰队当了一名小军官，翌年升为中尉。1891年受任指挥一艘鱼雷艇负巡弋之责。1892年受任正式指挥员，并赏给花翎顶戴，率一支新建鱼雷艇队驻旅顺，1894年9月，参加黄海大战时表现出色。当时丁汝昌率领的中国舰队吨位多于日军司令伊东祐享的舰队，但因指挥无方，又因慈禧挪用海军款项作他用，舰队受挫，结果日军大胜。中国舰队损失五艘舰艇，损坏多艘，受伤舰只驶入旅顺修理时，蔡廷干的鱼雷艇队负责护航。

中国舰队经临时修理后，驶往威海卫驻守，该地防御严密，港口外有两个设防的岛屿作为屏蔽。1895年1月底，日军大山岩将军率部由陆地攻占了丁汝昌防地对面的要塞，丁的部属拒不突围，最后当他决定投降时，部属又拒不炸毁军舰。当时整个舰队哗变，管带王登瀛率领十艘鱼雷艇于2月7日从西码头突围。这些鱼雷艇中有蔡廷干指挥的一艘，它们遇到中国舰只和陆地要塞的炮击，又被日舰尾追。王登瀛设法到了烟台，蔡的那艘鱼雷艇却被击沉，他本人为日军捞救被俘，2月13日，丁汝昌命威海卫剩余舰只投降伊东，本人服毒自杀。

中国在中日战争中惨败并订立马关条约后，李鸿章受到申斥，北洋舰队海军官员包括蔡廷干在内，都降了职。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被黜的海军官员被袁世凯收容，用来在北方建立新军。蔡廷干经唐绍仪介绍，入袁幕府，日见重用。1908年袁世凯奏清朝廷将海军官员复职，获准。

1909年，袁世凯被迫退隐，蔡亦随之退出公众生活。1911年革命时袁重新上台，蔡迅即被任命为海军部军制司长，领少将衔。袁到北京后，12月蔡候补三品京官。1912年1月，蔡任袁的海军副官，协助袁逼清室退位并在北京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蔡因效力而于1912年11月20日提升为海军副司令。

1913年初，蔡获四等勋章，任盐务稽核总所总督，10月1日任税务处会办，并在总统府承担许多差事，尤其是接待外国来宾方面的事宜。1914年5月，他在总统府的地位由非正式变为正式，获得了总统府副礼官的头衔。

1916年6月袁世凯身死，蔡因与袁关系密切政治生涯一度受挫，但到了1917

年10月，段祺瑞却授以二等宝光和乐章，1918年任命他为关税修订委员会主任，1918年底回总统府任职，领副大礼官衔。1919年1月任敌国国民遣送事务局会办，这个职务所担任的差事使他放弃了礼宾方面的工作。

1921年，蔡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华盛顿会议。按照会上达成的协议，3月底在上海召开关税修订会议，蔡任会议主席，9日签订协定，修订税率，于翌年一月施行。1922年底，蔡任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婚礼礼官，其任务是向溥仪夫妇引见外国来宾。在此期间，他与北京外交使团保持着密切关系，他的官方职责也涉及一些外交事务。

蔡廷干还参与公共事务，1919年4月他出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翌年任华洋义赈会运输处长，1923年1月任财务处长。1924—1925年任北京扶轮会会长。他还多年担任中国赴美国留学生会会长。

1923年修订关税工作基本结束，蔡成为整理国内外债务委员会的成员。6月30日，被任命为筹备特别关税会议委员会的主任。1924年秋任税务处督办，尽管北京政府几次改组，蔡任此职二年有余。1925年任调查上海五卅事件的三人委员之一。1925年10月26日，特别关税会议在北京开会，蔡任代表之一，但由于冯玉祥和张作霖吴佩孚双方开战，会议工作无法进行。1926年春，中国方面的五名代表，只有蔡廷干，顾惠庆仍在北京。7月3日，外国代表团因会议受挫发表声明，提出在中方代表认为合适的时候重开此会。

1926年6月，杜锡珪继顾惠庆为内阁总理，7月6日，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他任命蔡廷干为外交总长。7月14日发布文书另聘关税会议代表团，以蔡为团长。但蔡立刻遇到新的困难，因为北京政府的权威受到冯玉祥反对，也为已开始北伐的广州国民政府所反对。会议因中国方面无负责的政府而实行“夏季休会”，但到秋天仍未复会。蔡廷干作为外长继续致力于修订条约的工作，但北京政府软弱无力的状况使外交谈判无法进行。

吴佩孚深陷在南方战线，张作霖的武力和影响控制了北京，1926年10月初，杜锡珪辞职，蔡廷干也辞去外交总长。顾维钧任代总理兼外交总长，担任出席原先停开的关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蔡此时仅保留了税务督办的职务。1927年5月，北京政府发生财政恐慌，蔡辞去他的最后一个官职去大连隐

退，一直住到1931年9月沈阳事变发生。此后他回到北平，把注意力转向读中国古书、作诗、写字，将《道德经》和中国古诗翻译成英文。他英译的唐诗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32年出版，题名《用英文韵脚翻译的中国诗》。1935年9月29日，蔡廷干死在北平。

蔡元培 字：鹤卿 号：子民

蔡元培（1868.1—1940.3.5）清末最后一个翰林，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很大影响。他是民国初年著名的自由主义教育家，中西文化的综合论者。清朝覆亡后，1912—13年，他任教育总长，1916—2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是中央研究院的创始人和院长。

蔡元培，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他的祖、父都是商人，父亲蔡光普经营的钱庄生意兴旺。蔡光普生性慷慨，乐于济助亲友。1877年去世时，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蔡元培是次子，时年十一岁）情况困窘，生前受惠的几个亲友商议集资教养蔡家孤儿，但蔡元培的母亲周氏婉谢了。她勤俭治家把几个孩子养大成人。蔡元培继承了他父亲慷慨助人的德性，又继承了他母亲自力更生的精神，这对他今后个性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蔡元培六岁时就开始读中国古书，由他的举人伯父蔡明恩教授，他伯父又有很多藏书可供侄儿阅读。1883年蔡十七岁时成秀才，1889年中举人，1890年参加京试中进士，是同年最年轻的中试者之一。1892年入翰林院，1894年授编修。在此期间，他与浙江同乡张元济友好。

蔡元培京试中式又进入翰林院，是一个惊人之举。1883年他成秀才后就对八股文章不感兴趣而专心攻读那些与科举无关的文史书籍。进翰林院后仍乐此不倦，而成为当时最博学多才的人士之一。

1894—95年中日战争时，中国惨败于日本之手，1898年变法失败，这对蔡的一生影响很大。他认为教育落后是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他遂辞职回浙江从事教育，在绍兴长期担任采用近代课程的中西学堂校长。当时学生中有个蒋梦麟，后来成为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同事。1901年，蔡元培离开家乡到上海，在

官办的南洋公学教书，校长是张元济。当时的学生有黄炎培、邵力子，同事中有吴稚晖。1902年，吴稚晖和广东的官费留学生去日本，因驻日公使拒不介绍吴所照应的几个学生入军校而与公使发生冲突，在吵闹中吴稚晖被日本当局拘留，日方准备将其驱逐出境。吴企图自杀为日本警察所救。蔡元培当时趁假期去日本旅游，于是提前回国并自愿陪吴回上海，以确保吴不再自杀。

1902年8月，蔡回上海后参与组织中国教育会，任首任会长。这是一个反满的革命团体，领导人中有章炳麟、黄炎培、吴稚晖等人。不久教育会又成立爱国学社，主要是收容被南洋公学开除出来的学生，同时又成立了爱国女学，由哈同夫人资助。女校与教育会也有关系，因蔡元培等人曾在该校执教，蔡还一度担任该校校长。女校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活动，所以未遭当局压制，并终于成为上海有名的女校之一。

1903年，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发生争论，蔡厌恶这些琐碎的纷争，离职去青岛。上海发生革命报纸《苏报》一案，蔡也被当局列名为第一批通缉的对象。同时发生的这两件事引起谣传，说蔡是为了逃避麻烦而去青岛。其实，他当时几乎立刻就回到上海，并参与创办《警钟日报》，这个杂志被人们目为是继《苏报》、《国民日报》进行反满宣传的。

1904年秋，江浙两省，特别是浙江一带爱国青年组织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光复会，蔡参与创办并当选为首任会长，其他首领人物有章炳麟、陶成章、秋瑾、徐锡麟。光复会是继孙逸仙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而起的第三个大规模的革命组织。这三个团体的大多数成员于1905年8月在东京合并组成同盟会。蔡任同盟会上海支会会长，负责发展新会员。

清末的几年中，蔡没有参加实际革命活动。1906年他到北京希望能获得官费出国留学。他发现大多数官费生都是去日本的，而他却想去欧洲，于是就去译学馆当了一名教师。1907年孙宝琦出使德国，同意每月补助蔡三十两银子，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人张元济又答应对他的翻译工作给予一些报酬。蔡到了德国，在柏林学习德文一年，1908—1911年进了莱比锡大学，听哲学、文学、人种学、欧洲史、实验心理学、理论学等课程。

1911年11月，蔡回国，正是武昌起义不久的時候。1912年1月，孙逸仙任民国

临时大总统，委蔡为教育总长。孙辞职，袁世凯继位，派蔡元培、汪精卫为代表去北方请袁到南京就任，但袁坚持将政府迁往北京。在以唐绍仪为总理的第一任内阁里，蔡仍任教育总长。袁唐不和，导致唐于1912年6月辞职。蔡又去德国进莱比锡大学就读一年。1913年，蔡回国，因二次革命反袁失败感到灰心，又去欧洲。

蔡先在德国，后去法国，和李石曾、汪精卫、吴稚晖等人筹划中国青年到法国留学。1915年他们在巴黎成立中法教育会，以蔡为中方会长，实行工读计划，约有二十名中国学生参加。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的这次逗留，使他脱离了国内的政治动乱，在智能上趋于成熟，他抽时间写了一篇哲学原理大纲和关于康德伦理学研究文章，他又有足够时间与张人杰、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恢复交往，以后，这四人被称为《国民党四元老》。袁世凯死去由黎元洪任总统后，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一任命，引起国民党内部的争论，党内许多领袖人物认为蔡就此职等于是背叛革命队伍，而孙逸仙却同意这一任命，他认为像蔡元培这样既有实际经验又有卓越学识的学者，是在北方宣传共和革命思想的理想人物。

蔡元培1916—1926年在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期间，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既有新思想的酝酿，又有近代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革思潮的兴起。北京大学在这个实验和转变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蔡元培的领导，他对独立思考 and 创造性试验精神的坚持，他对年轻有为人材的鼓励，使该校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高等学校。他通过发表主张和树立榜样在北京大学建成了一种气氛，鼓励师生争取成为第一流的学者，允许教师中的异端思想和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北京大学成了五四运动的中心，在那里李大钊、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等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发生了兴趣。蔡元培个性温和，但当问题涉及道德和伦理原则时，他却是不肯妥协的。例如，1919年五四运动后学生领袖在北京被捕，他就离开北京去杭州以示抗议当局对学生的迫害。北京当局迫于舆论释放学生后，他于9月回来复职。

蔡元培在名牌大学当校长任内，曾多次出国，1920年11月，由教育部委派去欧美考察教育，同行者有前去考察司法的罗文干。蔡在法国，获得巴黎大学

名誉博士学位，他和罗访问了西欧几个国家，1921年7月他们去美国，获得纽约大学名誉学位，又为北京图书馆建馆进行募捐，回国途中，在檀香山参加了太平洋教育会议。

1922年11月，北京政界相互争斗，结果财政部长罗文干以贪污罪名被捕，蔡再次离职以示抗议，在苏州住了一阵后于1923年又去欧洲，在布鲁塞尔住了一些时候。1924年，他在比利时、法国和李石曾、吴稚晖从事中法文化交流工作，1925年去德国，进汉堡大学研究人种学。蔡元培因身在欧洲未参加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改组党的活动，但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1926年2月，蔡收到教育部电报催他回校，他离校期间，由蒋梦麟代理校长。他回国后得悉北伐已从广州誓师，就参加了苏浙皖联合会，该会是动员人们支持北伐的。同年冬，他去宁波参加该会的一次会议，发现浙江形势危急。于是，他逃往福州，住了几个月。1927年国民党内部宁汉分裂时，蔡站在同乡蒋介石一边，参加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同时在南京任代理司法部长，以后他当了一名国民政府委员。1928年秋，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孙逸仙规定的五院制，蔡任监察院长，不久辞职，

1926年后，蔡虽未回任北京大学，但他在国家事务中的主要活动仍是接和高等教育有关。1927年，蔡任替代教育部的大学学院院长，这是法国的制度，由久居法国的张人杰、李石曾、吴稚晖所建议采用的。这个制度规定在全国分设大学区，以北京、江苏、浙江为先例，经一年试用，发现这个制度在中国不适合，遂于1929年取消，仍恢复教育部。

1928年初，蔡元培参与创立中央研究院，作为国内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中 央研究院，在蔡任院长期间，对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做了不少工作，它的一些研究所得国际公认。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铨，是一个在美国留学很有才能的行政工作者，他在政治上很活跃，是1932年组织中国民权大同盟的重要人物，这个组织得到孙夫人宋庆龄和其他著名人士的支持。蔡元培对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也很积极，1932年曾同别人联名要求释放他的旧同事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但未获成功。1933年6月，杨铨在上海被刺。此事对蔡的影响是，他经过反复考

虑，于1935年辞去一切官方职务，发表公开声明，谴责南京当局实行的政治思想控制。

蔡离开公众生活后，1936年在上海患病，1937年中日战争发生后，蔡并未和国民政府一起西迁，一方面是因为身体不好，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对南京的政策不满。1937年底，他去香港，1938年2月，他全家也到了香港。他在一生的最后几个月瞒名隐居，只在香港大学副校长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上公开露面一次，当时他被邀作了一次演讲。他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1940年3月3日又遇到一件家庭事故促使病情加重，他立即被送往医院，但两天后就去世了。

蔡元培结过三次婚，前妻王氏在1898年去世，1901年续娶江苏名门之女黄仲玉，她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妇女。她于1921年在北京去世，当时蔡正在欧洲。1923年7月1日，他辞职在浙江时与前爱国女校学生，著名教育家周琼（音译）结婚。蔡元培死时遗下妻子和四个儿子，长子蔡无忌学农业兽医，曾任上海商品检验局长，其他三个儿子是柏龄、怀新（音）、英多，女两人：威廉留学法国学艺术，1939年去世，眸安

蔡元培1928年前作为著名的自由主义教育家，表现了身体力行和为人正直的品德，他出身于旧制度之下，是中国旧文化的著名学者，又具有近代西方学者的独立探讨精神。他对哲学尤感兴趣，热情阐发伦理学，著有一本简明扼要的《中国伦理学史》，于1931年出版。同年，他又为陈衡哲编的《中国文化论文集》撰写有关绘画和书法的一章。蔡元培是儒家制度的产物，但他批判了儒家学说的形式主义，鼓励北京大学学生对儒家的基本著作进行批判的研究。作为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对民国时代的高等教育有很深的影响。

曹汝霖 字：润田

曹汝霖（1876—1966.8.4），北京政府亲日派官僚，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主要抨击对象之一。

曹汝霖生在上海，附贡生曹豫材的儿子，早年就熟读儒家经书，十三岁时

开始学法文。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他认为旧教育制度不能解决中国的新问题，遂停止学习中国古书，进了武汉湖北铁路学堂。1897年与王梅龄结婚，两年后，去日本留学，先后进东京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法律。1904年回国，通过了专为留学生举行的特科考试，中进士，授六品奏任官主事。1905年，充任农商部候补（见习秘书），京师大学堂（后为北京大学）法学讲师，他还参加了设立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馆的工作。1905年11月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来北京谈判有关东三省事宜，曹汝霖因曾在日本留学被调到外务部充任见习秘书。日俄战争后举行的朴茨茅斯条约谈判期间，曹汝霖以中国代表团随员身份参与谈判，结果中国方面接受该条约有关领土问题的规定。12月22日中日签订协定，允许日本在沈阳和东北其他城市设立租界。此后，曹汝霖开始置身于国际外交界，不久提升为外务部秘书。

曹汝霖是学法律的，因此他很自然地参与1909年各省諮议局的设立和1910年国会的召开。在此期间，他被派去东三省勘察1905年中日协定所规定的地区的“恢复”情况。他向清廷提出了治理东三省的详尽建议，大都为清政府接受。大约在1910年他被递升为外务部副大臣。

1911年辛亥革命和民国政府成立后，曹汝霖当了袁世凯的私人秘书。1913年新国会在北京召开时，曹汝霖作为代表蒙古的议员出席。他是进步党的成员，该党支持袁世凯同国民党作斗争。7月，他被指定为起草宪法的六十人委员会委员。8月，被任命为外交次长。1914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进占青岛，占夺德国在山东的各项特权。曹汝霖充任孙宝琦的副手和日本谈判。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孙宝琦辞职，陆征祥继任外交总长，他在5月25日签订了二十一条，但这次谈判的主要当事人是袁世凯和曹汝霖。因此曹、陆同遭舆论谴责而提出辞职，袁世凯不予接受。

1915年夏，在袁世凯阴谋称帝的活动中，曹汝霖给予支持。10月，袁世凯给他一个头衔使他实际上具有外交总长的地位。12月，他成了筹委会的成员。袁世凯称帝阴谋失败，1916年3月曹汝霖转而向段祺瑞求助。4月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负责组阁，以曹汝霖为交通总长。5月，陆征祥辞去外交总长，由曹汝霖代理。6月袁世凯身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曹汝霖失去了内阁职位，

暂时隐退。

1916年秋，曹汝霖向段祺瑞提出了一项用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因而得到了段的信任。按照这个计划，曹汝霖准备通过当时的驻日公使、他的同学好友章宗祥的关系，从日本政府取得大宗借款，以加强段的军事力量。段祺瑞任命曹汝霖为官办的交通银行总理，与前任驻日公使陆宗輿一起主管交通银行，以此作为取得日本援助的渠道。

1917年1月，日本三家银行组成银行团订立五百万元借款合同，并以交通银行增设日本顾问为条件。但这笔借款并不是主要的，段祺瑞的整个计划是，中国应该对德宣战，北京政府可以由此转向东京方面借得“战争借款”建设北洋军队，进而实行武力统一全国。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2月，曹汝霖参加了段祺瑞组织的“欧事研究会”，该会名义上是为了研究与世界大战有关的中国方面政策问题。段祺瑞通过这类团体对国会施加压力，同时通过曹汝霖和日本政府继续秘密谈判。

日本领导人觉察到北京方面的情势，可能对他们有利，3月初派出了寺内内阁私人代表团，由西原龟三率领到达北京，商讨财政援助事宜。据陈友仁在当时英文《京报》上所作的揭露，曹汝霖要求借得一亿元，以及要求军火、军训官员、兵工专家的援助。

1917年5月底段祺瑞免职，黎段之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久张勋复辟，总统黎元洪辞职，段祺瑞于7月间重新上台。7月17日段祺瑞重新组阁，任命曹汝霖为交通总长。段立即对德宣战，9月，商定第一次西原借款。11月，段祺瑞被迫下台，但仍拥有实力，因而曹汝霖得以继续控制交通部。1918年3月，段祺瑞再次出任国务总理，要曹汝霖兼任代理财政部长，此时，曹的地位已经巩固，成为新交通系(以别于梁士诒的旧交通系)的头目，同时又是徐树铮3月发起组成的“安福俱乐部”的主要角色。9月，又与日本商定了四笔借款，与前几次借款合在一起，据日本方面资料记载，西原借款总额达一亿七千七百万元。由于借款谈判的秘密性质，而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又宣称并无此项借款的任何文字记载，所以借款的确实总额恐怕永远搞不清了。事实上，借款也从未贷付给中国。

北洋政府为了取得这些借款，向日本作了重大让步，允许日本在华开矿，设立银行，建设铁路和电信系统以及由日本提供军事设施和实行“复兴计划”等。此外，1918年9月24日，驻日公使章宗祥在与日本方面换文中发生了一个不幸的疏忽，声称对日本提出的关于日本在山东地位的要求，“中国政府欣然同意”。

1918年10月，曹汝霖被任命为币制局总裁，以陆宗輿为副总裁。他于是辞去代理财政总长之职，但留任交通总长。1919年1月他辞去币制局职务。当时，巴黎和会召开会议，对如何处理山东问题与中国关系极为重大。会议进行中，中国对日本方面所作的让步公诸于世，情况表明，中国方面不能摆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的要求。这些情况的暴露激起了中国公众的愤怒。曹汝霖成了众矢之的。4月30日，章宗祥到北京寓居于曹汝霖家中而并不回自己家里，更引起公众的怀疑，北京学生起而组织抗议行动。五四游行开始时相当和缓，但当示威游行队伍经东交民巷受阻后，游行队伍中有人冲向曹汝霖住宅，他们认为曹、章、陆三人正在秘密开会。游行者高喊“严惩卖国贼曹、陆、章”的口号。学生冲入曹宅，陆宗輿并未在场，章宗祥被打昏，曹汝霖跳窗逃入使馆区。曹汝霖住宅被焚，一些学生则被捕。逮捕学生之举激起了公愤，导致五四运动的开始，由于公愤有增无已，5月10日，“三个卖国贼”被免职。

曹汝霖退出政界后任汇业银行董事、实业银行经理。1922年1月，被任命为实业促进会特别委员，6月，因黎元洪再任总统而去职。以后，他就致力于营商谋利了。中日战争期间和国共内战期间，曹汝霖一直住在北平。1949年去台湾，和他的女儿在台北住了一年，又在日本住了七年。1957年10月他去美国和他的幼女住在一起，1966年8月4日，曹汝霖死在美国密执安州的底特律市。

曹 锴 字：仲珊

曹锴（1862.12.12—1938.5.17），北洋将军，1916年任直隶督军，1920年任直鲁豫巡阅使，在吴佩孚支持下，1920—23年当过直系头目，1923年10月到1924年11月在北京任大总统。

曹锴是天津一个贫苦人家的第三个儿子，年轻时当卖布小贩，据说他在河南项城做生意时就成为脾气暴躁的年轻人袁世凯的酒友，约二十岁时加入淮军当兵，以后进了天津武备学堂，1890年毕业后留校当教官。1894—95年中日战争时，在宋庆部下在朝鲜、东北服役。战后，袁世凯新建陆军，在小站练兵，曹去那里，参与军训工作。义和团事件后，跟随袁世凯去保定新军总部，在部队中迅速得到提升，1901年升为帮带，1902年升为管带，1906年任长春北洋军第三镇统制。

1911年10月民国革命发生后，袁世凯调曹锴第三镇到北京警卫京师并据以挟制清廷及革命党人。1912年2月底，革命党代表想护送不愿南下的袁世凯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曹由袁指使在其纪律良好的部队中制造了一次“兵变”，这次骚乱被用来说服革命党的代表，袁必须留在北方维持秩序，应该让他在北京就总统职。

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曹任长江上游总司令，率第三师进驻湖南岳州。1915年帝制运动形成高潮时，袁授曹一等伯爵位。蔡锷兴兵反对帝制。1916年1月5日，曹受命率部沿江上溯进入四川，然后南下进击蔡锷军，当时蔡军正从云南北上。两军在川滇边境打成相持局面。1916年6月，袁死，战事结束，曹率第三师回其常住地保定。

1916年9月16日，曹任直隶督军，他既拥有首都所在省军事首长的地位，又有北洋军队中训练有素的一支军队，于是成为北方的有力首领。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逐渐分裂成不同派系，互相争逐军事和政治利益。在皖系和直系之争的初期，曹属于直系。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他的行动是以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来决定的。在多数情况下，支持皖系头目、当时的北京权势人物段祺瑞。1917年7月，曹和段等北洋首领反对张勋复辟，曹部在此次战役中出力很多，段任

他为直隶省长作为酬劳。后来，段祺瑞和代理总统直隶首领冯国璋争夺政治权力，曹努力和双方保持良好关系。1917年12月，在天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曹及其他督军决定出兵攻打已占领湖南大部的广州军政府派出的护法军。曹锟为总司令，由湖北进军湖南，张怀芝率二路军由东进击湖南。1918年2月，曹令第三师及其他部队南下，迁司令部于汉口，在两个月内，他的部队攻占长沙，并进抵湘南衡州。

这时，曹锟和段祺瑞皖系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令人注意的变化。曹原是段祺瑞的以武力统一全国的主张的坚决支持者之一，忽然对战争不感兴趣并对北京的段政府表示冷淡。曹锟态度上的这种变化部分原因是他怀疑段的副手徐树铮在秘密活动要免掉曹的直隶督军之职，另一个原因是他的老部下吴佩孚的态度，吴在湖南作战时担任第三师前敌司令，表现出色，吴认为他的战功没有得到段政府应有的赞赏，遂下令部队停止作战。由于害怕武力统一的计划失败，徐树铮和段祺瑞先后到汉口去安抚这两个指挥官。为重新取得曹的支持，段封给曹这样一个响亮的头衔：川粤湘赣经略使，并私下允许他回京后担任副总统之职。这些姿态并不能使曹满意，5月底他把司令部迁回直隶，从而使段祺瑞扑灭南方军队的希望落空。

曹段的关系又由于吴佩孚日益独立的行动而更为紧张。1918年夏，吴佩孚仍为第三师代师长，他发表谈话，口头攻击北京政府，引起段的恼怒，段向曹施加压力要他约束其不守规矩的部属。曹发现自己处境亦很困难，因其主力第三师远在湖南，由其部下吴佩孚率领，而吴的行动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此后两年之中，段祺瑞及其部下努力加强皖系军力，曹锟在直隶的地位变得不稳固了。为了同段的军力相抗衡，他促成奉系张作霖和直系的合作。直系当时拥有长江流域的几个督军：江苏的李纯、湖北的王占元和江西的陈光远。约于此时，吴佩孚从湖南撤军北上支持在直隶的曹锟。1920年7月13日，曹锟和张作霖宣布驱逐段祺瑞及其政府出北京，两天后，直皖战争开始，7月18日段祺瑞军被击败，皖系溃退。

直系胜利，曹锟成了无可争辩的首领，1920年9月2日他出任直鲁豫巡阅使，确定了他在华北的权威。不久，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的个人对立又形成了

直奉之间的权力斗争。在这场争斗中，与其说曹锟，不如说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曹锟并不愿意向张作霖在华北扩展影响进行挑战，但是他在军事上又几乎完全依靠吴佩孚的支持，所以不愿违拗吴佩孚。但是，由于张作霖不断侵入他在直隶的势力范围，因此曹锟对张的态度也由妥协而变为强硬。1922年4月，曹锟加入吴佩孚等直系军阀反对张作霖进军华北，5月初，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吴佩孚率部击败张作霖，迫其退回东北。

张作霖失败，北京政府和华北大部分地区落入直系之手。为了达到他们公开宣称的和平统一中国的目标，他们认为，作为权宜之计可以同意恢复1917年国会和1912年约法。他们还同意北京和广州的两个大总统徐世昌和孙逸仙同时下台，以便选举统一的国民政府的新总统。1922年6月2日，徐世昌辞职（孙逸仙于同月晚些时候被陈炯明部下逐出广东），曹锟和其他直系军阀请黎元洪于6月11日再任总统。9月，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政策，王宠惠的“好人内阁”在北平成立。

1922年秋，直系内部意见分歧开始出现，曹锟早就觊觎北京的总统职位，认为这是实现其野心的时机。吴佩孚则认为目前政府应维持到和平统一的实现。其他各派则努力加剧曹吴之间的关系。甚至直奉战争之前，直系已形成了两个中心，一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吴佩孚，一是以天津和保定为中心的曹锟。由于吴的权势开始超过他的名义上的上司，曹锟一派的人对吴在直系内部势力的伸张感到不满，对吴的政策已公开表示不能容忍，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刁难黎元洪及“好人内阁”。曹锟及其同伙成功地以捏造的贪污罪名将王宠惠内阁的财政总长罗文干加以逮捕。吴深恐直系公开分裂，他勉强允诺了曹的愿望，撤销了对王内阁的支持，由是引起“好人内阁”于1922年11月的倒台。

1923年春夏之间，曹锟政治上的支持者加紧努力以求控制北京政府。6月，他们迫使张绍曾内阁辞职，黎元洪离京并辞职。他们于是转而说服国会议员留京选举曹锟为总统。有些议员同意留京是因为对他们作了保证，制订宪法的工作可以继续完成。约有五百名议员投票选了曹锟。1923年10月10日曹就任总统，不久后公布的新订宪法被人们称为“曹锟宪法”。

曹锟就任总统，成了他一生事业的顶峰，但是他的权力完全要依靠吴佩孚

的武力，政府的许多重要决策并不是在北京，而是在洛阳吴的司令部作出的。在北京以外，曹的权威只在直系控制的地区得到名义上的承认，但在中国的南方和西部，在浙江和东北，人们对之置之不理。此外，曹锟手下的人，为取得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而采取的贿赂和强迫手段，使他失去了以前曾经享有的任何公众信任和支持，受贿投票的那些议员得到了“猪仔”的名声。

曹锟任总统约有一年，吴佩孚又重新采用武力统一的政策，造成国内敌对局面，并且终于在1924年9、10月间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9月中旬，张作霖谴责吴佩孚，声称曹锟是吴的傀儡，他从东北出兵南下，向直系挑战。曹锟即召吴到北京任直军总司令，吴军进驻山海关并和奉军激战后，冯玉祥及吴佩孚的其他部属起而倒戈，他们按照预定计划，冯军于10月23日开进北京，发出通电，呼吁停战。遭受突然变成敌人袭击的曹锟在北京无兵无卒，总统府又被冯军包围，不得已下令停火，并于10月24日下令解除吴佩孚总司令之职。曹锟于1924年11月2日被冯军所迫辞去大总统之职。

1924年10月，随着吴佩孚倒台，曹锟的政治生涯也结束了，他被迫宣布辞职后，在北京遭受软禁。

1926年4月9日，冯玉祥被逐出北京，曹锟才得释出，奔往吴佩孚的郑州司令部。1927年春，吴佩孚西撤，曹锟回天津尽其余年。1937年，据说他曾拒绝日本要他在华北伪政府任职的建议。1938年5月17日他死后，重庆国民政府有感于他拒绝与敌人合作，曾于6月18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并追赠他为一级上将。

曹锟护持下的两个弟弟，较少从事公共活动。曹锐（1866—1924），原是清军军法官，后任直隶司法厅长，1912年一度任财政厅长，1917年到1922年6月任直隶省长。曹瑛（1873—），于1907年曾入徐世昌幕府，1910年调往陆军测绘学堂，1912年任校长，1916年在保定任曹锟的军事顾问，1917年任第四混成旅旅长，1918年任驻山海关直军警备司令，1920年任新编的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锟任大总统后，曹锐于1923年11月升为上将，1924年1月任热河林垦督办。曹锟下台后，他于1924年11月退休。

岑春煊 原名：春泽 字：云阶 号：炯堂老人

岑春煊（1861—1933.3），清朝的大官吏，袁世凯的敌手，在1915—16年间、反袁之役中起了重要作用，1918—19年置身于广州的南方军政府并任其首领。

岑春煊生在广西西林，是镇压云南回民起义，参加1884—85年中法战争的岑毓英七个儿子中的第三子。岑春煊幼年时，随父亲在巡抚、总督任上去过福建、贵州、云南。1879年岑春煊二十岁时到北京进国子监读书两年，1881年回广西继续上学，1885年中举人，不久回北京，任工部郎中。他在任上对当时盛行的贿赂行为颇为随和，因报效海军经费有功而被提升为工部主事。实际上他们把这些经费拿去用作慈禧修建颐和园的浩大开支。同年，光绪大婚，岑春煊参加筹备婚事，又得嘉奖，准许他在主事任期满了之前晋升一级，一旦出缺就予递补。岑春煊取悦清廷获得成功，这对他今后的经历影响很大。

1889年，岑毓英死，岑春煊与兄弟赶去昆明奔丧，将父亲遗体运回西林安葬，守丧三年。1892年4月，岑回北京，任光禄寺少卿。在朝廷担任较小职务两年后，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他志愿从军，被派往山东据守烟台。中日和约签订后，岑回广西家乡。

1898年，岑携幼弟岑春荣入京应礼部试，他按例至官门请安，接受皇帝召见。他乘机讲了中国为什么败于德国之手，后者当时已从中国抢占了山东胶州。皇帝对岑印象颇佳，于是上了一个条陈详述自己的观点。几天以后，他被授予广东布政使之职，6月去广州上任。他不久指控谭祖护一个贪污的道台，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冲突，结果岑被调任甘肃布政使。

数月后，义和团事件发生。得悉联军向北京进军后，岑不顾陕甘总督反对，率领一支小部队赶往京师。到京后即受命与董福祥的军队一起在北京郊外挖掘战壕卫护京城。联军逼近北京时，岑春煊卫护慈禧和光绪逃往太原，又去陕西西安。由于对清廷表示了这番忠心，慈禧太后任命他为陕西巡抚，以资酬

谢。岑于1901年3月就任，任职一年。

1902年，清廷返京，岑春煊由山西护送到京。同年7月，授广东巡抚。恰在此时，四川方面报告发生义和团起事及土匪为害，清廷遂免去岑广东之职并委他署四川巡抚，几个月后，他在这个动乱的省份恢复了秩序。1903年4月，授两广总督兼督办广西军务，以平定广西的土匪。这个任命特别重要，因为清一代，在岑春煊之前，只有陈宏谋一人作为广西人在本省担任过这一职务。在平定广西中，岑提升龙济光、陆荣廷担任高级军职，他们以后都成了南方的重要首领。岑春煊担任两广总督时，深受慈禧信任，这是他在清朝末年官场生涯中的顶峰时期。

1906年，岑奉命离开广州，调任云贵总督，这是他父亲干得颇有名气的一项职务。岑在广州任内，曾断然处置了几起关税贪污案件，因其主犯为庆亲王奕劻的被保护人，因此，岑从广州去职就不足为怪了。岑未去昆明，却请假去了上海。1907年3月，授四川总督，他认为这是将他进一步排挤出政治活动中心的一个企图。岑上了个呈文请皇帝召见，他没有等待朝廷答复就上了北京。到北京后，他受到召见，乘机告诉慈禧从盛宣怀处获悉有关庆亲王的大量贪污行为。岑在慈禧的保护下，在北京就任新成立的邮传部尚书。

不久，广东骚乱的消息传到北京，这是又一次把岑春煊调离北京的机会。岑的对手、庆亲王的支持人袁世凯故意夸大广东的情况，庆亲王趁机报告慈禧南方情势严重，非任用岑春煊这样干练的人员不能奏效。于是，再授岑为两广总督，并要他立即启程。显然岑屈从自己的命运，即行南下，到达上海时，得悉军机大臣瞿鸿禨被革职，他是在北京敢于反抗庆亲王、袁世凯的一名大员。岑由此得知，他的处境已无能为力，于是滞留上海，请求准予病休。但袁世凯竭力要进一步羞辱自己的对手，想了一个妙计，制作了一张岑春煊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在上海一家报馆前合影的照片。慈禧见了这张照片非常恼怒，但想到他在义和团事件时对朝廷的忠贞，就只限于解除其在广东的实职。岑就此住在上海。不久，慈禧和光绪相继死去，袁世凯也被革职。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发现自己处境危难，没有得力的大臣，于是不得不起用袁世凯、岑春煊，任袁为两湖总督，岑为四川总督。由于革命迅

速发展，使岑无法到任，他劝清室退位，遭到顽固的保皇派的反对。当袁世凯又在北京掌权，当了民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时，他对岑采取了妥协态度，1912年秋任命他为福建宣抚使。他在宣抚使任内，革除了趁革命动乱贪赃枉法的一个官吏，因此为福建人士所赞赏，但却引起袁世凯的怀疑。岑春煊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及以后反袁运动中很活跃，他企图在南方取得支持，但是发现他的老部下和门徒广东龙济光已成了袁世凯的坚决支持者。岑和李根源到广州争取龙济光，却被迫逃往澳门、香港。岑于是又去槟城，受到当地富豪胡志纯(音译)的款待，在那里住了三年。

1915年，袁世凯称帝阴谋暴露后，维护民国的革命党人起兵开始聚集反袁力量。同年12月，蔡锷、唐继尧、李烈钧在云南起义反袁。广西都督陆荣廷曾一度支持袁世凯，也准备响应云南起义，请岑春煊回广西共谋对策。1916年1月，岑回到上海，遇见李根源、梁启超等人，共同进行讨论筹划。岑和章士钊去日本，取得贷款可供装备两师部队之用。接着岑到广东肇庆，并于1916年5月1日担任名义上的两广讨袁护国军司令。

一周后，反袁派首领在肇庆组织军务院，决定在袁世凯下台之前，代行中国合法政府职权，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因唐在云南，乃以岑为代抚军长。翌月，袁世凯死，岑对宿敌之死大感快慰。1916年7月，黎元洪继任总统，南方军务院解散，岑退休回上海。

1917年，段祺瑞在北京掌权，孙逸仙组织护法运动相对抗，和唐继尧、陆荣廷等合作在广州组织军政府。1918年，军政府因陆荣廷及广东强有力的桂系军人的影响进行改组，孙逸仙被迫与另外六个总裁分掌领导权，六人中有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1918年5月，孙逸仙辞去政府首脑职，岑当选为主席总裁，他得到桂系的支持，再次成为南方军政府的首领。

此后两年间，在广州军政府内部，桂系同追随孙逸仙的国民党人和本地商界之间常有冲突。1919年8月，孙逸仙反对桂系，宣布完全退出军政府。1920年6月，孙逸仙和国民党其他领袖反唐继尧宣布桂系控制的广州政府的一切行动为非法。岑春煊因有桂系支持，不顾各方反对，仍然主持着军政府。1920年桂军被陈炯明粤军逐出广州。岑春煊失去桂军的支持，于1920年10月24日宣布解

散南方军政府，逃出广州。两天后，陈炯明的部队进入广州。

至此，岑春煊已完全退出政界，在上海居住，他和章士钊、李根源、杨永泰来往密切，但纯系私人交往而无政治内容。1922年，他和上海投机商哈同和哈同夫人罗迦陵一起去苏州，买了一处寓所。1930年，他七十岁生日时，准备著录一册《乐斋漫笔》，记述岑家历代为清廷重用以及他之所以效忠清廷的经历。

1933年3月，岑春煊死在上海，他的妻室刘氏早在1902年就去世。长子岑德古，湖北举人。幼子岑德广，曾任广西外交特派员、杭州关监督，1940年在南京汪伪政府任赈务委员会委员长。

岑春煊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难以评价。1902—1911年间，他的主要功绩是根据传统从实揭发贪污受贿事件。在他做官的地区当地人民对他的畏惧胜过敬重。他常以他本人和家族与清廷的密切关系为荣，但是他却可能是于1911年建议清室退位的最高官员。他在民国初期各派之间内部斗争中的作用也是互相矛盾的，虽然这种作用更多的是出于他对袁世凯的宿怨而并非出自对共和制度的真诚信仰。

曾 琦 字：慕韩

曾琦（1892.8.5—1951.5.7），中国青年党首领。

曾琦生在四川隆昌，幼年时在广西，那时他父亲曾友三在广西当小官。他早年丧父，和其兄曾昭珩回四川寄居于舅父宋平洲（译音）家。曾琦学了一些基础的中国典籍后，进成都高等学堂，以作文之优和其他课程成绩很差而闻名全校。他对十七世纪学者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反满的著述最感兴趣。又涉猎新闻界，在《成都商报》、《四川公报》上发表文章，并主编《民国新报》和《群报》。

1912年，曾进了成都的四川法政学堂。民国成立后，据说他被选入国会。1913年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于1913年夏逃出四川，留下他的表妹、新

婚才三个月的妻子宋静芳。他到了上海准备去法国求学。他到达上海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爆发，因此不能去法国，就在上海进了耶稣会办的震旦大学，在学校里遇到李璜、左舜生，以后他们多年合作共事。

1916年，曾琦去日本进了中央大学政法科，用很多时间从事学生政治活动。1917年，在东京参与创立华音通讯社，报道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秘密谈判情况，次年，又同别人发起成立留日学生救国团，成了中国留学生的一个领袖人物，他决定率领留日学生回国反对西原借款和中日军事互助条约。到上海后，曾琦等人创办《救国日报》，登载了一系列文章呼吁年轻学生参加救国运动。

1918年6月底，曾琦在北京。6月30日，协助创立少年中国学会，反对段祺瑞的亲日政府。五四运动时，他在上海。五月底到北京，以留日学生救国会名义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在抵制日货的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1919年下半年间，曾琦去巴黎，他和李璜为上海《新闻报》办了一个支馆，名为“巴黎新闻社”。他以玉剑（译音）的笔名为《新闻报》写稿谋生。他以学生和记者身份在政治上表现活跃。由于同中国共产党人发生争论，他和李璜从德国旅行回巴黎后，于1923年12月1日成立了中国青年党，曾琦任秘书长，但该党直至1929年9月才正式公开。在此之前，它的成员把这个组织自称为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它以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号召，强调“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他们所谓的“国贼”，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1924年8月，曾琦回到上海，在大夏大学、上海法学院、同济大学教书，并参与创办学艺大学，郭沫若曾在该校教书。1924—27年间，曾琦从事紧张的政治活动。1924年10月，他们一批人在上海创办《醒狮周刊》，作为鼓吹国家主义的论坛。其间，在全国各大城市成立了三十多个鼓吹国家主义的社团，据说有成员约五万人，出版有《独立青年》、《自强》、《新国家》、《爱国青年》、《国光》等杂志，它们的总目标都是以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他们提出，国内各阶级应联合一起而不应互相斗争，他们认为没有国际无产阶级那末一回事，因而反对孙逸仙联俄联共的政策。1924年冬，曾琦企图争取孙逸仙赞同青年党的观点，但未能成功。孙逸仙逝世后，曾全力支持国民党内保守的西

山会议派。1927年夏，曾琦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监禁在上海。1927年底获释后，他去日本住了几年。

曾琦何时回国不详。1933年他大概在湖南帮助国民党进行反共宣传。1934年去四川支持蒋介石的剿共战争。1937年他去奉化见了蒋介石，又参加了庐山会议，成了国防委员。1938年代表青年党参加国民参政会，同年随同国民政府去重庆。1941年因病回上海住在法租界。1944年冬回重庆，途中到过北平。1945年，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日回到重庆。同年冬，在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随同国民政府回南京。1947年春国民党、社会民主党、青年党的联合政府成立时，曾琦任蒋介石顾问，1948年以隆昌代表的资格参加国民代表大会。

1948年秋，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局面已定，曾琦离开中国去美国治病，他在那里向华侨讲演，号召组织“中华民主自由同盟”。1950年，他去欧洲旅行，赞成建立“各派宗教反共同盟”。此行总共只有两个月，因他患贫血症健康恶化，于是回到美国。1951年5月，因盲肠炎转腹膜炎病情复杂化了，1951年5月7日死在华盛顿市的华盛顿医院，临死前数小时皈依罗马天主教。遗有第二个妻子周若南，子曾宪平（译音）

曾仲鸣

曾仲鸣（1896.3.1—1939.3.22），学者、官吏，汪精卫的长期同事，1939年在河内被刺，刺客原来的目标很可能是汪精卫。

曾仲鸣出生在福州一家贫苦的诗书门第，由寡母及长姐曾醒抚养成人，其姐也是个寡妇。1900年后，他姐姐曾醒伴同亡夫的两个弟弟方声涛、方声洞及妹妹方君瑛去日本，后来他们都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的活动也影响曾仲鸣参加了民国革命活动并和几个最著名的领袖人物交往。

1912年民国成立，曾醒、方君瑛得到官费留学法国，和君瑛之妹方君璧、曾仲鸣、汪精卫及其妻陈璧君一起去欧洲。他们住在巴黎，一起享用官费。曾仲鸣先进一个中学，后进波尔多大学，获科学学士学位。接着他改学文学，

1921年在里昂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在汪精卫指导下继续学习中文，不久和学绘画的方君璧结婚。1921—24年，曾仲鸣任里昂勤工俭学的中法大学的秘书长。1925年初，夫妇一起回国，曾在广州中山大学教法文。1925年7月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曾任某部秘书，他得到这个职务显然是汪精卫出的力，从此以后，他在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方面就始终跟随着汪精卫了。

1927年，曾仲鸣在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任秘书和政治委员会主任秘书。1930年他再一次在汪精卫手下效劳，担任在北平召开的国民党扩大会议秘书长。1931年参与汪精卫策动的反蒋活动，汪和唐绍仪、孙科及两广军阀在广州组织了分裂政府。9月日本侵占沈阳，国民党重新统一，曾仲鸣随汪回到党内。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仲鸣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任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

1932年，曾仲鸣在顾孟余手下任铁道部次长，表现出管理的才能，主持建成了南京浦口轮渡工程，解决了津浦、沪宁路迫切需要解决的联接问题。此外，铁道部还延长了陇海路，建成了粤汉路。1935年，曾兼任交通部次长。1936年3月，曾仲鸣辞职，陪同汪精卫去法国治疗1935年遇刺所受的伤。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消息传到法国，他们当即回国，汪精卫就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曾仲鸣任副秘书长。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成立最高国防委员会，汪精卫任副主席，曾仲鸣任他手下的高级秘书。1938年，汪、曾随同国民政府迁往重庆。1938年12月18日，汪、曾、方君璧离开重庆经昆明去河内。12月28日，汪精卫发表他的著名的和平文告，力求与日本媾和。也许因此而有1939年3月21日凌晨刺客进入汪精卫在河内的寓所，开枪重伤曾仲鸣，也伤其方君璧及其他三人。次日，1939年3月22日曾仲鸣身死。

谋杀事件在国内激起了骚动和不少猜测，但凶手从未弄清。最普遍的看法是，谋杀对象是汪精卫，曾仲鸣是被误杀的。另一种说法是刺杀曾的目的是以此警戒汪精卫，促其放弃和平活动。汪精卫为其死去的同伴写过一篇动人的颂词，作为1939年出版的《曾仲鸣先生行状》的首篇文章。

曾仲鸣在其一生政治生涯中，著译很多，计有一本中国诗史和于1930年出版的《艺术与科学》。法语译作有《唐诗三百首》和有关国民党的政论小册

子。

曾仲鸣死后，他的妻子和儿子住在南京。方君璧继续作国画，其代表作有1934年的珂罗版《秋夜晨课图》，这是风俗肖像画，描绘汪精卫于九岁时每天早晨从母亲受学的情景。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方君璧定居美国。她的画集《方君璧国画集》曾复印出版。

邹 鲁 字：海滨

邹鲁（1884.2.2—1954.2.13），国民党保守派首领。1932—39年任中山大学校长。辛亥革命和早期国民党党史的权威人士。

邹鲁出生于广东大埔一个贫苦客家族家庭。父亲据说是一个裁缝和小贩。邹鲁是家中的独生子。幼年在私塾上学。1903年十九岁时到潮州进半新式的韩山书院。他在那里上了几年学又教了几年书，1907年到广州进广东法政学堂。他早期的活动和革命运动有何关系不完全清楚。无论如何，据说他于1911年4月27日参加了黄花岗起义，曾在陈炯明赞助创办的《可报》做过职员。1911年辛亥革命中率部队攻占安徽，向南京进军。嗣后曾督率军队击退张勋部队，迫其退出江苏。

1913年，邹鲁当选为北京国会议员，不久为抗议袁世凯的政策而去职回到广州。二次革命失败后，邹鲁避居日本，进早稻田大学。在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和编辑《民国杂志》中，他起了积极作用。1915年奉孙逸仙之命去东南亚各地募捐款项。同年底回国。和朱执信、邓铿一起筹建广东地方部队，这些部队于1916年与李烈钧联合抗击龙济光。1917年孙逸仙命邹鲁率领粤东潮州、梅县地区部队击溃莫擎宇的反叛部队。此后数年，邹鲁协助孙逸仙巩固华南根据地，做了大量的行政工作。1920—1921年，邹鲁当了兩广盐务使，负责管理这两个关键省份的一个重要财政机构。邹鲁和广西军阀很熟悉，使他得以于同年把原陆荣廷手下的一个师长刘震寰争取了过来。1922年邹鲁为国民党党务奔走于京沪之间，1923年任广东政府财政厅长。此时，他开始恢复了早年对教育工

作的兴趣。受命合并广东高等师范学堂及其他两个教育机构，创建广东大学（后为广东中山大学）1924年1月至8月间，孙逸仙即在该校讲演三民主义。讲稿出版前经过邹鲁校订。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邹鲁为青年部长，并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邹鲁竭力反对国民党中的激进势力和反对国共合作，在广东地区竭力排挤共产党在各学校中的政治渗透。

1925年，邹鲁去北京探望病危中的孙逸仙，孙逸仙临终签署遗嘱时，他也 在场，5月同国民党其他领袖一起回广州。9月，广州的国民政府指派邹鲁、林森处理北方国民党事务，并率领“外交代表团”和北洋政府进行谈判。邹、林决定在国民党内制造反共事件。11月，邹、林及另八名中央执行委员在北京西山开会。会议通过决议从国民党内驱除所有共产党员并弹劾汪精卫。针对这个情况，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对西山会议的头领进行纪律制裁，声称如不停止活动，将把他们开除出党。西山会议派的头目对此置之不理，反而于4月间在上海召开反对派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另行选出中央执监委员会。1926年间，邹鲁在上海进行西山会议派的活动并编写国民党史稿。1927年初，国民党内部因共产党问题进一步分裂，各自在武汉、南京成立对峙的政府。9月，共产党被驱除出国民党，成立了中央特别委员会，国民党恢复了团结统一。

1928年1月起，邹鲁周游世界各国，历时一年之久，写成《二十九国游记》一书。邹鲁回国后在上海用一年时间继续研究国民党历史。1929年去日本，回国后在1930年重新从事政治活动，参加冯、阎、汪三人为主的扩大会议，准备在北京成立的反蒋政府，草拟宪法，这个宪法因系在山西太原阎锡山总部起草完成，故被称为“太原宪法”。

扩大会议失败后，邹鲁去华南在广州又一次参加组织反蒋政府，这个政府趁1931年2月蒋介石逮捕胡汉民之机建立。4月30日，萧佛成、古应芬、邓泽如、林森联名提议弹劾蒋介石，5月底联合孙科、陈友仁、唐绍仪、陈济棠、汪精卫等不同政治见解的领袖人物，另组政府，邹鲁充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内部内战危机延续到9月中旬，日本进攻沈阳事件发生后，民族

危机促使南京和广州领袖们在上海举行和平谈判，邹参加了这些谈判，结果导致胡汉民的释放。

1932年，邹鲁任中山大学校长，他任此职到1940年。1935年被提名参加国府委员会，但是，他的注意力已转向学术机关的工作，鉴于他对中国高等教育所作的贡献，他于1936年应邀去德国参加世界大学教育会议和海德堡大学五百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此行使他获得海德堡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抗日战争期间，邹鲁被列入国民党元老地位，在重庆参加最高国防会议。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南京任监察委员。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人进入广州前不久，他离广州去台湾，1954年2月13日死在那里，年七十岁。

邹鲁的最重要贡献是在教育和政治史的研究方面。1930年他致力于使国立中山大学成为华南最有影响的学术机构。他亲历其境又勤于收集材料，使他成为辛亥革命史和早期国民党史的一个权威人士。他有如下一些主要著作：《广州3月29日革命史》、《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国国民党史略》。

邹鲁死后遗有妻二人、六个儿子、三个女儿。子邹诰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邹韬奋 原名：思润

邹韬奋（1895.11.5—1944.7.24），新闻记者，因主编《生活周刊》和领导救国运动而知名。他在重庆从事抗战工作，1941年因国民党新闻检查造成的困难而去香港。他曾在江苏共产党控制地区住过一些时候，1943年3月因病回上海。

邹韬奋原籍江西余江，他却生在福州，是全家六个孩子中的长子。他父亲邹贵前（译音）是一个士大夫，曾在福建盐务局任职，1915年后在北京财政部工作。邹五岁时从塾师读经典典籍，1910年进福州工程学校，1912年，他父亲希望他将来做工程技术人员，送他进了上海南洋大学附属小学，一年后他越级进了南洋中学，在那里读了四年书。1919年在南洋大学学了一年电机工程，决定

转入圣约翰大学专修英语。

1921年，邹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在沪申纺织厂、上海棉纱交易所任英文秘书，又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中学教英语。他很想从事新闻工作，1922年任黄炎培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会的编辑部主任，又在中华职业学校教英语和从事其他职业教育的指导工作。

1926年10月，邹任中华职业教育会一年前创办的《生活周刊》主编，他把这一份专谈职业教育的刊物改变成为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论坛，增设《信箱》一栏答复读者提出的问题。经此改革，刊物的销路大为增加，从1925年的二千八百份增加到1930年的八万份。因此，邹韬奋辞去了《时事新报》的经理和编辑的职务。1930年10月《生活周刊》社又附设了书籍杂志供应部，1932年7月，该部扩大为生活书店，三十年代末，该书店在各大城市有五十五家分店。邹以合作制形式同时经办刊物和书店，为职工谋求额外收入和利益。

1931年9月，日本攻占沈阳，邹强烈批评国民党的妥协政策，要求坚决抵抗日本，读者热烈响应他的号召，刊物销售量高达十二万份。11月，邹韬奋主持发起募捐运动，向读者募集了十二万九千元，捐献给在东北抗日的马占山。1932年又为支援十九路军进行募捐，并由职工设立伤兵医院。这一年，《生活周刊》的声望达于顶点，销售量为十五万五千份。国民党长期对它进行新闻检查。1933年1月，邹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谴责国民党所采用的方式。不久，任该同盟执行委员。他的活动使他处于受报复的危险境地。他在朋友的敦促下出国。12月16日，国民党封闭了《生活周刊》。

邹离上海后，去意大利、瑞士、法国，1933年9月到伦敦，1934年2月去比利时、荷兰、德国，7月去苏联，在莫斯科大学听了暑期讲课，以后去南俄和克里米亚，又回伦敦，并于1935年5月到7月间在美国旅行，8月回到上海。邹在旅游期间，注意各国社会政治情况，记载印象寄回中国，三卷《萍纵寄语》记载了他在欧洲、俄国的见闻，《萍纵忆语》记载在美国的经历，他对苏联的印象远较西欧美国为好，他在旅行中的这种思想变化，很快在1935年11月新出版的《大众生活》周刊上反映出来。周刊的宗旨是“完成民族解放，根除封建残余，消灭个人主义”。他继续呼吁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1935年12月，邹被选入上海救国会执行委员会，1936年1月，他参加了有二百多作家、新闻记者、律师参加的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5月31日，他被选入全国救国会执行委员会。他的大部分救国工作是通过《大众生活周刊》进行的。该刊销售额达到十二万份，但在1936年2月29日被国民党查封。3月，他又办了一份新周刊《永生》，6月又被查禁。于是他去了香港，于1936年6月7日创办《生活日报》，因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困难，出版五十五天就停刊了。他回到上海，又办了《生活星期刊》，12月又被国民党查封。

1936年7月，邹韬奋和救国会首领沈钧儒、陶行知发表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呼吁书，这是向全国各党派，特别是向国民党和蒋介石发出的。它要求停止国共内战一致抗日。这个呼吁书及邹的其他声明，终于使他在1936年11月23日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沈钧儒、章乃器、史良，他们都是全国救国会的执行委员，逮捕的罪名是“共产党活动”、“煽动日资纱厂罢工”，由于证据不足，而被交保释放。但不到二十四小时，又以“危害民国”而再次被捕，押送到上海市政府公安局，12月4日又移送到苏州高等法院受审，尽管当局极力对逮捕和审问进行得秘密，但消息仍很快传了出去，引起普遍的震惊和反感。他们诸人被称为“七君子”。1937年4月审问开始，7月，中日战争爆发，他们七人被交保释放。

邹在被拘期间，利用强加于他的闲暇写了一卷回忆录《经历》，又写了《萍踪忆语》的最后几章和《读书偶译》，这些著作在1937年4月至7月间，都由生活书店出版，邹韬奋等人被释后去见蒋介石表示支持对日作战。日军占领上海时，邹和何香凝、郭沫若等人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后又迁往重庆。邹任国民参政员，但未在政府中任职，他在参政会中就出版自由和废除检查制度提了许多提案。他通过新办刊物《抗战》又名《抵抗》鼓舞民众抗战热情。这一份刊物，原在上海出版，后迁往汉口，其后继者《全面抗战》于汉口出版，后迁往重庆。邹还多次去前线鼓舞士气。

由于国民党重新实行审查制度，邹韬奋历来都是要求政治民主出版自由的，因此成为首先遭受自审的一人。1940年6月，生活书店除了六家分店外，其他都被查封。五十余名职工被捕和遭到监禁。1941年2月，剩下的几家分店又被

查封，邹乃去香港，为一家报纸写文章，并恢复出版《大众生活》。5月，他和救国会的其他八位首领发表题为《我们对国事的立场和观点》的呼吁书。10月，他要求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这期间，邹写的文章严厉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和重庆的所作所为，以后收集出版为《抗战以来》。

日军占领香港后，1942年1月邹逃往广东，原计划迳往重庆，但由于战时条件所迫，他在广东共产党游击区住了三个月，此时他得悉自己是重庆“不受欢迎的人”。为此，1942年夏，他就停留在两广边境的农村里。9月，他准备去苏北共产党控制的敌后地区。10月，他到了上海，当时已患有严重耳疾。11月他到了苏北，受到新四军和群众的欢迎。他不顾日益加重的病痛，继续发表演说和撰写文章，他深深为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所感动。但是他的病情恶化，发现他患有耳痛，1943年3月被送回上海。

邹虽然卧病在床，仍忧虑国事。1943年9月，发表《为国事呼吁》，希望保持统一战线直至抗日胜利，要求立刻成立民主政府，在自由空气中普及教育。1944年1月，他写了他的最后一本书《患难余生记》。6月2日，他当着几个亲友的面立下了他的政治遗嘱，重申他在《为国事呼吁》中提出的三点意见。又留下了三条个人遗愿：遗体供医院解剖，遗体火化骨灰送往延安，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逝世，9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追认邹韬奋为中共党员。

邹韬奋在将近二十年的记者生涯中，写了大量作品，1949年由胡愈之编辑在上海出版了他1925年——1937年间的文章，名为《韬奋文录》，1959年三卷本选集《韬奋文集》，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邹韬奋前妻叶氏，结婚后不到两年就去世了。1926年续娶沈粹缜(译音)，有子两人，女一人。

朱 友 渔 西名：安德鲁

朱友渔（1885.12.18—），中华圣公会主教，中日战争时任中华圣公会主教团理事，又任内地会干事，负责华中教会工作，1950年退休去美国。

朱友渔是中国圣公会教士朱余堂（译音）的儿子，出生在上海附近，有姐姐二人，弟弟一人，妹妹三人。受洗时取名为“友渔”，后取西名“安德鲁”。朱一岁时，他家迁居上海，他父亲在圣约翰学院（后为圣约翰大学）任助理牧师，后任基督教堂牧师。1904年，朱在圣约翰学院毕业，他和三个同班同学是该校第一批获得学士学位的人。

1904—1907年，朱在圣约翰学院学神学，以后派在摩赛手下去无锡教区当圣·安德鲁教会执事。两年后，获得奖学金去纽约神学院学习，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社会科学。1911年6月，在圣·约翰教堂授为圣公会牧师。1912年6月他获得纽约神学院神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圣约翰大学任教。

朱友渔回国后，对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和太虚法师的佛教改革运动很感兴趣。1918年朱友渔等人鼓励孙逸仙写出《中国的国际发展》，这些人中有余日章、蒋梦麟等，他们每周去上海孙逸仙家晤谈。

1920年，朱友渔获得奖学金去纽约联合神学院进行一年研究工作。1921—24年，任中国基督教留学生协会理事，回国前和金惠（译音）牧师的女儿加洛林结婚。金惠是纽约创立的中华长老会牧师。1924年夏，朱友渔夫妇回国到北京，朱应中华医药局理事格林之请，任新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牧师。1925年，他和刘廷芳在医学院讲堂举行礼拜追悼孙逸仙。1928年夏，内蒙地区的绥远省久旱成灾，朱任华洋义赈会委员，利用暑假去做救济工作，住在海龙王庙，登记发放汉、蒙族人民的粮食。

1931—32年，他去美国参加学术活动，作了关于东方宗教和文化的演讲。秋季，他在伯克利和平宗教学学校，春季，他在神学院。他除讲课外，还就

日本侵略中国问题同旅美日侨开展一系列辩论。伯克利克莱门特圣公会请他做讲道师，他未答应，而应全国基督教会之请回国。这个职务要求他参加不少会议。他去华南参加一个讨论教会合作问题的会议，又去菲列宾参加二年一次的教会联合会，又参加了日本轻井泽的基督教联合会。他在东方文化暑假学会中，继日本驻美大使佐藤和荒木大将之后，作了关于东北问题的讲演。

1935年春，全国基督教会请朱友渔当总干事，朱未就，而是回到圣约翰大学任教。当年，纽约大学第一次招收女生，朱友渔的妻子任女生部主任。1937年夏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轰炸并占领上海，朱友渔一家迁入公共租界，但圣约翰大学因地处公共租界边缘处境很危险，战争期间，学校一度不得不改设在租界内。成千上万难民进入公共租界，国际红十字会由是成立，朱任华方理事。

1938年夏，黄仁霖上校向圣约翰大学提出请朱友渔去汉口和蒋介石商讨战时工作。朱由香港到汉口，蒋要求朱和陈文渊担任六个月为顾问，协助建立青年训练团，为战时和战后的重点工作训练青年。但朱友渔担任顾问时间大大超过蒋的要求，因蒋介石多次延长他们半年为期的任期。朱因此多次去前线，深感医药供应不足，他以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改进这种情况，在新成立的上海医药救济会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进行联络工作。1938年10月底，他随同国民政府撤出汉口，迁往长沙又到重庆。他继续从事战时工作，经常会见上海医药救济会派来的人。1939年他希望会见圣约翰大学派来的人而去海防。一行人经过艰难行程到了桂林，又去长沙会见他妻子，她是女青年会会长。此外，朱友渔当时所担任的许多工作之一是视察国民政府新建的滇缅公路并提出建议。

1940年，中华圣公会决定成立包括云贵地区的新教区，由朱任主教。他为此飞往昆明又去上海。1940年5月1日，他被授予香港副主教圣职，实际作为昆明主教，负责云贵新教区。他立即回昆明，建立了圣约翰教堂。因战时关系，主教因无法供给他经费和工作人员，而在昆明又很少有圣公会信徒，因此他的困难就更大了，但他终于获得经费维持住了这个教堂，其他教会的不少教士不久也来到昆明。1940年底，新教区任命了一些中外籍牧师。那时，朱友渔还兼任圣约翰教堂的本堂牧师。1941年2月，朱以自由中国教区主教团特别代

表身份（后改为主教团理事）参加主教团会议。他由香港回昆明，在香港时参加了华南香港教区常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以后他由仰光经滇缅路回到昆明。

1942年10月，朱化装成农民以主教团特别代表身份去上海，谋求与敌占区的教区取得联系。到上海后，和上海医药救济会接触，又去看望了他的母亲。他经过艰难旅程，又因病住院在长沙耽搁了一个月，终于回到昆明。不久应宋子文之托去重庆，得悉蒋介石已派定一些学者和教育家，其中包括朱友渔前往美国访问，加强两国人民友谊。1943年6月，朱友渔等去美国，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在各种团体的集会上为国民党中国作讲演。

朱友渔出国时，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圣公会主教们开会，决定向美、英、加教会当局申请，要求中华圣公会可以不顾国籍自行选举主教。1943年9月朱友渔以主教团理事身份，向多伦多的加拿大圣公会主教会议提出备忘录。又向美国圣公会的三年一届的大会提交备忘录，大会决定授权中华圣公会自行选举主教。9月，朱飞往英国，会见坎特伯雷大主教，得到英国教会对他的备忘录的支持，他还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讲道。以后又回到美国，同他的家属聚会在一起。

1945年1月，朱应驻华美军总部之请，任缅甸战区随军牧师。他是美军中的唯一华裔牧师。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他得到随军总牧师发给的服务优秀的嘉奖令。1945年3月，国民党统治区的主教，要求朱友渔在重庆建立中华圣公会的临时总会。他负责这个总会的首要工作是，争取收回为日本所侵占后为国民党所接收的教会财产。他和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商量此事。蒋遂下令有关当局交还所占教产。1946年3月，主教团开会，决定圣公会总会迁往南京，朱友渔任总干事，朱乃决定辞去云贵教区主教职务。1946年5月，朱坐吉普车到南京。1947年8月，来负责召开圣公会大会，会上他任特别委员会主席，起草教士抚恤计划。

朱友渔还担任内地传教会干事，他曾以这个身份去陕西西安任命该省新主教。1948年夏，他出席英国拉谟柏司英国圣公会主教大会，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世界教会大会，他在拉谟柏司大会中作了《新教会对教会的重要性》，在阿姆斯特丹作了《中国教会在工作》的讲演。阿姆斯特丹大会决定成立世界教会

会议，朱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理事会理事。朱又去美国住了两个月，从事美国圣公会传教代表的工作。11月底，朱回南京，看到南京因国共内战而陷于一片混乱。当时必须将中华圣公会迁往上海，但一直到1949年4月他坐吉普车去上海时才把这个决定付诸实施。5月间，共产党接管了上海。开始，圣公会的有些领导人对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好奇，但当《基督信徒宣言》（参见吴耀宗）发表后，不满情绪滋长起来。在这种微妙情况下，中华圣公会的主教们向他们的教徒发出信件，重申基督教的信念，也强调教会对国家的责任。

1950年7月，朱友渔去多伦多参加世界教会中央委员会，又去美国探亲。8月，朱到香港，又回上海，因他到12月已满六十五岁，于是宣布退休。12月7日，他离开上海去美国和家人团聚。他和妻子后来住在宾夕法尼亚州。1951年4月，在“三自运动”中，朱友渔等十三个教会首领、传教士，被共产党人称为“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朱本人被称作是一个毫无良心的民族败类，死心踏地跟随美帝国主义”，他受到主教团主席的谴责。

朱友渔夫妇有四个子女：大卫，进耶鲁大学，罗伯特，是圣公会教士，卡罗尔，和毕茨堡大学的微生物学教授何蒙托（译音）结婚，金，进了普林斯顿大学。朱友渔的自传《渔夫之友》一书，在他退休后在美国出版。

杜 重 远

杜重远（1895—1943），自由主义的新闻记者，在上海因和邹韬奋一起作抗日宣传而在1937年前被国民政府逮捕，后去新疆，为他的东北同乡盛世才工作，1943年被盛作为“左派”处死。

杜重远，南满辽宁开原人，早年在东北上学，后去日本结识了开原同乡盛世才。他在二十年代的活动不详，只知道他曾在沈阳开过一家陶瓷厂。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使杜重远的生活起了急剧变化，他放弃在沈阳的营业去上海，不久和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刊物《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建立了联系。1933年10月，邹在国外时，周刊被国民党查封。不久，杜重远把刊名稍

作变动，改为《新生周刊》，重新出版，任主编及发行人，着重宣传抗日主张。在1934年2月的创刊号上，杜重远说1931—32年的抗日热情已经消退，出版这个刊物的目的是重新发出号召，他用了“呐喊”这样的字句，促使人们回忆起十年前鲁迅所写的一个著名短篇小说集。

1935年7月2日，杜重远被捕，在江苏高等法院受审。7月8日，驳回上诉。案情乃因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载文，对日本天皇表现不敬，判刑十四个月。这篇受指责的文章指出与帝王权利相比，制度已经变得没有多少意义。但是他结论说，帝王中最可怜的是溥仪，他是一个由别人指定的满洲国皇帝。日本当局当时正在加强压力，企图控制华北五省，于是把这件案子扩大成为国际事件，向南京提出正式责问，并将在汉口的十一艘驱逐舰舰队调到南京。其实，日方所注意的可能是1934年6月22日该刊上杜重远所写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强烈抗议自1931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扩张，又尖锐批评了中国政府的“忍耐”政策。杜重远说，中国人“失去的只是帝国主义的锁链”。南京对日本的压力再次屈服，封闭了《新生周刊》，违反正常法律程序地将杜重远监禁起来，又开除了上海的七名审查人员，重申不得刊登“有碍中外友好”的文字。1935年11月，邹韬奋回国，又创办了一个新刊物《大众生活》，代替《新生周刊》。杜重远至少被监禁到1936年9月。是年11月，邹韬奋和全国救国会的其他人士也遭逮捕。

1937年9月，中日战争爆发后，杜重远去新疆，那时盛世才在新疆掌权。杜花了几个月时间收集了一些有关新疆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的材料。杜回汉口后，邹韬奋催他出版这些材料。1938年《盛世才与新新疆》出版，前有邹的序言，称杜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忠实同志”。这本书多次再版，提供了有关新疆发展情况的有用材料，当时盛世才在苏联的帮助下，在该省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开始进行重大变革。

盛世才的两大政治主张是反帝和与苏联友好。满怀救国热忱的杜重远对国民政府大为失望，认为他在新疆可以比在内地更好地为国效劳。因此，1938年底，杜又回新疆，当时盛世才也从延安请了一些共产党员到新疆省政府担任盛的顾问，杜在乌鲁木齐任新疆大学校长，著名小说家茅盾任教务长。杜重远想

把该大学办成一个足以反映新疆居民中复杂的种族和语言成份的机构，并使少数民族享有前所未有教育平等机会。

后来，盛世才放弃了亲苏政策，开始对新疆实行严格的政治控制。杜重远在新疆大学的两名同事刘贵斌、邢国文被捕，茅盾又于1940年春去了延安。杜重远和几个同事也申请离境，但盛未予批准。据盛世才事后叙述，1940年起，他的保安警察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阴谋活动，杜重远和苏联顾问专家都有牵连。虽有这种变幻，但杜仍继续担任新疆大学校长。1941年底，杜重远等人被捕，其罪名为密谋倒盛。采取这个行动的部分原因是，1941年6月德军进攻苏联，国际形势起了变化，盛重新考虑他的亲苏政策是否得当。他不久就开始逮捕新疆地区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作为转而效忠国民政府的表示。盛世才狱中的不少人员被杀害，其中有杜重远，他显然是在1943年处死的。盛世才把事情说成是他因怕共产党报复而服毒自杀，又有人说他是被盛的医务人员毒死的。

奇怪的是，杜重远死后竟还在国外发生某些影响。他的《盛世才与新疆》中的材料，为诺林于1944年纽约出版的《亚洲门户：新疆，中国新疆的前哨》一书所引用。诺林的书，很好选用了英译本杜重远关于1937年盛世才统治期间新疆情况的材料。

杜聿明 字：光亭

杜聿明（1903—），黄埔毕业生，蒋介石的一名亲信司令官。1945年逐走龙云加强了国民党对云南的控制。在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内战时，他曾在东北作战，后在徐州参加具有决定意义的淮海战役。1949年1月被共产党俘获。

杜聿明是陕西米脂人，父亲杜道源（译音）是一个举人出身的教书先生。1912年民国成立后，他父亲在榆林中学教书，杜聿明在那里读书。1924年毕业后，去广州进黄埔军校第一期，以军官训练班学员参加第二次东征。毕业后，参加北伐，从连长升为副师长。

杜聿明在三十年代初期的活动不详。1937年5月负责创办装甲兵团。他是

否能完成这一任务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两个月后中日战争就爆发了,而且中国的一个传记作者说他参加了淞沪、忻口、南京的战役,但上述各战役的作战命令并未将他列入指挥官名单,很可能他是个参谋人员或者是长江下游正在筹建中的装甲部队的指挥员。不论怎样,1938年1月,他当了第二百师师长,参加了台儿庄、兰封、信阳战役。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二百师扩编为第五军、新十一军。杜任五军军长。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军队在新战区为日军所迫,请中国方面派军队去缅甸,以解除向前挺进的日军对英军的压力。1942年3月,国民政府派出五军、六军、六十六军,以罗卓英为总司令,而五军、六军则由美军中印缅战区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中将直接指挥。

远征军首战顺利,杜所率第五军包括二十二、九十六、二百三个师。史迪威称杜聿明是“好样的,计谋周详,斗志旺盛”。3月8日,日军攻占仰光,进军北上,二百师戴安澜部已于先一日据守东瓜,力阻日军五十五师达十二天之久。二十二师迂回采取钳形攻势,史迪威眼见将取得重大胜利,下令联合攻击。不久他就了解到他毕竟并非现场指挥:美国的官方战史记载说:“杜寻找种种理由说明为什么不能发起进攻”。以后真相大白,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保持着对部队的直接控制,这些部队仅仅在名义上归史迪威指挥。蒋绕过史迪威向罗卓英、杜聿明直接下命令。杜的二十二师按兵不动,二百师则在3月29日被迫撤退。

进一步的作战行动要求第五军的三个师协同动作,设下埋伏。第一步计划算是顺利执行了,1942年4月的埋伏计划也将实施。正当此时,英军的后撤和失败显然使重庆产生了另一种想法,蒋介石前后矛盾的命令使指挥更为困难。史迪威给杜聿明的命令未见执行,中国某些部队遭到重大损失,伊洛瓦底阵地失守。4月底,日军占领腊戍,切断滇缅公路,中英军队开始从缅甸向印度和中国作灾难性的撤退。二百师撤入中国境内,五军其他各部则向印度方面运动。当二十二师、九十六师几天之内能安全到达印度境内时,杜聿明收到蒋介石令其撤入中国境内的命令。两个师于是改变行军方向,并且由于收到了自相矛盾的命令而互相分手,企图各自撤回中国,结果,二十二师回国时阵容严

整，九十六师却很不妙。

1943年1月，杜任昆明Y后备部队（第五集团军）司令。他在战争期间，一直任这个美械部队司令。1945年日军投降，龙云滇军被派去印度支那受降。国民党趁此机会加强其对云南的控制，1945年底，杜发动政变，以卢汉代龙云为云南省主席。

1945年10月15日，杜聿明任东北保安司令，国民党想趁此重建其在东北的统治。10月29日，他飞到长春去和他的上司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会合。东北的军事行动没有成功，11月初，长春的国民党军被中国共产党人限制在行营总部以内，国民党官员于11月17日由飞机撤到北平。1946—47年，东北是国共双方的主要战场。1947年夏，林彪发动进攻，共产党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蒋介石宣布共产党发动叛乱，下令进行全国总动员。8月底，陈诚取代熊式辉，免除杜聿明战地司令之职。1948年10月，杜再任此职，11月，国民党被迫放弃东北。

1948年11月，杜聿明在刘峙手下任徐州前线副司令。1948年11月6日，淮海决战在这个地区开始，双方各有五十万部队。一开头，国民党就惨遭失败。11月28日，刘峙、蒋纬国和第十三兵团的李弥部就退出徐州去蚌埠，杜聿明留后。12月1日，杜率后备队企图从徐州突围与第十二兵团会合，后者已在徐州附近中了埋伏。但是杜所率的十三万军队在徐州西面六十里处也同样遭到共产党人的伏击。面临共产党的强大攻势，国民党军队虽坚持了一段时间，终于在1949年1月10日投降。杜化装普通士兵企图从战场逃走，结果被俘获。

杜聿明是三十三名国民党“战犯”之一，1959年12月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将他们赦免，声称他们“承认了罪行，并且已经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杜月笙 原名：杜镛

杜月笙（1888.8.22—1951.8.16），上海秘密帮会头目，银行家，实业家，慈善家，社会名流，并以他个人在中日战争期间对国民党有功而知名。

杜月笙生在黄浦江南岸的高桥，幼年即成孤儿，由贫苦农民的亲戚抚养。

二十岁时，和同村青年人过江到上海大都会谋生，在法租界一个青帮水果商那里当学徒，由此就和青帮来往。他多谋善算，好交朋友，当即为帮会头目所注意，成了走私贩头目黄金荣的门徒。当时（1912年），鸦片走私是中国下层社会经营获利极厚的行业，黄金荣是其重要头目，他叫杜月笙经营其中的一家业务，杜就乘此发家，成了一名青帮的重要头目。

1924年，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开战，卢是杜月笙的朋友，他控制了上海，尽管上海属于江苏。9月，杜应卢之请，募集了二千人维持上海秩序。他的手段和影响引起了中国其他地区军政界首脑的注意。1925年，卢失败，杜创办一个机构收容难民。

1927年3月，北伐军到上海，杜月笙支持国民党保守派蒋介石。他以少将的临时军衔，组织帮会分子反对共产党控制的上海工人运动。4月12日，杜月笙和蒋介石的其他支持者，包括第二十六军，进行了血腥的清共，一百多人被杀，数百人被捕后处死。这次事变，使杜月笙既成了一名英雄又成了一名恶棍。

同时，杜月笙在一些合法的实业活动中也取得了成功，他控制中汇银行，上海浦东储蓄银行，还当上了上海交易所和上海棉布交易所的经理。1928年调解法租界水电公司劳资纠纷成功而为许多上海人所称颂。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他在《中国年鉴》上被称为是“法租界的闻人”。

1932年，日军袭击上海，十九路军坚决抵抗而闻名全球。杜月笙发起为十九路军捐款和捐物品，他个人捐献二辆坦克。战争结束，募捐运动的领导人组织上海公民协会，史量才为会长，杜月笙为副会长，史遇刺后，杜继任会长。

中日战争前几年，杜月笙的名声和影响达于顶点。1936年他在高桥建立祠堂，落成仪式豪华异常，可与古代帝王的庆典媲美。国民政府首要人物，省当局、工商业界、银行界都派人参加或赠送礼物。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8月波及上海，杜利用上海公民协会开展抗日运动。他还接收大达轮船公司的全部船只交给国民政府，作为封锁长江下游之用。1938年下半年，杜被迫离开上海去香港，一直住到1941年，并继续为战争尽力。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对沦陷区难民表示关心，还帮助日占区的中国特工人员并协调他们的行动。1940年，陶希圣、高宗武携带汪精卫的对日密约逃

往香港，杜设法救出被当作人质的陶希圣的三个孩子。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杜幸运地正在前往重庆途中。此后数年，他一直住在重庆。1939年他在重庆开了一家纺织厂，一家面粉厂，在昆明开了一家造纸厂，因而他把一部分精力用在实业上。他在国民政府中有一些名义职务，但他的主要兴趣却在经营上述各厂及中国商业银行。他和中国地下活动继续合作，因此与戴笠的关系密切。

战争结束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3日到上海。由于他在战时的工作，他受到了像迎接英雄一样的欢迎。他重操银行业及工商方面的业务，并担任《申报》理事长。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占领上海前夕，他去香港。1951年8月16日死在香港，年六十四岁，遗言希望葬在台湾。1953年6月28日他的遗体运往台湾，葬在台北近郊。杜遗有继妻，三个小老婆，八个儿子，三个女儿。

杜月笙的一生几乎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他被人们说成是一名匪徒，侠士，弱者的保护人，才能之士的恩人，爱国者。也许，全都有一点。

段祺瑞 字：芝泉 号：正道老人

段祺瑞（1865.3.6—1936.11.2），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912—14年任陆军总长，1916年4月至6月、1916年6月至1917年5月、1917年7月至11月、1918年3月至12月，任国务总理，1924年11月至1926年4月，任北京临时执政。

段祺瑞在兄弟三人中居长，数世从军，他祖父段佩与刘铭传等安徽合肥同乡合办团练，由李鸿章统率攻打太平军，在刘部官至统领（旅长），1872年后驻江苏宿迁。是年，段祺瑞七岁去宿迁，随祖父读书至1879年祖父去世。

1881年段祺瑞十六岁时，随堂叔去山东威海卫从军，当一名小军官。1884年考入新建的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经三年外国教官的新式军事训练后，1887年名列前茅毕业，去旅顺监修炮台。1888年，李鸿章派段祺瑞等五人出洋留学。1889年春到德国，在柏林学军事，又去克虏伯兵工厂实习。1890年秋回国，在北洋军械局任职，1891—94年任威海卫随营武备学堂教官。

1895年，段调天津小站袁世凯新建陆军，任炮队统带（营长）兼随营学堂监督，他对北洋军军事机器的建立作了重要贡献。1899年，袁世凯署代山东巡抚，段率武卫右军随同去山东警卫济南。两年后，袁调任直隶总督，携段同行并提升为补用道员，1902年因平定冀南匪患有功荐段为候补道台。

段祺瑞是袁世凯的主要军事助手，在清政府扩充军队和谋求军队现代化中起了重要作用。1902年夏袁世凯对所部进行改组，设立军政司以段为军政司参谋处总办，负责军事计划工作，1903年12月，清政府应袁世凯之请，成立练兵处，袁任会办大臣，段任军令司正使，负责军事计划、测绘、军需事宜。袁奉命扩编北洋各师，段先后担任一些新建单位的指挥之职。1904年6月第三镇（师）成立时，任该镇翼长，1905年2月，调任第四镇统制（师长），1905年9月调任第六镇统制。

1906年初，段一度再任第三镇统制，兼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三年。1906年3月，授福州汀州镇总兵，但仍留在直隶任袁世凯在保定总部附属的军官学堂总办。1909年，重任第六镇统制，1910年12月任江苏江北提督。1911年武昌起义后，段调回北京。10月27日，袁世凯取代满族荫昌任湖北钦差大臣，任段为第二军军统（军长）。袁世凯在北京控制了清政府后，于11月17日任段署湖广总督，兼领湖北各军，同时继冯国璋任第一军军统。

清末几年中，段祺瑞和其他北洋将领一样，首先是忠于袁世凯，而不是忠于清廷。他全力支持袁世凯任民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20日，段任陆军总长，此后三年除短期离职外，他在历届内阁中均保留此职。1913年5月至7月，曾代理国务总理。1913年12月去汉口劝请不愿就任的黎元洪到京任副总统，黎答应后，段即留任湖北都督，使该省落入北洋军之手。1914年2月至3月，任河南都督，负责指挥镇压遍及华中的白狼的骚扰。

1914年间，段祺瑞是袁世凯手下最有权势的人物，他拥有训练、调遣军队和选拔、提升军官的权力，北洋军中的许多年轻军官，视段为恩主超过袁世凯。1914年春，袁采取步骤，收回前此因政府事务的压力而转交给段的权力。5月初，袁世凯改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设“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陆军部的部分权力转归自己直接掌握。段因此大为不满，把部务交给次长徐树铮，不再到

部办事。后来，他决定反对袁称帝，于1915年5月31日辞职。

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并不顺利，1916年3月又请出段祺瑞来为其解围。段答应出任参谋总长，但以袁恢复共和政府为条件。4月22日，袁表示交出实权，段答应任代国务总理。翌日，段成立新内阁，掌握关键性岗位陆军总长之职，要求将全部军事权力交还陆军部，袁仍多方挟制，段得知其不愿交权，双方由此争斗不已，直至1916年6月袁死去。

黎元洪虽继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总统，但袁世凯从前的许多权力却落入段祺瑞手中，他很快改变了政府制度，以他为总理的内阁成为行政权力的中心。1916年6月10日，他解散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权力转归陆军部，月底，又废除了袁世凯所制订的多种法令。他并不了解什么叫议会政治，勉强同意了南方军政首领的要求，废除了袁世凯1914年的新约法，恢复1912年的临时约法，召开1914年被袁世凯解散的旧国会。

段祺瑞由总统和1916年8月1日重开的国会认可，成为国务总理。不久，他对他的权力所受到的法律上的限制公开表示不满，这激起了黎元洪和国会的反对，段和黎历来不和。他依仗北洋武力来抵制反对势力。1916和1917年，张勋在徐州召开省区联合会，会上以倪嗣冲为首的北洋将领申明支持段政府。1917年春，北京政府的注意力集中于对德关系。1917年2月，美国施加压力要北京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一方，日本原来反对中国参战，这时也改变态度，要北京政府对德宣战。1917年3月14日，段取得国会同意立即与德绝交。接着他谋求发表参战声明，但国会以及北洋军阀内部对此意见分歧。4月25日，段召各督军在北京开会，就参战问题取得了一致同意。他得到这个支持后，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通过参战提案。国会议员愤于段组织的“公民团”的殴辱及段祺瑞向日本借款，要求段祺瑞下台，作为通过参战提案的交换条件。鉴于段显然不再能控制北京政局，5月23日，黎元洪乘机免去段国务总理之职。

段祺瑞声称黎元洪的举动为非法，乃往天津，决定和支持者们一起以武力驱除黎元洪，重掌北京政府。经段策划，倪嗣冲等北方督军宣布独立，并准备派部队进军北京。段虽对此保持缄默，他的支持者们为得到保皇派张勋的支持，

假装同意张勋复辟清皇的要求。张勋进北京后，6月14日宣布复辟，段却公开谴责，并自任总司令，率曹錕的部队、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和李长泰的第八师，迅速击败张勋，于7月14日开进北京，立即宣布复辟失败，逮捕为首人物，重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7月17日，宣布新内阁名单，阁员除其亲信外，又加上了研究系的梁启超、汤化龙。黎元洪被迫辞职，由冯国璋继任总统。

此时，段祺瑞再没有黎元洪和国会的阻挠，遂得以于1917年8月14日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参战宣言。但是在国内事务方面，他却面临许多复杂问题。以他的追随者为主的国会召开时，华南持不同政见的领导人以孙逸仙、陆荣廷、唐继尧为首，在南方成立军政府，举行护法运动，反对段政府。段祺瑞等人主张用武力消灭反对派，统一全国。1917年夏，段任其亲信傅良佐继谭延闿为湖南督军，并调军队进入湖南，准备进犯两广。

段祺瑞武力统一的计划不但受到南方首领，也受到北洋军阀内部的反对。长江一带的冯国璋等人主张和平统一。冯之所以反对，部分原因在于他和段争夺北洋军队的领导权。这种权力之争，使北洋军阀内部形成了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1917年秋，段压服湖南、四川的活动遭到失败，冯国璋的支持者通电要求与南方实行和平解决。段对此以辞职退居天津老巢作为回答。

冯国璋及继段任总理的王士珍等人谋求与南方首领举行和平谈判时，段的支持者们会集在他的周围图谋卷土重来。1917年12月3日，段祺瑞手下的人物，由徐树铮召集军事将领在天津开会。三天后，倪嗣冲、张作霖等人联合要求冯国璋讨伐西南各省。这次显示力量的做法迫使冯作了让步。12月18日，冯任段为参战军督办，段以此加紧对冯施加压力，迫其改变妥协政策，下令对南方继续作战，增派曹錕、张怀芝的部队进入湖北、湖南。1918年2月底，张作霖允以军力支助徐树铮，使段的影响更为增强。3月19日，大部分北洋军阀包括十八名督军联名通电，要冯国璋恢复段的国务总理职务。冯不得不表同意，3月23日，段祺瑞复职。

段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国务总理任内（1918年3月至10日），利用两个

强有力的机构实施对北京政府的控制。一个是“督办参战事务处”，负责组织和训练军队，名义是为了派遣军队去欧洲参战，实际上是用来实现武力统一全国的打算。另一个是“安福俱乐部”，主要是政治活动机构，由徐树铮、王揖唐在1918年3月7日创立，其目的是影响定于6月举行的国会选举，并操纵这个新机构，以利于实施段祺瑞的政策。

这两个机构的活动，都反映了段政权和日本方面的密切联系。1917—18年间，段政府签订了西原借款的一批协定，日本从中取得中国的不少路权、矿权和其他权益。借款名为发展经济，但大部分用来作为反对南方各省的军费和安福俱乐部的活动经费。段并以一部分借款扩建新军。在督办参战事务处主持下，中国政府和日本签订秘密军事互助协定，由日本给新建参战军以经费、训练和装备，日本则取得在东北和蒙古驻军之权。通过这些协定，日本在中国的影响达于高峰。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继段祺瑞的劲敌冯国璋为大总统，冯退出政界。同一天，段为缓和舆论，也辞职了。但是他的权力并未稍减，他通过参战处和安福俱乐部继续操纵北京政府达两年之久。9月28日，他又取得日本借款，资助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束后，他仍扩大参战军。1919年初，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南方代表要求解散参战军，废除与日本订立的军事协定。北京政府为避免对此的指责，于6月29日，改参战处为“督办边防军公署”，以段祺瑞为边防督办，改参战军为“西北边防军”，以徐树铮为总司令。由于得到日本的继续支持，西北边防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武力，引起了一些北洋军阀及西南军人的恐惧。

北京政府不久招致公众的不满。安福俱乐部的专横行为和它操纵的国会声名狼籍。日本军官在训练中国军队中的突出地位以及日本从西原借款所取得的特权，引起了学生的愤慨。巴黎和会中，段政府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秘密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到国内，触发了学生的愤怒情绪，导致1919年5月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但是，对段祺瑞的权力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其他北方将领，特别是曹锟及其令人敬畏的部下吴佩孚等人所表现的不满。吴佩孚对段祺瑞怨怒日增，不断批评段的统治，反对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反对他秘密借贷日款。同时，徐树

铮的势力向外蒙迅速发展，威胁了张作霖的利益，张因此也与段政府发生冲突。

1920年7月，段祺瑞的敌对势力准备采取行动。直系曹锟和奉系张作霖联合，吴佩孚派兵北上。为对付面临的进攻，7月6日，段祺瑞宣布成立“定国军”，由西北边防军的三个师，徐树铮的一个混成旅及北洋第十五师组成。7月14日，与直军接火，由此爆发了直皖战争。直军得到张作霖部队的支援，在北京南部一些战斗中打败了皖军。五天后，7月19日，徐世昌下令停战，7月28日，接受段祺瑞辞去边防督办之职，并解散了这个机构。翌月，西北边防军和安福俱乐部也都解散了。

直皖战争使段祺瑞丧失了在北方的霸主地位。鉴于北京政府的有效控制转归敌手，他退居天津，静候了四年，1924年秋又重新上台。那时，吴佩孚失败，曹锟被赶下总统职位，得胜的冯玉祥、张作霖要物色一个人来主持北京政府。段祺瑞是北洋元老，他虽已无军力，但仍有相当声望，因而是冯、张以及长江流域各省督军可以接受的人物。11月24日他出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

北方的军阀，认真地考虑了组织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以代替信用扫地的曹锟政府。他们摆出要和国民党和解的姿态，由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联名请孙逸仙到北京讨论组织政府事宜。孙逸仙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定政府组织。为了表示和孙的主张相一致，段祺瑞宣布在一个月内召开“善后会议”，两个月后召开国民代表会议。但12月初，当孙逸仙到天津时，段却已将临时政府组织条例加以公布。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段祺瑞不愿孙逸仙和国民党干预政府的组织，及其以后的工作。孙和段关于善后会议组成问题的谈判迅即破裂。段不顾孙逸仙等人的强烈抗议，着手于1925年2月1日召开了没有国民党参加的善后会议，这个善后会议随后又几次开会讨论通过了召开国民会议的组织条例。1925年春夏之间，段政府装出样子，准备召开国民会议，成立起草新宪法的委员会，规定议员的选举日期。这些措置，都不过是用来安抚舆论的象征性姿态罢了。

1925年秋，冯玉祥、张作霖之争，使段的地位趋于不稳，他觉得他不能同时两面讨好，决定那一边占上风他就站在那一边。1926年4月，段未能取得获

胜的张作霖的支持，4月20日辞职去天津日本租界。此后，他信佛念经又资助贫苦有为的学生。1931年9月，日本占领东北后，不少一度有名的人物被敦促参加华北伪政府。段祺瑞在执政时是亲日派，但这次却拒绝了日本在他身上所打的一切主意。1933年1月，段离开天津去上海，1936年11月2日因胃溃疡死去。

段祺瑞有两个弟弟：两个儿子，段芝罘(1873—1921)和段芝宣(1874—1927)，后者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曾在徐世昌东三省总督任内任训练督办。段祺瑞与前妻吴氏于1886年结婚，吴氏于1900年死去，一年后又续娶张姓女子。有子两人，都活到成年，段宏业生于1887，段宏范生于1918年。

段 锡 朋 字：书诒

段锡朋(1896—1948.12.26)，1919年五四游行时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主席。1925年、1926年先后在武昌大学、广东大学教历史。1932—37年任教育部次长，1938年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席。

段锡朋生在江西永新的一个读书人家里，幼年在家读中国古书，后进永新附近的师范学校学英语。1916年毕业后由官费去北京进北京大学政法科。他是蔡元培当校长的北京大学黄金时代的一个学生。

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秘密条约引起1917—18年学生的骚动。西原借款和1918年5月签订的中日军事互助协定引起了1918年5月21日北京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段锡朋等十三名学生代表当天会见冯国璋，要求获知中日条约内容并废除这些条约。他们的目的虽未达到，但1918年的示威游行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促进了学生的联合并为1919年五四事件中的联合行动作了准备。

段锡朋参与组织了1919年的五四游行，游行结果是三十二名学生被捕。5月5日，他主持了大约三千人的学生集会，要求释放三十二名被捕学生，并决定为此举行总罢课直至学生被释。他们又通过决议要求归还青岛，惩处亲日官吏。他们组织了北京学生联合会推进五四爱国运动，段是主要代表之一。上述

要求被政府拒绝，段锡朋等人去上海组织全国学联，6月16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大同旅社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宣告成立，出席学生代表三十人，来宾二百多人。两天后，选段为主席，任期一年。全国学联作为当时组织得最好的团体之一，成了一个极有效能的施加压力的社团，它促使被捕学生获释并免除了几个亲日官吏。

段锡朋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1920—24年，先后进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秋，段回国在武昌大学当历史教授，翌年去广州，任广东大学历史系主任。

1926年，陈果夫把段锡朋带进国民党组织部，以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影响。11日，陈派段去江西视察党务。段发现该省国民党已由共产党人方志敏等人所控制，乃组织A.B.（反布尔什维克）团以资抗衡。他的活动为武汉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所阻。1927年4月1日，江西党政机构奉命改组，开除反共官员，次日，逮捕了一些反共成员，4月4日，段化装逃走到上海，嗣后，在国民党的清共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1930年，段任蒋介石南昌行营党务指导处长，导淮委员会委员。1932年6月，任教育部次长，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校长。由于学生的反对，该校校长已缺任一段时间，段就任时，学生群起殴辱，行政院遂下令暂行解散该校。段继任教育部次长至1937年。

1938年2月，段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席，中训团是国民党主要的干部训练中心。中日战争期间，他一直从事中央训练团的工作。1948年12月26日因肺癌死在上海。上海和香港的一些报纸称赞他是始终怀有革命精神的正直的政治家。

董 其 武

董其武（1899—），山西将领，傅作义的老部下，1947年任绥远省主席，并因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人所作的起义安排，保留此职至1952年7月。

董其武，山西河津人，幼随舅父范必英读书，舅父向他灌输了有关政治变

革的思想。董进入附近的中学后，又进了太原斌业军校，1924年毕业后去广州，翌年，投入新建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由排长升为团长。

1928年夏，在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手下当参谋军官，从此就随从了傅作义。他先在傅的第十军中担任指挥员，1931年，任三十五军三十六团团长的。1931年底傅任绥远省主席后，董和孙兰峰一起在绥东剿匪，1933年又一起参加抵抗日军进犯内蒙的战役和在长城的战斗。1934年进庐山训练团进修后升任旅长。1936年11月，他和孙兰峰在傅作义指挥下把德王逐出百灵庙。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董在傅作义指挥下在绥远和山西作战，曾在宁武战役中受伤，但未下战场。他参加守卫太原，该地在11月为日军所占。董在战争中的表现使他升任一〇一师师长。1939年，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同年冬部署部队在绥远省包头抗击日军。1940年春，日军大举反攻，傅军在五原大胜，此次战役，董其武的一百〇一师从侧翼迂回袭击日本援军有功，于是改任骑兵第四军军长，1944年任三十五军军长。

1945年7月，绥远、宁夏建立第十二战区，傅作义任司令官，董其武任政治处长。战争结束后，董奉命去包头接受日本投降并阻止共产党的进袭。他因阻击贺龙、肖克的部队而受到嘉奖。1945年9月完成解除日军武装的工作。1946年4月，董任暂编第三军军长。9月，董率领第十二战区的部队收复集宁，解大同之围，并占领张家口，国民政府遂委任他为张家口警备司令。11月，傅作义任察哈尔省主席，董任绥远省主席。

1949年1月，傅作义在北平向中国共产党人投诚时，提出了保留其在绥远的部队及保护董其武及孙兰峰的要求。9月，董作为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2月，继任绥远省主席，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并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迁往归绥，乌兰夫继任绥远省主席，董仍任省行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6月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后政府改组时，董不再任华北行政委员而改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9年任全国人大代表和这一届的人大常务委员。同年还在国防委员会任职。此时，很明显，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职位已是荣誉职务而无实际权力。

董 显 光

董显光（1887.11.9—），西名惠灵顿·董，留学美国的新闻记者，蒋介石传记的作者，中日战争期间在重庆任宣传部次长，是为当地西方记者提供新闻的主要人物，1952—1956年任国民党驻日大使，1956—1958年任驻美大使。

董显光生在浙江鄞县的一个小康之家，早年在苏州的教会学校读书，是一名虔诚的长老会教徒。后来在上海劳莱高等学堂，上海高等学堂，英华书院读书。1905年，他在宁波箭金学堂教书，那里有一个学生“认真而有雄心，是一个来自溪口令人不能忘怀的青年，名叫蒋介石”。这两个青年人，年龄相差不到一个月，交上了朋友。1906年，董离宁波去上海，在商务印书馆任职。

1907年，董决定去美国深造，进了密苏里派克学院，翌年进密苏里大学新成立的新闻学校，1912年毕业，随后又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校第一届的学生，同学十二人中有爱克曼，后即成为该校校长。董显光在纽约时任《纽约时报》、《世界报》记者，《独立报》副编辑。

1913年，董回国后任上海各报驻北京记者，并一度担任参议院英文秘书。二次革命后，任上海英文报国民党办的《中华共和报》副编辑，1914—16年任北京英文报《北京时报》编辑，同时任石油管理局英文秘书，并去美国短期访问。1917年任著名的上海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驻北京记者，一年后，升任副编辑，但仍在北京一带工作。1918年兼任直隶水利工程局秘书，1920年任直隶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天津外事局局长祝惺元的顾问。

1920年8月，董任北京政府交通部低级顾问，同年底，任该部铁道财务委员会行政秘书，1922年5月升任交通部参事，1923年任交通总长吴毓麟的秘书，因服务优良，曾获得北京政府颁发的三等、二等嘉禾章和大绶宝光勋章。他离开政府职务后，于1925—1931年任天津《庸报》主编。1926年一度任吴佩孚的外交事务顾问，1929—30年，充任杜锡珪上将的英文秘书周游世界。

此时，国民党已通过北伐统一了大部分中国，政治中心已从北平转到长过下游宁沪地区。1931年董受聘任上海英文报《大陆报》主编，该报虽由伍廷芳创办，并由中方股东控制，但却在美国注册。他聘请了美国积极有为的年青记者如杜丁·爱瑟克等人。1931年中任该报经理。1935年担任一个拥有《大陆报》、《时事新报》、《大晚报》、《申事通讯社》等报大部股金的企业的经理。

1935年，前任张学良顾问和当时蒋介石顾问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通知董显光，说蒋介石希望他担任对外新闻稿的审阅人。端纳称赞董的爱国心，说“效率不高的新闻审查造成了影响不佳的国外宣传。”董允以军事委员会上海办事处秘书之职从事此项工作。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情况表明，除了战场上的战斗之外，还需要从事国际舆论的战斗。因此当军事委员会适应战时需要加以改组后，董任第五厅副厅长，负责国内外舆论工作。当中日在上海作战时，董发起在上海公共租界建立一个委员会宣传中国的抗战事业。委员会由英华学院的夏晋麟后来任驻希腊的大使温源宁、刘湛恩《曼彻斯特卫报》的丁波雷等人组成。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夏去美国，温去香港，丁波雷去英国。他们在董的领导下，从事海外的宣传工作。刘仍在上海，1938年4月7日被害，可能是被日本间谍刺死的。

1937年底，董的那个部门改为宣传部，董任次长，战争期间他一直担任此职。他在汉口成立了一所简陋的办公处，有工作人员二、三十人，由老新闻工作者曾虚白任副职，随同来到汉口的少数外国记者中有乌特来、史沫特莱、阿波格、根室，杜汀。董在汉口十个月，除负责审查和宣传外，也受命处理其他外交事务。董是最后一批撤离汉口的政府人员之一。1938年10月25日夜，日军已进入汉口时，他才离开。他步行十天到了长沙。他在重庆的办事机构正式建立之前，一直在长沙临时办公室工作。

随着战争的进展，更多的外国记者来到重庆。1939年初，他就想建立一个记者旅社以安置外国记者。他得到孔祥熙的一小笔款子，建了一所有十三个房间的宿舍。日本的轰炸使住房减少，这所“董氏寓所”就越加有名了，不少记者如阿金逊、怀特、摩沙、杜汀都在这里住过。讲到这一段生活时，杜汀曾说

，江“董哲光”没有官场的死板、傲慢习气，总是平易近人。在重庆，记者们可以在凌晨四点把他叫醒，争论一件新闻审查得是否得当，或是同他核对一事实，他毫无厌烦情绪。他和他夫人同其他记者一样住在灰泥墙壁的一间小屋里。他不知疲倦地为记者们提供方便并同他们晤谈。”他除了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参阅萧同兹）一起向外国记者提供新闻外，还出版一种通俗刊物《中国在战斗》，并经管XGOY广播电台，该台是彭乐山负责的。经过董的努力，美国著名的出版家震华德、鲁斯等要人都曾被吸引到重庆来过。

在战争期间，董曾三次出国，1942年2月，他陪同蒋介石去印度访问两周，与甘地、尼赫鲁商谈。1942年11月到1943年6月，他陪同宋美龄访问美国，1943年11月，他陪同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

董在美国时，与老同学当时新闻研究院院长爱克曼商谈在重庆创办一所新闻训练学校，经哥伦比亚大学的协助，1943年制订了一个两部分计划。美国国务院使用并派出四名新闻记者到重庆宣传部门任职，其中有泰勒，后来是美国出版局主任。计划的另一部分是由美国工作人员协助在重庆成立新闻学院，美国新闻学校新闻法教授克劳斯1943—44暂行离职去重庆任院长。他的四名教员（后增加为七名）中有贝克，后在1968年任新闻学院代院长。重庆的新闻学院和中央政治学校合作，在1945年夏天停办前共训练了六十多名青年新闻工作者。1945年爱克曼有关重庆新闻学院的成就的报告说，它协助“国务院促进对中国的文化合作，打消了中国官方在提供情报和新闻方面的继续拖延，宣传了新闻自由的原则，教导了中国男女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心，训练他们用美国的方法通过报纸和电台广播采访和发布新闻”。所以，可以说重庆新闻学院实现了董显光对新闻事业的雄心。

由于董在战时工作的成就，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经短期休养后，1947年任行政院新闻处长，翌年任不管部长。共产党接管大陆时，他去了台湾。1950—1952年任中国广播公司经理、国民党中央咨询委员会委员。而后出任驻日大使四年，1956年4月到1958年9月，任驻美大使，主要是充当国民党的发言人。1958年退出公职后，蒋介石任命他为总统府最高谘议，1961年去美国参加道德重整会议。他得了一次中风，小有恢复后，到加里福尼亚和

女儿住在一起。

董显光和赵香英（译音）结婚，有子三人，女三人。幼子于1960年一次飞机失事中身死。

董的英文著作中最著名的是经过认可的《蒋介石：士兵和政治家》，1937年出版，以及《中国日程》，1950年出版，后者记述了董在战时的经历。

董 康 字：绶经 号：诵芬主人

董康（1867.4.16—1947），中国法律、司法界权威人士，北洋政府时曾在北京任内阁总长、大理院长。他以现有有关书籍中汇编早期曲剧珍本享有学术上的声望。

董康，江苏武进人，青年时在江阴南菁书院读书，专注于中国古典文学。1889年中举人，翌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义和团时，授刑部郎中，主理陕西刑事案件。联军进北京后，他应北京城南士绅之请，设巡阅公所维持治安。鉴于该所的成就，占领军不久就将全部行政权力归还刑部中国官员。后授刑部典簿，大理院推丞，于1901年2月26日参与监斩启秀、徐承煜。

1902年，董康的母亲去世，他居家守丧逾期。不久回京，授法律馆编修。他和南菁的同学汪荣宝编修了一部新法律，经议会通过后由清廷颁布。

1912年，董一度任财政总长，后因追查借款事宜过严与段祺瑞不和辞职去欧美日本游历。回国后，于1914—1918年任大理院院长，1918年任法制编纂馆馆长，1920年任司法总长。

1926年底，董康与段祺瑞的矛盾又一次公开化了。段下令江苏督军孙传芳，山东督军张宗昌逮捕董康，董逃往日本，一直到1927年4月。在此之前，作为中国法律界的一个著名权威，他于1925年得到过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26年并任该院教授，1927年董由日本回到上海后，在上海开业做律师，并主持了一所训练法官的专业学校上海法学院。1934年、1935年曾去日本讲法学史，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后，他在北平的日伪政府中很活跃，

任法院院长，司法委员会委员长，大理院首席法官。战后，他的情况不详，可能因投靠日本而被监禁。他死在1947年。

董康除了做过律师和法官外，又是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戏剧的学者，从事汇集古代曲剧珍本，影印了朱有敦（死于1439年）的《杂剧十段锦》，毛西河评点的《西厢记》，此外又编印了阮大成仅存的《石巢传奇四种》，《盛明杂剧》，该书是明代和清初一些著名戏剧家所写剧本汇集。还编印了《曲海总目提要》，包括元明及清初各种剧曲684种的详细目录，该书初稿是黄文洋于1780年编集的，他还著有《诵芬堂丛刊》，收录了一些重要戏曲的唱本和评论文章。

他还是一名古董鉴赏家，喜欢收藏石刻、碑帖、古钱。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虽在战时同日本人合作，但至死仍被人称之为“董圣人”。

董作宾 原名：作仁 字：彦堂 号：平庐

董作宾（1895.3.20—1963.11.23），研究古代殷商时期甲骨文的权威。他是最先建议系统发掘安阳殷墟的人。1950—54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同时任台湾大学教授。董整理殷代历谱是他在研究工作上的主要成就。

董作宾出生在河南南阳的一个小店主的家庭，他出生时，豫北安阳小屯村村民常在田里找到一些牛骨龟甲，有些还刻有一些奇形怪状的字样，农民把这些残片上的字迹刮去作中国古代医书上提到的龙骨卖给药商。1899年就有一些学者注意及此，认为甲骨上所刻的铭文是中国殷商时代的文字，并开始收集，但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只为很少人所知道，南阳这个古老城镇的小店主当然对此更无所知了。

董六岁时，他父亲送他上私塾读书认字，年岁稍长，还读了些古书。他家里很穷，放学回家还要帮父亲料理店务。他年轻时就擅长书法，年节时常书写春联卖钱。十一、二岁时，他对书法的兴趣又转到另一方面，一个刻字的街

坊同意教他刻字，他学着在砖上刻字，十四岁时，就刻石印卖钱，每字铜元四枚，在此期间他养成了对中国古代书法始终不变的兴趣。

1910年，他进了源中高小，学了些新课目。不幸，第二年他兄弟去世，父亲需要他帮忙料理店务而让他退了学。他利用闲暇时间给一些儿童教书挣些钱来贴补家用。1913年，他家的那个店铺又开始出售书籍，他因此可以不花钱读到新书。他和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文会以提高书法水平。

1915年春，董决定重新上学，考取县政府办的师范学校，他入学前剪去了辫子。1916年毕业，成绩最优，留校教书。1915年末，他父亲去世，他要物色一个人来经理店务以便从事自己的行业，直到1917年春还没有找到人，他就卖掉店铺去开封育才馆读书，这是一所训练政府工作人员的学校。那时，他才知道关于刻有文字的兽骨龟甲的事。1919年毕业后，他和同学办了一份《新豫日报》，当了两年编辑。

董渴求知识，1922年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语言学家钱玄同等人的课程一年，暇时又对罗振玉1911年出版的《殷墟书契前编》进行摹印。1923年北大开办研究所，董进了国学系，学习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和历史学。他又担任了《民谣周刊》编辑，以其收入支付生活费用。1924年冬，他和北大师生参加故宫收藏的珍品的分类编目工作。

1925年春，董应聘去福州协和大学教中文，同年冬，回河南中州大学任讲师。1927年夏，回北京任北大研究所国学系干事，8月，他和不少北大师生因抗议北京政府合并九所大学而离开北京去了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和文学院代院长、中文和历史系主任傅斯年结为知交，后来又进了傅斯年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8月，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当时，董因母病回河南，在南阳中学任教。同年暑假，他去安阳考察，发现当地村民仍在殷墟挖掘并出卖甲骨。他向傅斯年建议由中央研究院主持在安阳进行系统发掘，傅同意后任董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10月13日到10月30日，董开始进行现场工作。首次发掘获得甲骨残片784件。自此以后到抗战前由李济主持的十五次安阳发掘，董大多都参加了。1930年11月，他又参加了山东城子崖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1932年董成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1932年3月，董发表了《甲骨文时代研究例》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在这篇著作中，他确定了识别甲骨片上殷代文字分期的十个标准：殷代帝世系年谱；殷先王称号；殷帝姓氏；出土物墓葬地段；异域地名；铭文所述人物；铭文所述事件；铭文的语法结构；铭文的表意结构；铭文的书写形态。由于创立了这些鉴别标准，就可以比较清楚的考查有关殷代统治者的生平和历史事件的记载，按照年代顺序考查殷代的制度、历法、地理资料；确定同时出土的其他文物的年代；并能校勘古今书笈中有关殷代文化的记载。

除安阳的发掘工作外，董又在1933年秋主持了山东滕县的发掘，制订了周公测量台的修复计划，并于1936年考察了古代苏州城的城基。1935年春，他加紧工作，准备刊印安阳甲骨文，1937年春把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由于8月间日军侵入上海，未能出版。1940年又把另一份稿本送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印刷厂排印，《殷墟文字甲编》这本期待已久的书于1941年秋完成了印刷和装订。此时日军几乎已占领中国全部沿海地区，因而此书无法运往内地，日军占领香港后，这些书又遭失散或毁坏，一直到1947年才得以重新出版广为发行。

战争期间，董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长沙、桂林、昆明、南溪，因傅斯年忙于其他工作，该所由董主持。他继续研究殷代历法。他自1931年开始此项研究工作，写过《卜辞中所见之殷历》一书。1943年，著《殷历谱》，这是十多年的研究所得，于1945年出版时，被人誉为纪念碑式的著作。

1946年，他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回南京，应邀作了甲骨文和金文的讲演。1947年1月由上海启程出国，任芝加哥大学客籍教授，并在耶鲁大学讲学。1948年缺席选任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他经夏威夷、日本回国，即着手把历史语言研究所撤往台湾。共产党人接管大陆时，董去了台北，任台湾大学中国古文和历史学教授。1950年夏，他和友人一起创办学术刊物《大陆杂志》。1950年12月傅斯年死后，董继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同年冬，发表《武王伐纣年月日考》，断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111年。这是二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1951年出版《两周历年谱》，1953年出版《殷墟文字乙编》。由于他的学术成就，他于1954年获得教育部的奖金和奖章。

1955年8月，董辞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离去台湾大学教职，以便应香

港大学之请，去该校东方文化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1956年香港大学任他为历史学名誉教授，又任崇智学院历史教授。翌年，他还在新亚洲大学教书。他在香港时，完成了中英文对照的《中国年历总谱》，这是一本很有用的参考书。1957年冬，他在曼谷第九届太平洋科学大会上发表《中国上古史年代》一文。1958年秋又回台湾大学任职。翌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论文集纪念董作宾的六十五岁诞辰。1960年8月，他任台湾大学甲骨文研究教授。1963年11月23日去世。遗有前妻所生的孩子育京（译音）（1932—）、及1935年续娶的熊海萍（译音），及其所生子女五人：晓明（1936—）、晓星（1937—）、晓萍（1939—）、晓义（1944—）、晓武（1946—）。

学者们公认董作宾在历史学方面最大的贡献是他对甲骨文字的研究，他发现了甲骨文学的五个阶段及两种殷历，这样就易于鉴定甲骨文字的年代了。他对甲骨文字的认定和注释丰富了今人对中国古文字的知识。他编订了殷代许多帝王的祭祀历、天文历，可与月蚀相对比。他还系统的编制了中国古代年表，这是研究殷周文化所不可缺少的。

董远峰 字：天骥

董远峰（1883—1941.11.4），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批著名集邮家之一，他对1912年南京和福州发行的独立纪念邮票和1932年国民政府发行的纪念国民党烈士的一套邮票进行了技术上的研究。

董远峰出生在江苏甘泉县（江都、扬州）的一个富裕的望族，他是清代学者官吏董恂的侄子。他父亲注意地方志，酷信王夫之的学说，王的爱国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受到反满运动的重视。

董幼年时受旧式教育，由塾师教读中国典籍。早年父亲去世，他谨守家业，还编订他伯父的那本本地方志《甘棠小志》（1855），汇编家藏图书目录，以及收集江苏书法家的作品。

1908年，董去上海遇见郑振铎，他由清政府派遣出国考察邮票印装事宜。

他认为美国在这方面的技术使印制出来的邮票最难伪造，这种伪造技艺在中国却很发达。他并请了两位美国专家：格兰特、赫奇到中国当印铸局顾问。董和这位美国钞票公司制版师格兰特在上海会见后，就对用中文印制钞票和邮票的工作很感兴趣。

此后十多年中，董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集邮家，并且开始研究自1878年以来的中国邮票的历史。1918年9月他出版将自己研究各通商口岸厦门、烟台、汉口、宁波、汕头、威海卫发行的邮票所作的评注加以出版。此书以优美的中国古文写就并附有手工临摹的邮票详细图样，这是私人印制供南社同仁阅看的。当时齐集上海的一小批集邮者称赞它是第一流作品。董是中国集邮者中对邮票的水印、票孔、纸张、墨样在邮票鉴定中的作用最早加以重视的一人。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期间，董大都住在上海，当时上海是主要的邮票市场。他对早期中国邮票的精湛知识，使他成了集邮事业非常出色的顾问，虽然他个人对研究邮票比买卖邮票更感兴趣。他早期研究各通商口岸邮票的经验，使他成为一个研究罕见的1912年各省发行的独立邮票的权威。他鉴别出了不少赝品，并把研究成果在1924—25年上海中国集邮社出版的《集邮会报》上发表。

董对邮票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他尤其想从邮票及其票面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运用中国邮票以及外国在华发行的邮票，特别是研究其中邮戳的日期和地点来记载和判断历史事件。他对肖像邮票兴趣尤大，1935年他长途跋涉去觅取几个月前共产党在川陕边区发行的一张邮票，那上面有马克思的肖像。收藏和传送共产党文物在国民党地区是要招致嫌疑的，董因此而被捕，犯禁的邮票也为南京当局所没收。由于他一生无懈可击又查不到他同情共产党的真凭实据，董在两周后获释，但他从上海邮票商人处得悉，他的邮票却落在一个素无集邮爱好的国民党大官手中，董对此大为愤怒，他诉诸世交张人杰，张当时虽不再从政，却向蒋介石提出此事并设法追回了这张犯禁的邮票。这件事，可能使董对1928年以后的国民党深感失望，并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仍然决定留在上海。

董留居上海，也出于一种爱国之心，他想要避免中国某些“国宝”落入日

本集邮者之手，那时有不少邮票商因经济困难，被迫出售所藏邮票。1937—41年间，董在上海先发制人，购进了不少稀有的以至独一无二的珍品。他长期研究孙逸仙从事民国革命时期烈士的邮票，其中有如陈其美、朱执信、黄兴、廖仲恺、宋教仁、邓铿等人的肖像邮票。他按照图样设计和印刷的不同，将1932年在北京发行和1939—41年在香港发行的这类邮票编集了一百〇九种式样。1941年他身患肺炎，仍继续收集这类邮票。他死前不久，还在继续研究1941年起在日占区出现的盖有改值印记的烈士邮票。董生性保守，因此竭力避免政治纷争。但是，他在最后所写的文章中却说近来日本的某些邮票从美学角度来看，远比中国邮票为优，这篇文章在他死后于1942年初在上海的一家周刊上发表，其后为南京汪伪政府所赏识并予转载，作为对重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进行文化进攻的一个材料。

就兴趣和风格而言，董远峰有中国旧式鉴赏家的怪癖，他作为一个热情的业余爱好者，却对二十世纪中国邮票事业专业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除邮票以外，他对西方的文化成就不感什么兴趣，而且对邮票也只限于外国在中国印行的邮票。与此同时，他对民国时期流行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倾向所抱的疏远态度促使他去研究早期通商口岸的邮票，这些邮票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斥之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假文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收藏的某些邮票，得到他家属的同意，私下卖给了英国集邮家大卫爵士，据说钟晓鹿（译音）促成了这笔交易，钟是上海《近代邮刊》的编辑，被西方集邮人称之为中国集邮界领袖。董的有些邮票，1964年在伦敦被拍卖。

董远峰关于清末民初各式各样邮票的详尽知识，使他的两个上海集邮同仁马润生与其子马任全便于编订有关资料的目录。马润生于1945年10月死在重庆，他的遗稿由其子补充修订于1947年7月在上海出版，题为《马氏国邮图鉴》，这是中外文对照的书，被公认为是1949年以前最有权威的有关中国邮票的目录书。

乌尼伯英 汉名：吴鹤龄

吴鹤龄（1896.2.8—），内蒙古运动的知识界首领。1930—36年任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1942—45年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政务院长。

吴鹤龄卓索图盟科尔沁右旗人，父刺曼加伯（吴凤生）出身平民，是该旗军队的指挥员。是该盟代表，拥有军权。吴早年在家受学于山东举人张昆前（译音），后进热河承德师范，又进政法大学，于1917年毕业。1926年成为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第一个蒙族人，他在北大主修中国文学。

1918年起，吴在北大上学时，即在北京蒙藏学校任教，这是科尔沁右旗王公贡桑诺尔布于1912年为蒙族青年创办的学校，学生中有白云梯、郭道甫、方明达等人。吴协助贡桑在蒙藏事务处工作，并在北京内务部任职。1924年后，在珠洵中学教书，又在北京高等学校工作，并曾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

吴学习认真，并接受了当时新思想的影响，但他并不介入急进和革命潮流。他与郭道甫、白云梯、方明达、乌兰夫等主张社会革命的蒙族青年不同，主张用改良的方法促成蒙族的统一和强盛。用政治手腕达到蒙古自治，而且虽然大蒙族主义强烈地侵袭着他，他却认为内蒙已错过了于1911年辛亥革命时脱离中国而独立并与外蒙统一的机会。因此，他力求在中华民国的行政结构内，通过加强蒙族合法自治地位的长期复杂过程，来争取政治上的自决权并保存蒙族文化。与此同时，他要求对蒙古各旗半封建性的行政制度进行改革。

1928年6月，北伐完成后，白云梯负责改组北京的蒙藏办事处，吴鹤龄等人，对此决定感到沮丧。1929年8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把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蒙族特别区改为行省后，他们的不满增强了。于是，吴鹤龄和其他在北京的各旗代表，组成代表团于11月去南京要求依据孙逸仙的《建国大纲》给予自治权。代表团没有达到目的，除吴鹤龄以外都离开南京。吴认为留驻首都可以为蒙族多所陈言，他寓居南京并成立了蒙旗驻京办事处，

一方面协助蒙族学生，一方面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争取蒙古自治。

1928年底，国民政府成立蒙藏委员会，1929年1月1日以阎锡山为委员长。白云梯当了一名委员，吴鹤龄则参加了蒙事处工作，1930年当了处长。他不久建议召开蒙事会议讨论重要问题。1930年5月，四十多名代表在南京开会，结果是国民政府作出让步，答应吸收十五名蒙古代表参加于下一年召开的国民会议，同时又就“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达成了协议。1931年国民会议开会，十五名代表极力希望通过他们的提案，他们由吴鹤龄率领聚集在一起，声言如果他们的要求不被采纳，就集体自杀。1931年10月12日会议通过了各盟部旗组织法，不久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这是吴的很大成就，由此而从法律上保证了各盟旗的完整性及其与内蒙古各汉族省份的关系以及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并规定取消政治上的世袭制以改革盟旗行政。但是这个法律使吴鹤龄感到失望的是，它没有规定将分散的各不相干盟旗归于统一的办法。

1933年8月，内蒙西部王公电告南京政府，他们打算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可是又出现了新的危机。国民政府派出代表团去百灵庙，代表中有黄绍竑、吴鹤龄，与德王、云王及其他蒙族首领会商。经吴鹤龄和班禅喇嘛调解，达成协议。但是协议条款在南京作了修改，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1934年1月17日通过一个法令将协议内容又作了许多删改，争执再次发生。由于吴鹤龄的反对以及面临组成蒙满联盟的威胁，这个法令几乎立即就撤销了。2月28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吴所拟订的“蒙古自治原则八项”，允许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并终止汉族向内蒙移民。

三十年代中期，吴鹤龄被迫就内蒙和中、日的关系问题作出重大的个人决定。1936年初，日本进占内蒙已不可避免，因南京中国当局无意阻遏日本势力在该地区的扩张。吴深感他本人一旦脱离被日本占领的蒙族地区人士，就将无所作为，就决定回到内蒙。他在同蒋介石的私人谈话中表示决不叛国，按照他们之间的协议，吴死后的讣文将消除任何指控他叛国的责难。吴作出的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因为此后十多年中，日本人将把他当作中国特务，某些蒙族青年将把他当作谋求妥协的保守分子，某些汉人则将认他为战犯。

1936年6月28日，德王在德化成立内蒙军政府，吴任参议部部长。以后，

经过某种形式到日本流放（1939—41年）后，他又当了军政府的继任者，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政务院长。吴鹤龄在张家口主持这个在日军控制下的政府的日常工作。在德王的全力支持下，他在理想主义的蒙族民族主义者和粗暴的日本军事当局之间起着缓冲作用。虽然他并不煽动青年人争取蒙古独立的雄心，但却大力鼓舞他们为本民族人民服务。他在张家口筹划和开办一所特别学校，训练了几百名学生到日本留学。

吴鹤龄这一时期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是发展了合作制度，这种经济组织具有几重目的：帮助蒙古人摆脱汉人历来的经济束缚，确定货物的标准出售价格，在日本占领时期发展蒙古经济、增加收入以谋求民族的发展和加强民族自治。除供销合作以外，吴鹤龄和其他蒙族首领还在游牧地区提倡挤奶和加工奶制品的现代技术。

吴在张家口任职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共产党接管这个地区为止。他不愿听从共产党，遂从张家口南下并将全家迁往台湾。他奉德王之命飞往宁夏企图组织蒙族进行抵抗。他的企图宣告失败，部分原因是彭德怀率领的共产党部队进军神速。吴及其他蒙古首领逃到台湾。他身患心脏病及其他严重疾病，但仍吁请国民政府实行进步政策以取得蒙族支持。

万家宝 笔名：曹禹

万家宝（1910—），以曹禹闻名，剧作家，《雷雨》是他的名著。1949年后致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活动，195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曹禹出生在湖北钟祥的一个富裕家庭，后进天津南开中学，和张伯岭的兄弟张彭春是该校剧社的热心分子。他多次在校演出，并和张彭春翻译高尔斯华绥的剧本《奋斗》。1930年曹进了清华大学，研究西方文学，1933年毕业后留校一年。1935年，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由复旦大学剧社在欧阳予倩、洪深导演下在上海上演，后又由中国旅行剧团巡回演出，在每个城市都得到很大成功。此后六年中，他又写了五种剧本，1935年的《日出》于1936年获得《大公

报》戏剧奖，1936年的《原野》，1940年的《蜕变》、《北京人》，1941年改编巴金的小说《家》。

1934年，曹禺任天津女子师范学院英语教授，1935—40年任南京国立戏剧学院教授兼院长，中日战争爆发后迁往江安，同时又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英语系教书。战争结束后，曹回上海。1946年3月，他和老舍应美国国务院文化合作奖金之聘去美国，参加了丹佛大学的作家会议，又应加拿大政府之聘去加拿大，并和劳伦斯合作改编《北京人》。1946年12月，曹因母病由美国回上海，任文华影片公司编剧。此外，他又在上海市实验戏剧学校讲课，还写了剧本《桥》，发表于《文艺复兴》杂志。

曹禺支持中国共产党接管大陆，出席了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任主席团成员，又任中国代表团成员去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回国后，当选为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委。1950年任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中国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54年以湖北代表资格出席全国人大。1956年出席新德里亚洲作家会议，又出席长崎的禁止原子弹氢弹的世界大会。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确定在老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五十年代中期，他参加了反对“右派”及“反党作家”的斗争，如1955年反胡风、丁玲等人，1957年反对吴祖光、萧乾的斗争。1958年任中蒙友好协会副会长，10月，任《收获》杂志编辑部编辑，1960年8月，任中国戏剧协会副会长。

曹禺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改写他早期的剧本，但未成功，因而从1946年起的十年间，他没有什么创作。1956年他写的《明朗的天》在北京上演，剧本描写一个前协和医学院的细菌学专家，由于朝鲜战场上出现了细菌战而改变了他从事科学研究的主意，志愿到朝鲜前线参战。这个剧本曾获得中央人民政府的嘉奖，但从近代西方样本来说，其对话和舞台效果都不是很出色的，而且又明显地为反美宣传所困扰的。1958年，他收集发表在报刊上的论文，刊出了《迎春集》。1962年，他和其他的人合作写了五幕历史剧《胆剑篇》，剧本取材于先秦的一个故事，述说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之间的斗争以及越国在经受多次失败和羞辱之后终于战胜吴国。《曹禺剧本选》，先后于1952年，1954年，1961年

在北京及其他地区出版。

曹禺的剧作家名声是由于他早期的剧本而取得的。这些剧本可以说对近代中国的西洋戏剧（话剧）作出了最重要贡献。虽然他早期的才华在以后的年月里未再发挥出来，他的这些成就却已名垂戏剧史册。他的主要著作《雷雨》是一部四幕长剧，附有序幕和尾声。它描写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由于不同的男女成员之间的私通而瓦解，这些人的精神上的破产由于在演出时以行将袭来的雷雨为陪衬而加强了戏剧气氛。这个剧本人物塑造巧妙，对话动人，情节生动。这三点是曹禺所有剧本的基本要素。他运用西方舞台技艺取得很大成功。易卜生、高尔斯华绥的现实主义，加上希腊剧作家的沉郁的宿命论，贯穿于曹禺的所有剧本之中。他强调人世的悲惨和堕落，从而揭露了社会的腐败，但也向人们展示补救的希望。例如，在《日出》中他描写一个女孩生活在都市的罪恶和诱惑之中，正当她想自杀的时候，他忠诚的爱人从乡村来到她身边，鼓励她面向未来。《原野》的主题是在复杂的家庭关系中人们对强迫婚姻制度的命运进行了搏斗，作者在剧本中对这些人寄予了同情。《北京人》讽刺了旧的家庭生活的堕落和一个留学生的无能。在这些题材下面，作者实际上是对整个文化提出了谴责。《蜕变》描写一个女医生改造一所腐败的战时医院，她的抗日英雄的儿子在那里动了一个大手术。这个剧本描写社会责任和个人感情之间的冲突，曹禺以此预示了中国的新生。《家》是一出舞台悲剧，描写受到挫折的爱情，对中国的旧道德进行了谴责。

曹禺洞悉中国人的心理，他的剧中人总是活生生地出现在观众面前。当他写成第一个剧本时，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初创时期已经过去，正在有力地向前发展。大都市里有欣赏能力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观众迅速增加。由于有这样的潜在的支持，而曹禺又有坚定的现实主义才华并且掌握了舞台艺术所需要的深湛的实际知识，因此，他必然能够立即取得成功。除了这些主要作品之外，曹禺还写了些独幕剧，翻译了一些作品，主要的有中日战争期间出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曹禺和清华同学郑珣结婚，她是一个法官的女儿。

万福麟 字：寿山

万福麟（1880—1951.7），东北军将领，1929—31年任黑龙江省主席，1932—1938年任五十三军军长，后被控失职。1941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万福麟，吉林农安人。他的家庭身世和早期情况不详。很早就东北当兵，1906年任奉天巡防营骑兵队官，后由营长、团长升为五十七旅旅长，二十九师师长。1921年，张作霖任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为黑龙江督军。五十七旅旅长万福麟驻防中东路哈尔滨满洲里地区，警卫满洲里、海拉尔。

二十年代初期，万统率十七师及黑龙江保安队。1926年任第八军军长兼十七师师长。1927年，张作霖、吴佩孚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万福麟在华北与傅作义部队作战。其上司奉军高级军官吴俊升等人陪同张作霖于1928年6月撤出华北，在沈阳附近火车遇炸，吴与张作霖等都身死。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继任，以万福麟继吴俊升为代理黑龙江军务督办。

1928年12月，张学良将东北地区归顺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但东北局势仍不稳定，因张学良当权后，与其父的统参议杨宇廷冲突，张于1929年1月将杨处死。张学良在东北的势力，依仗于黑龙江的万福麟，吉林的张作相，热河的汤玉麟才得以巩固。张学良本人控制了南满的辽宁，并与万、汤、张组成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学良为主席。万福麟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黑龙江司令。他和黑龙江省长常阴槐经常发生冲突。

1930年，万福麟追随张学良拒绝参加北方反蒋联盟，万与张作相通电蒋介石支持国民政府。张学良口头上表示效忠蒋介石，却趁机于1930年9月调动军队过长城进入河北省，万福麟的某些部队也进了华北地区。考虑到实际的军事形势，蒋介石和张学良达成了政治上的协定。

日益恶化的中日在东北的关系到1931年进入关键性时期。张学良出兵华北仅一年，1931年9月间日本关东军制造沈阳事件，开始进占东北。当时，张学良和他的许多高级军官和十万名东北军都在华北，万福麟随张学良在北平，事

前把黑龙江的事务交给了那个无能的儿子万国宾。沈阳事件发生后，他没有返回东北，而是任命黑龙江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处理军务。日军迅速由辽宁进军吉林，不久又逼向黑龙江。当时南京方面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万福麟没有回到东北抵抗日本人，于是南京当局乃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

南京方面及东北将领默认日军对东北的占领，导致华北地区发生一些组织上的变化。张学良在东北地区惨败后名誉扫地。1932年8月，国民党当局接受张学良辞去北平绥靖主任之职。张另外得到了在北京的任命，但这些丝毫不能弥补他的故乡的丢失。万福麟在张学良手下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成员，1932年随着华北地区东北军的改组，万所率部队改编为第五十三军，下隶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炮兵旅。

日军进攻热河，这次军事改组当即遭到考验。主要的压力落在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身上，但万福麟的五十三军亦奉命参加防守。1933年2月，日军向张学良和南京国民政府下最后通牒，要求将热河的所有中国军队撤走，接着日军和伪满军队迅速进军，东北军防线立即崩溃，一周内日军就占领了热河。万福麟的老同事张海鹏当了日伪的热河省主席。在严重的政治压力下，张学良于1933年3月在保定会见了蒋介石，提出辞职，并将其所余部队的指挥权交给蒋介石。

随着东北和热河的沦陷和张学良退出政治舞台，万福麟同新建立的华北政权进行合作，该地区的情势在日军的强大压力下恶化了。他一度在何应钦手下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主任，1935年任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当张学良回国，并受命去西北指挥剿共战争时，万福麟的五十三军一部分也调往陕甘地区。1936年12月，张学良在西安拘捕蒋介石，万福麟态度暧昧，他给南京打电报，说他效忠国民党（那时他已是中央执行委员），表示要敦促他的老上司释放蒋介石。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日军沿平汉线迅速南下。万福麟的五十三军驻守保定，表现得并不比在热河时好，不久就遭到重大损失和失败。1938年1月，万福麟等将领（如韩复榘）被控失职，但他逃脱了严厉惩处。1938年武汉

会战中，万的残部实际上全部被歼，他退到重庆时既无军力又无光彩。

万福麟可能由于他和陆军部长何应钦及国民党其他高级军官的私人关系，在战时曾恢复了一些权力，1941年出任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1945年日本投降，蒋介石力谋在东北地区牢固地建立国民党的权势，消灭原东北将领的势力。当与共产党争夺这一关键地区的斗争遇到困难时，蒋介石为时已晚地想利用一些东北将领支持自己的事业，1948年任命万福麟为东北行营政务委员会主任。但国民党的力量已接近尾声，在同年最后几个月中，东北全部落入共产党手中。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后，万福麟撤退到台湾，任全国政治咨询委员会委员，1951年7月死在台中，年七十一岁。

王正廷 字：儒堂

王正廷（1882.7.25—1961.5.21），二十年代中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一度代内阁总理。1928—31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7—38年任驻美大使。

王正廷浙江奉化人，出生前不久，其父亲当上了上海郊区美以美教会（卫理公会）教士。王幼年在奉化本地上学，后去上海进教会学校。1895年十三岁时，进天津英华学院，翌年又进了北洋大学预备班，1900年义和团起事时，他辍学到英华学院教书，后去湖南长沙省立高等学堂教书，1905年去日本留学，在东京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

1907年7月，王去美国进密执安大学，第二年转耶鲁大学，任中国留学生会主席及留美学生教会巡回秘书。1910年在耶鲁大学毕业时被选入美国大学生联合会，接着做了一年研究工作，于1911年6月回国。

王回上海后，任当地青年会干事，其主要的一项任务是为回国留学生找寻职业。1911年的革命，使他的生活大起变化。10月10日武昌起义，国民政府以黎元洪为首在武昌成立，革命者胡瑛任外交部长，因他缺少外事知识又不会讲外语，派人到上海物色译员。王的耶鲁大学同学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推荐了王

正廷。王于11月底到武汉，当时清军重占汉阳，威胁武昌。因政局动荡，他的任命有了变动，当了湖北代表出席在汉口召开的组织临时国民政府的会议。12月2日，被选入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条例的委员会。组织条例于12月3日通过时，他是在这个文件上签字的一人。不久，他和胡瑛以武昌政府代表身份和清政府代表唐绍仪到上海和南方革命党代表伍廷芳谈判。

袁世凯继孙逸仙为民国临时大总统，林森、王正廷任参议院正副议长。1912年3月29日，王由内阁总理唐绍仪任命为工商部次长。因为陈其美在上海没有接任部长之职，由王于5月间任代理总长，5月13日他向内阁提出工作方针，但未能付诸实施，因唐绍仪内阁于6月下台。7月中王也辞职去上海。1913年4月回北京，在张继手下任参议院副议长、临时约法修订委员会主席。他又是国民党驻北京代表，以孙逸仙为首的全国铁路开发局北京分局局长。1913年二次革命，国民党被宣布为非法。王去上海任全国青年会总干事及八十一区（包括香港）国际扶轮社社长。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重开国会，王再次出任参议院副议长，1917年6月，国会又遭到解散，王去广州，任残缺不全议会副议长，这个议会建立了以孙逸仙为首的军政府。1918年4月，军政府改组，孙逸仙去上海，王和另两个代表去美国争取外交承认和经济援助。在美国时他还作为广州政府代表参加陆征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和会期间，在提出将山东归还中国的提案时，在因和会将山东权利转交日本而拒绝于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之举中，他和顾维钧都起了重要作用。

1920年2月，王回国后住在上海，1920—21年在上海开交易所，进出口公司，及吴淞的华丰纱厂。1921年任北京中国大学校长。他担任这个荣誉性职务一直到四十年代。约在此时，他积极鼓吹使在华的各基督教教会组织中国化。1921年重入政界，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1922年2月九国公约的签订和山东问题的解决，标志着以施肇基为首、有顾维钧参加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就。1922年3月，王回国任山东善后事宜督办，6月任中日委员会中国首席代表，处理将山东主权移交中国，又任接收胶济路和青岛商港的督办。

1922年11月底，王继顾维钧在北京任外交总长，12月初一度去青岛筹办中

国的办事机构。1922年12月中至1923年1月，在北京代理内阁总理，不久将这个职务让给张绍曾，并拒不担任张提出的司法总长之职。1923年3月，北京政府派他处理中苏关系，9月起与苏联代表加拉军进行多次谈判，1924年3月签订协定两项，其中规定立即恢复中苏外交关系及建立中东路临时管理机构。由于这些协定没有规定取消苏蒙条约及红军撤出外蒙的条款，内阁不予批准，外交总长顾维钧谴责王在协定上签了字，并将他免职。但很可笑的是，5月31日，顾维钧却又签署了同样内容的协定。

1924年3月，王离北京去河南六河沟任煤矿公司经理，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实行兵变后，又请王回北京，在黄郛内阁先后任外交总长，财政总长。段祺瑞任临时主时执政后，王于11月24日辞职，此后在政治上无所作为。1925年春又主持恢复中苏外交关系的事宜。其间，又任特别关税会议中国代表，会议于1926年3月结束，达成初步协定，规定1929年1月1日起中国可以实行关税自立。1925年12月31日北京内阁改组，王再任外交总长至1926年3月4日。9月，他又卸去中苏谈判之责去上海居住。

王正廷在上海时，任六河沟煤矿公司董事长，纳税华人会主席，全国公路总会会长，远东奥运会主席。1927年8月，王由冯玉祥推荐任陇海铁路督办，又由冯的沟通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关系。1928年王任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委员，后为主任。6月，继黄郛任外交部长。1929年3月，他主持达成关于1928年5月3日济南事件的处理办法；6月，日本正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同月，国民党在东北反苏的危机发生：中国方面于5月间搜查了哈尔滨苏联领事馆，逮捕领馆人员，苏方随即提出外交抗议。6月11日，王答应进行调查。7月10日，国民党夺取中东路及松花江上苏方船只。王发表声明声称国民政府不愿以武力解决中东路问题，中东路事件系因苏方放弃职责乃由华方临时接管，并表示希望保持对苏友好关系。苏方以军事压力终于迫使国民政府于1929年12月22日签订伯力条约，确定中东路及松花江上苏方的权益恢复原状。

1928年6月到1931年9月王任外交部长期间，处理了四十多项重要条约和协定。1930年中，他谈判成功从英国手中收回威海卫，与法国签订关于东京湾的协定，与日本及其他十二个国家签订了关税协定，与希腊、波兰、捷克签

订了商务协定。他的目的是要取得关税自主和废除各国对华不平等条约。王正廷虽然有这些成就，但自1931年9月日本侵占沈阳后，公众舆论却转而反对他，尤其是学生界把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及未能说明国联对日采取有力行动归罪于他。9月28日，大群学生涌进他的办公室，要他立即宣布对日作战，殴打了他，破坏了他的住宅。外交部人员出面干涉，把他转移到一只炮艇上，送到上海住院疗养。9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王正廷辞职。

王正廷身体复元后，一度不再从事政治活动，但他是国府会议、中央政治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年8月，出任驻美大使，但到1937年5月才上任，那时中日战争即将爆发，他的使命面临新的情况。1938年9月，胡适继王任驻美大使，王乃去香港，协助交通银行将部分资财转移到马尼拉。六个月后，他到了重庆，战争期间，他实际上过着退休生活。1944年底，任行政院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日本投降后，他在上海仍任此职。他又是上海市政府委员和立法院委员。

王正廷的妻子在1944年死去，1946年，他又和周长龄的女儿结婚。1949年共产党接管大陆时，他未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1952年他在香港定居，任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1961年5月21日死在香港。

王景春 字：兆熙 西名：C.C.王

王景春（1882.6.30—1956.6.16），他在1928年前是一名出色的长期从事铁道行政管理的人员。1931—1949年在英国任中国政府采购委员会主任。

王景春出生在河北滦县，早年在本地美以美教会（卫理公会）学校读书，他父亲王锡文（译音）是一个牧师。1900年义和团事件波及滦县时，王逃到北京。因为他熟谙英语，就在美国使馆当翻译。1904年，他代表华北商人出席在美国圣路易举行的国际博览会，湖北代表陈光甫也出席了。王于完成任务后，由政府资助，留在美国深造。

1905—60年，王在俄亥俄韦思雷大学学习了科学课目后进了耶鲁大学，1908

年成绩优良毕业于土木工程系。后来又进了伊利诺斯大学，1909年获得硕士，1911年获得经济、铁路行政博士学位，他的论文《英国铁道财政的法律条例》以后在伊利诺斯大学社会科学论丛上发表。他在伊利诺斯大学当研究生时，受到知名外交家伍廷芳的赏识，给以特别官费助学金。王在美国还积极参加学生活动，1907—1908年任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主席，1908—1909年主编《中国留学生月刊》。他在伊利诺斯大学最后两年中，是铁道行政学院的研究员、商业和东方史讲师。

1904—1911年王景春在美国期间，正是孙逸仙国民革命运动的初创时期。王经欧洲回国，孙逸仙任他为南京临时政府外事秘书。孙逸仙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时，王亦辞职。1912年专门从事铁路行政工作，任京奉铁路理事。1913年调任京汉路理事。由于王景春的努力，1912年北京铁道部内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王任代主任，以统一铁路系统的会计和统计工作。委员会请了密执安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当为首席外国顾问。委员会所作的调查表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修筑的铁路利用外资，而各国利益不同，采用不同的施工程序和不同文字，因此管理和财政均极为紊乱。经过七十多次会议的商讨，委员会订立了有关投资经费收支、年度预算、车辆统计、其他重要事项等七套办法。委员会还规定了铁路运行情况年度报告的标准程序和格式。以上各项均在1915年予以实施。由于有了这些新的规定，北京交通部才能对全国铁路实行有效管理并将铁路运行事宜加以简化和规格化。

王景春在特别统一委员会任代主任的结果是1914年受命主持交通部铁路财政会计司，两年后任该部总审计官。1917—1919年任京奉路、京汉路局局长。他的办事能力和正直的人品很快获得中国同事和下属的信任，也得到外国职员的尊敬。虽然中国国内军政纷争不已，但全国铁路事业却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和统一的管理。他的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也大大有助于提高这个行业的服务水平。

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王景春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技术专家，因当时预见到山东省的铁路问题将列入会议议事日程。同年因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而引起西伯利亚地区的混乱情况，乃设立联合技术部管理中东铁路，王任中方代表。1920

年11月,根据特别协定,中东路交还中国,北京政府派王为该局副局长。1921年王任交通部铁道司司长,1922年升任中东路局长,1924年任交通部特别顾问。1927年王担任了最后一个政府职位:邮政总局局长兼邮务总监。王景春在二十年代中,还代表中国出席几次国际会议,主要的有1925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电报会议,1927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无线电信会议。他还积极从事教育事业和社会工作。他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理事长、滦县汇文学校理事长。

王景春于1928年离开铁路行政机关后到美国任中国教育代表团团长三年,检查国外留学生的学习情况。早在1926年他就在对顾维钧为首的中英庚款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工作,咨询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有丁文江、胡适等人,在研究归还中国的英国庚款问题以后,委员会建议将大部分庚款用于发展和维修铁路以及其他生产事业,其利息则用于教育文化事业。经过审慎考虑以后,1931年设立了中英庚款信托委员会。

在这个委员会倡议下,在英国设立了中国政府采购委员会,王景春任理事,自1931年后负责为交通部和全国资源委员会采购铁道物资和其他物资。他和人数很少的办事处人员,用英方的庚子赔款经手采购粤汉路、京赣路的物资,津浦路、胶济路、沪杭甬铁路的检修物资,以及南京浦口轮渡所需的物资。这些物资的价值共计约七百万英镑。此外,又为资源委员会采购轮船、交通部所需电讯设备约五百万英镑。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开始,1939年在欧洲爆发总体战争,这些都使他的工作大为困难了。

王景春负责这项工作达十八年之久,1949年共产党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他关闭了这个机构去美国,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克莱蒙。他退休以后,国民政府还给他一个驻美使馆铁路事务特别顾问的闲职。他在加利福尼亚积极参加卫理公会的活动,还担任克莱蒙研究学院研究亚洲问题的名誉顾问。

王在晚年的活动,主要的是准备编一本供电讯使用的汉字罗马字拼音字典。由于中文并非拼音字,在中国通用的无线电电码是把每个汉字换成几个数字然后转换成莫尔斯电码,拍发和接收电码双方都需要进行译电工作,而国际惯例却禁止在公开通讯中用电报拍发以数码编写的电信。王景春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28年,他就准备编一部汉字拼音通信字典。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美

国继续从事改革汉字的检索方法。1940—41年，王景春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科学评论》和《东方杂志》上发表。1944年，他用中文刊印了一份材料，详细说明他的新汉字索引和罗马字拼音法。他在美国发展了这种把中文电信用“普通语言”（不用电码）加以拍发的体系，这种体系称作凯音体系。王在1955年由加利福尼亚克莱蒙大学出版的《凯音体系索引法》的初版本中介绍了这种方法。据作者自称，这种检索方法对旧的部首检字法作了改进。他的体系的特点是，将汉字中原有的214个部首加以归并，采用汉字互注、一字可查两个部首以及其他一些特殊的方法。

王景春长期患哮喘病，1956年6月16日死于加利福尼亚波摩拿峡谷公共医院，离他的七十四岁生日只有两个星期。克莱蒙地方的《信使报》在讣告中称赞王景春是共产党执政前中国政府中那些最好的官员的代表人物，“他把旧中国的文化基础和西方世界的技术训练结合在一起”。也许对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财产为数不多，这是他品德高尚的明证。

王景春还有1903年9月结婚的妻子孟文容（译音），子二人，多伦多的霍华德·王和帕萨迪那的大卫·王，女二人，肯塔基州佩利亚的弗兰西斯·秦夫人，和费拉得尔菲亚的路易·郭夫人。

汪精卫 原名：汪兆铭

汪精卫（1883.5.4—1944.11.10），国民党首领，孙逸仙政治上的亲密同事。他和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地位十多年，终于在中日战争时期1940年当了南京日伪政府的头目。

汪出生在广州，一般都认他为广东人，但他的祖籍却是浙江绍兴，浙江也是蒋介石的故乡。他父亲汪恕省，因经济原因，于清朝末年迁往广东，做过当地地方官的幕僚。汪于兄弟姊妹十人中为最幼。幼年时由父亲授学。他在成长时的伦理和审美观念属于中国传统观念，他以后的回忆谈到当时特别喜爱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陶潜、陆游的诗。他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思想敏感的中国青年

人一样，在读中国历史书时，深恨中国之衰弱及在北京的清王朝的异族统治。

他的家庭经常处于贫困境地，父亲为了维持家计一直工作到七十多岁。他家人又连遇丧亡，境遇更为困难。汪十三岁时，母亲死去，一年后父亲又死去，不久两个哥哥又死去。1898年，汪进了广州学堂，兼做教师以其收入补助家用。他还利用伯父家的丰富藏书进行自学，1903年中乡试，次年又得到官费去日本留学。明治时代的日本使汪精卫扩大了眼界，他和广东同乡如胡汉民等人相友善。汪很快学会了日语，以翻译所得补其公费之不足，他在东京政治大学学宪法和政治理论，1906年获得学位。

汪在毕业前，加入了1905年由孙逸仙、黄兴等反满革命党人在日本创立的一个新的中国爱国者社团同盟会，汪精卫被选为三个主要部门中的一个部的负责人，那时他才二十二岁，开始成为孙逸仙的一个知交。汪在东京、横滨中国留学生中是一个滔滔的辩论家。1905年11月，在日本倾向共和的分子创办了《民报》，宣传孙逸仙的主张，推进反满活动。同盟会在日本的主要敌手是康梁等君主立宪派。汪精卫在1905年11月10日《民报》创刊号上撰写社论，不久证明他足以著文与梁启超相匹敌的能辩之士。他运用从东京政法大学学得的理论成功地阐述了“民族主义”，以后这是孙逸仙三民主义的第一项内容。

1907年孙逸仙被迫离开日本，与汪精卫、胡汉民一起到东南亚以扩大同盟会的组织从海外华侨募捐活动基金。汪精卫在那里不仅表现其为一个有才能的新闻记者，而且也表现了他的演说家的才华，宣传了当时成效尚少的反满政治运动。他的辩才获得了华侨对同盟会的支持，并促成建立同盟会分会，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檳城分会。

1909年孙逸仙由新加坡去欧洲，汪精卫回日本后暂时主编复刊后秘密出版的《民报》，该刊名义上是在巴黎由同情孙逸仙的无政府主义者出版，实际上是在东京印刷的。当时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受1905年革命失败后逃到日本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很大，汪精卫当时的笔调是很有战斗性的。1910年2月1日《民报》上有他的一篇《论革命潮流》的激烈文章，主张用暗杀手段激发人们推翻清王朝。

1907—10年间，同盟会遭到一系列挫折，六次起义都被清政府扑灭，革命

领袖遭到逮捕和杀害。此外，同盟会本身也遇到内部危机，两个著名成员章炳麟、陶成章对孙逸仙的领袖地位提出挑战。共和革命的前景不太光明。汪于这时主张采取激烈行动推进革命运动，决心为党为国而牺牲他个人生命。1910年初，他化装回北京主持密谋活动，在摄政王载灃预定经过的桥下安置炸弹将他杀死。密谋者们行动上的一个失误使原定计划遭到失败，惊动了巡警，在全城进行搜查，1910年4月捕获了汪精卫。受审时，汪直认不讳，声称他希望用这种令人震惊的行动唤起民众，进行革命。满清当局对其直言勇为感到惊讶，而载灃摄政时，面临末日的清王朝力量已很衰弱，准备对政治犯实行宽容安抚革命党人。汪自认必将处死而成烈士，但结果仅被监禁而已。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发生后，汪被释出，时年二十八岁，全国视之为民族英雄。

汪精卫虽然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宠儿，但他在民国成立后，却对中国政局采取旁观态度，他受当时开明的知识界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于1912年参与成立进德会，这个组织认为政治改革之后，需要紧接着进行基本的社会改革，而在中国，要创立一个新的社会，首先需要有新的道德。同年他参与组织、鼓励和资助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

也是在1912年，汪精卫和槟城华侨富豪的女儿陈璧君结婚，她在汪从事同盟会活动时期就对这个出众的青年革命家深为仰慕。他们在上海结婚后，就去马六甲海峡殖民地和欧洲旅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汪精卫在法国，常常过问那里的中国留学生的学业而很少关心国内的政治动态。这一期间，他消遥自在，超然不群，同中国的关系，只限于文学方面。汪是南社社员，其中有不少以前同盟会会员，这是在民国初期主张采用古典文学形式的一个主要团体。汪虽然在理智上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与南社的关系，显露了他的个性中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的《双照楼诗词稿》，反映了那种中国旧式文人的敏感、沉思和喜爱自然的习性，其风格和淡泊宁静的情趣与此后支配他一生的热中政治纷争形成了鲜明对比。

1917年，汪精卫回国与孙逸仙在一起。孙逸仙那时组成广州的反对派政府，正在争取军事援助。此后七年中，汪是孙逸仙的随从之一，协助孙探索国民革命新的理论和组织方案。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激起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孙

逸仙与苏俄来华代表的接触，使孙于1922—23年间决心与新生的共产国际控制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汪精卫虽然在导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同苏联共产主义相联合的谈判中并未起过直接作用，但他在广州却居于政治上的显要地位。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第二号人物，得票仅次于胡汉民。

孙逸仙的主要目标在求全国统一，1924年他最后一次到北京去与当时掌权的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商谈。孙逸仙及其随从人员于11月离广州，汪精卫是孙的机要秘书。他们到上海后，孙改由日本去华北，汪则乘火车直接去天津准备谈判工作。1924年底，孙到北方后，发现临时执政段祺瑞无意让国民党参预政府工作。孙的健康情况迅速恶化，因癌症于1925年1月住进协和医院。汪精卫与孙逸仙相处二十年，他是当时在北京的孙逸仙最信任而地位最高的国民党领导人。除宋庆龄、孙科外，大概没有比汪精卫更亲近孙逸仙的人物了。2月24日，汪起草孙逸仙的政治遗嘱，要求孙的信徒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1925年3月11日，孙逝世前一日签署了遗嘱。

孙逸仙死后，汪精卫似乎将继承孙成为国民党的领袖，虽然胡汉民、廖仲恺也是这一荣誉的竞争者。1925年7月，汪精卫被选为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后看来他已经巩固了自己的优势。8月，廖仲恺被刺，使汪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因为胡汉民代人受过蒙受嫌疑而辞去党内职务，于是，两名政治对手都从竞争中消失。这时，另一名敌手蒋介石，虽在广州担任新建立的黄埔军校校长、第一军军长的关键性岗位，日益成为汪的威胁，但他在国民党中资历较浅。

在1925—26年汪当权期间，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首领，主张与共产党合作，蒋介石则是保守势力的代表。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下令逮捕他手下的共产党人。这个事件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但原因之一是蒋介石要以此削弱汪精卫及其支持者的地位。事变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次会议的决议说：“鉴于目前形势，左派同志必须暂时退走”，汪精卫被迫辞职，1926年5月去法国。

国民党内部的个人纷争牵涉到与共产党合作这样一个更大范围的问题，国共合作是孙逸仙留下的、可以作出各种解释的一个政治遗嘱。两党人士的相互

猜疑和国民党势力因两党合作而扩张，1923—27年的国共合作时期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复杂时期。北伐军到达长江流域时，国民党关于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而内部分裂，以致在1927年初出现了两个政府：在南京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右翼政府和在武汉的左派政府。随着两派分裂的扩大，武汉政府为了抑制北伐中声威日高的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吁请在欧洲的汪精卫回国。汪极不信任蒋，当即回国。他到上海后，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商谈了国共关系问题，1927年4月5日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保持国共合作。汪到了武汉，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政府的首要人物。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制造流血政变，破坏国共合作。事实证明，在武汉，汪精卫和俄国顾问及共产党人的合作也是短暂的。1927年5月底，汪精卫看出共产党要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并保持独立的政治立场，这两点，汪精卫认为都是与孙逸仙的主张矛盾的。不仅如此，7月1日，共产国际驻武汉代表罗易不慎把莫斯科关于中国及中国革命的进攻性计划告诉了汪精卫。汪于是与俄国顾问断绝关系，下令从党政机关中清除共产党人。自此以后，汪精卫在整个政治生涯中坚决反共，认为共产党是实现全国统一和进行经济建设的最大障碍。国民党内各派此时一致赞同反共，但个人间的争斗并未停止。汪精卫认为他理应执掌领导权，但发现自己日益为党内右派的批评所阻，尤其是1927年12月共产党建立广州公社时这种批评特别严厉，汪为这些事态所困扰，猝然离开上海去法国。

1928—1931年间，汪精卫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领导一个叫做国民党改组会。简称为改组派的这个组织，是国民党内一个反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势力日增的派别。蒋的这种控制力量在1929年3月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现了出来，这次大会由蒋介石一派操纵，指控汪精卫在政治上走入歧途并把汪的几个同事开除出党。汪精卫反对南京当局也得到了一个人的响应，其中有对蒋介石的政策不满的人，有对蒋的为人表示怀疑的人，也有对他的发迹感到妒忌的军界要人。蒋的主要敌手有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他们在华北拥有实力地位，发动了一场短暂而带有破坏性的反对南京方面的战争。1930年汪精卫和他们合作准备在北平成立对抗南京的国民政府，结果

失败，因为南京得到统治东北的少帅张学良的支持。北平的反蒋联盟失败后，汪精卫又成了政治流亡者，一个徒有抱负而无支助的异端分子。他南下到了广州，1931年初，又当了广州反对派运动的国民党首领，这个运动是因蒋介石在南京逮捕胡汉民，以及出于两广军阀的政治野心而引起的。广州的反对派运动未能推翻蒋介石，但恢复了汪精卫的地位，并为他与南京和解开辟了道路。

这些内部纠纷消蚀了国民政府的精力，阻挠了它争取统一全国的努力。1931年9月日军进占东北造成严重威胁，迫使国民党内各不相容的派别为了国家利益而把分歧搁置一边。国民党内各派首领取得了临时的妥协。诚然，个人之间的斗争在战时仍继续着。汪精卫和南京当局言和，1931年冬国民政府改组，他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于1932年1月28日就任恰在这一天夜间，在上海的日本驻军不宣而战向上海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从此以后，汪精卫终其一生就再也见不到和平了。

1932年2月到1935年11月，汪精卫主持南京政府，费尽心力和蒋介石合作，蒋介石则指挥军事，企图消灭江西及其他地区的共产党根据地。三十年代初期，一些中间的观察家认为，在长江流域下游出现了一个引起不少美国人士向往的新国家，各种各样的大规模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开始了，诸如：财政改革，发展交通业（包括民航），乡村建设，发展现代化大学教育，重振公共道德。由于他的政治权威和个人操守，汪精卫主持行政院期间的1932—35年是国民政府取得最多成就的时期。但是汪精卫的地位也并非毫无挫折，他虽身为总理，而蒋介石却把他的姻亲孔祥熙、宋子文放在南京的关键岗位上挟制汪精卫。汪精卫因被人怀疑、受人监督而激怒，1932年10月，他借口治病离职去欧洲六个月，行政院长之职由宋子文暂代。

1933年3月，汪经香港回国，他访问了胡汉民，企图以自己对国内政局的观点说服胡汉民。这两个老朋友的会见是不成功的，却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接触。汪回南京后，仍任行政院长兼代外交部长。他不久参加同日本外交和军事当局谈判有关中国本部和满洲国的铁路和邮政交通，以及确定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地位问题。汪企图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但是他发现在公众心目中，他是与对日退让政策相关最密切的人，因而处于政治上日益软弱的地位，并且

受到全国一切主张积极抗日的爱国团体的指责。事情的高潮发生于1935年11月1日，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南京开会，汪精卫被一个乔装为摄影师的刺客刺伤，这个刺客用藏在照相机里的手枪向他行刺。上海的外科医生未能为他取尽子弹，他不得不于12月辞去一切官职去国外治疗。

汪精卫在当了四年国民政府行政首长后，因急需进行治疗，于1936年2月去欧洲。在这个表面现象之下，实在具有更深刻的创伤。从1931年沈阳事变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间，汪精卫被蒋介石长期的令人痛苦的绥靖政策弄得政治上破产了。在这一期间，改良派、爱国主义、自由主义的舆论、共产党的压力、学生的骚动和民族自尊心一致反对南京的谨慎政策。汪精卫发现自己作为政府的首领，执行了一次极其不得人心的政策，替蒋介石挡住了反对绥靖政策的批评而威信扫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这是一个旨在迫使蒋介石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的举动，这时汪精卫赶紧从欧洲回国。但是蒋介石继续称王称霸。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后，蒋作为战时全国最高统帅掌握了全部权力。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确立了他在党内的独裁地位，汪精卫当选为副总裁。汪精卫的个人权力此时更变得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他的一些政治同伙也被挤下重要岗位而由蒋介石的亲信替代。

战争第一年内，汪精卫对战争的最后结局感到沮丧，主张与日本讲和。国民政府被迫迁到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又迁到重庆后，汪精卫愈来愈怀疑中国持久抗战的能力，11月间中国方面火烧长沙的惨剧发生后，他对中国的焦土政策更为失望。

1938年12月16日，他会见蒋介石，并未表示对战局的悲观失望，两天后飞往成都参加一个纪念活动，接着飞往昆明，12月21日飞抵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12月22日，近卫首相发表宣言，声称日本愿与中国新政府合作，在“东亚新秩序”基础上调整中日关系。重庆当即拒绝。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致重庆国民政府通电中发表主张和平的公开宣言，要求蒋介石停止武力抵抗与日本谋求和平解决。

1939年3月21日凌晨，国民党间谍进入河内汪精卫住所，射出子弹十多发，汪精卫未受伤，但他的长期被保护人和亲信曾仲鸣受了重伤，行刺的情由始终

未能揭晓，但一般都认为刺客的目标是汪精卫而误伤了曾仲鸣。不管事实怎样，汪精卫把他的朋友被杀看作是对他个人的伤害，他被逼得没有退路而激怒，此后一直与自己祖国的主要外敌积极合作。1939年春，汪从河内到上海，与积极参加华北伪政府及南京维新政府的人商谈，计划合并日占区的各种中国行政机构。1939年5月、10月，汪两次去东京，与日本当局商定中日新关系的联合声明，并在1939年底秘密签字。

1940年1月，汪的亲信高宗武、陶希圣携带了汪的对日密约逃往香港，这使汪的活动受到了一次挫折，密约泄露后在国内引起了暴怒，但未能延阻汪的筹备活动。1940年3月30日，一个仿照五院制合法的中央政府的新“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以汪精卫为最高官员。他立即邀请重庆所有文职人员和国民党党部官员参加这个政府。4月南京和日本谈判订立中日关系条约事宜。日本支持汪精卫的原意在促使重庆进行和谈，所以在重庆未明确表示拒绝谈判之前，日本政府迟迟不给南京政府以正式承认。东京政府直到1940年11月30日才同南京政府签订基本条约并给予正式外交承认，那已经是汪离开重庆两年，南京政府成立八个月之后的事。1940年11月的协定，与汪及其追随者的愿望相反，维持了日本在占领区对军事经济的有力控制，只准许南京当局拥有处理内政的象征性职权。

1940年欧洲的军事形势，尤其是法国沦陷，英国在德国空中袭击下出现的困难情况，使汪认为中国对轴心国进行有效抵抗的前景更为无望。对中国的政治局势，汪精卫认为他的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他的党即是国民党，旗帜也是国民党的旗帜，他的政府所施行的是孙逸仙的三民主义。他认为自己是孙的合法继承人。在对美作战开始之前，南京政府奉行的泛亚洲的、反西方的神秘主张很吸引了一些中国人，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则认为南京政府及其所依据的亚洲团结的主张，最有利按照日本方面的条件解决“中国事件”。

四十年代初，中国在政治上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国民党中国，处于中国西部，起自甘肃云南，包括了由重庆的合法的国民政府所控制或名义上服从它的地区；另一个是共产党中国，分布于华北、华东、华中沿海和铁路线之间一系列插花地区，由以陕西延安为中心的共产党造反政府所控制或服从于它；

第三个是从东北至东京湾的一系列半自治的日本占领区，其中又分为1932年成立的满洲国、北平伪政府，内蒙的由日本操纵的蒙疆政府，以及汪精卫的南京政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政治地理并未立即有大的变化，但是随着日本同盟国之间的战争的扩大，却提高了南京政府在日本对华政策中的地位。军事上，日本在中国大陆上进入相持阶段，而把主力转向南边。但是1942年间，尽管日本在东南亚颇为得手，中国仍旧是日本煤、铁和其他原料的供应来源，在经济上对日本至关重要。1942年底和1943年初，日本采取行动企图减轻对南京政府的明显的不平待遇。汪精卫再次去东京，和东条等日本政府人员会谈并会见了日本天皇。会谈结果，日本取消了在华租界和治外法权，南京政府于1943年1月9日正式向英美宣战。

1943年夏，东条来华，日本对在南京的法国维希政府代表施加压力，结果签订协定由南京政府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行政权力。1943年8月1日，南京政府正式接管了西方人用以长期控制中国这个主要商业财经都会的中心地区。1943年驻南京日本大使重光葵回东京任外务大臣，日本的“对华新政策”更具体化了，为了要使蒋介石和谈，这个政策表示，可以修订其原先打算独占东亚的计划，但要力拒西方国家重新恢复其过去的地位。

日本这一着的必然结果是对汪精卫政府作相应让步，至少表面上承认其平等的盟国地位。1943年10月30日，日本和南京签订新的同盟条约，取消了1940年11月的条约，在新约序文中说明，两国政府是独立平等的邻国，互相合作建设大东亚。但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关键并非在施加心理影响以增加汪精卫的声威，而是要对蒋介石的重庆政府的人员和集团施加政治影响。日本通过1943年10月和汪精卫签订条约，又通过戴笠和重庆的秘密交谈，强调蒋介石的真实利益在于与英美断绝关系，并与南京合作消灭正在农村中稳步扩展其势力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44年，正当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德国在西线败退的时候，政治上遭受挫折的重庆方面，重新发出提防毛泽东威胁的警告。重庆南京联合反共的想法据说在国民党保守派内有相当市场，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比日本更大的长期威胁。

汪精卫因前几年的枪伤未愈，1944年又不得不再次去日本就医，11月10日死在名古屋。从1927年起就和汪精卫关系密切的陈公博继任南京政府主席。但陈在国民党内没有汪那样的声望。另一个在南京以政治谋士著称的周佛海，他在1937年前是国民党内部著作传播最广的理论家。尽管有如陈、周等人物，不久表明，南京政府是依靠汪精卫的资格和他的声望而聚集在一起的。1944年底，汪精卫死去时，日本对中国停止抵抗的希望已变得暗淡，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也不成什么问题了。

对千百万受南京政府控制，对自己的生活别无选择权利的人们来说，面对日本人的统治，汪精卫政府从1940到1945年，的确给了他们一定程度的保护。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汪企图保持主权，保护中国人的权利，并确保不再发生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那样的事件。因此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对伪政府很少出现群众性的严重抗议或暴力行动。

汪精卫的遗妻陈璧君在日本失败后，同其他主要同伙一起，被控犯有卖国罪。她在法庭受审进行作证时，强调了汪为人正直，具有爱国思想，他认为只有与日本实行和解，才是保存中国民族利益的唯一现实方法。

本辑责任编辑 姜克夫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稿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十一分册)

作者=(美)包华德主编 沈自敏译

页数=100

SS号=11004762

DX号=

出版日期=1981年07月

出版社=中华书局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田汉

田耕莘

丁福保

丁西林

丁淮汾

丁文江

蔡锷

蔡廷锴

蔡廷干

蔡元培

曹汝霖

曹锟

岑春煊

曾琦

曾仲鸣

邹鲁

邹韬奋

朱友渔

杜重远

杜聿明

杜月笙

段祺瑞

段锡朋

董其武

董显光

董康

董作宾

董远峰

乌尼伯英（吴鹤龄）

万家宝

万福麟

王正廷

王景春

汪精卫

目录